國 立 中 央 大 學

歷 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張 春 橋 與 文 革 之 研 究
（1966－1976）

研 究 生：吳靜玫

指導教授：齊茂吉博士

中 華 民 國 96 年 6 月 25 日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

(95 年 7 月最新修正版)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全文電子檔(不包含紙本、詳備註 1 說明)，爲本人於國立中央大學，撰寫之碩/博士學位論文。(以下請擇一勾選)

(✓)同意 (立即開放)
(　)同意 (一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
(　)同意 (二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
(　)不同意，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

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基於推動「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於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論文收錄、重製、公開陳列、與發行，或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研究生簽名: 吳 靜 玫　　學號：941305028

論文名稱: 張春橋與文革之研究（1966－1976）

指導教授姓名：齊 茂 吉

系所　：歷史研究所　□博士班　■碩士班

日期：民國 96 年 6 月 25 日

備註：

1. 本授權書之授權範圍僅限電子檔，紙本論文部分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3 款之規定，採推定原則即預設同意圖書館得公開上架閱覽，如您有申請專利或投稿等考量，不同意紙本上架陳列，須另行加填聲明書，詳細說明與紙本聲明書請至 http://blog.lib.ncu.edu.tw/plog/ 碩博士論文專區查閱下載。
2. 本授權書請填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各紙本論文封面後之次頁（全文電子檔內之授權書簽名，可用電腦打字代替）。
3. 請加印一份單張之授權書，填寫並親筆簽名後，於辦理離校時交圖書館（以統一代轉寄給國家圖書館）。
4. 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歷史　　學系/研究所　吳靜玫　研究生所

提之論文

張春橋與文革之研究（1966－1976）

係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齊茂吉　(簽章)

96年6月5日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歷史　學系/研究所 吳靜玫 研究生所提之

論文

張春橋與文革之研究（1966－1976）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定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吳振漢

委　員　

齊茂吉

吳振漢

鄭政誠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六　年　六　月　二十五　日

摘要

論文名稱：張春橋與文革之研究（1966-1976）
頁數：135 頁
校所：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研究生：吳靜玫　　　　指導教授：齊茂吉博士
中文提要內容：

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有三：第一，張春橋是因文化大革命而起的政治新秀，文革初期因爲赴上海處理「安亭事件」而聲名大噪，安亭事件是否如中共黨史著作所提由張春橋先斬後奏，是需再去還原其歷史真相。第二，在文革時期，毛澤東在中共黨內至高權威地位是不容挑戰的，張春橋的政治命運，顯然與毛澤東的態度有直接關係，在詭譎多變的文革權力鬥爭裡，張春橋如何在中共內部派系間周旋，即使在文革中遭到多次的「炮打」，也都在毛澤東的一句話下，化險爲夷，這是值得去探討的。第三，文革末期，在周恩來死後，中國大陸便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四・五運動」，這場運動爲日後粉碎江青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此一事件裡張春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將在此做深入討論。

張春橋因長期與柯慶施、江青合作而成爲在文革時期崛起的政治人物，在文革十年中一路由「中央文革」副組長、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國務院副總理，高居中央首長的位置。張春橋是文革時期極左派的代表人物，在文革中忠實的推行毛澤東路線，在文革中不僅是奪權者，同時也是一位理論家，在理論方面可說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的傳人。

A Study of Zhang Chunqiao and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Abstract

The thesis aims to discuss three issues. First, Zhang Chunqiao is the political rising star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Zhang becomes prominent known because of going to Shanghai to handle "Anting Incident". Is the "Anting Incident" the same with CPC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tory? It needs us to return the historical truth again.

Second,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Mao Zedong can't be challenged to inner-party to the high authoritative position in the CPC, Zhang Chunqiao's political destiny, obviously have a direct relation with Mao Zedong's attitude. How did Zhang Chunqiao contend with others among the inside faction in the strange and changeful struggle for power of the CPC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Even he was attacked many times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He always turned peril into safety under one word of Mao Zedong. This is worth probing into.

Third, in latter stage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fter Zhou EngLai died, the “April Fifth Movement” happened with larger force in Mainland China. This movement has established mass foundation for crushing Jiang Qing group in the future. The key role that Zhang Chunqiao acts in this incident will be discussed thoroughly here.

Zhang Chunqiao becomes political personages emerging in the Culture Revolution because of cooperating with Ke Qingshi, Jiang Qing for a long time. He becomes leading cadre of central government from vice group leader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nd Member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vice Premier of State Council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between ten years.

Zhang Chunqiao was the deputy of Leftist Extremists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he followed out the line of Mao Zedong faithfully. Furthermore, he is not only a occupant but also a theoretician. He is a descendant of the Mao Zedong’s thought during the old age of Mao in the theory.

謝　辭

由於大學時期，所學的並非歷史相關科系，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可以完成論文，常常感到很惶恐，經過兩年時間，在歷史所師長的薰陶和、指導及鼓勵下，讓自己逐漸找到方向，竟能如期完成論文，此刻心中充滿感動及感恩，也期勉自己繼續秉持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各領域上努力及學習。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齊茂吉老師，齊師的專業和治學態度，值得欽佩、學習。這兩年來老師在學業上耐心指導與鼓勵我，使我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有所成長，順利完成本論文。也感謝吳振漢教授、鄭政誠教授的指導且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本篇論文能更加完整。還有感謝吳學明教授、王成勉教授、賴澤涵教授、朱德蘭教授、李力庸教授的教導，讓我受益良多。

另外，感謝這兩年來一同學習、成長的同學依純、立中、文雄、應誠、德瑞、良貞、孟萱、美如、依官、文惠、煒舒、錦昌、宗旺、鳳貞、庚龍、嘉惠、月琴、敬忠、錦萍、世宗、雅鳳、文欣、富宏、美純、堯文、鈺棠、美芳等，謝謝你們這兩年來給我的幫助，與你們一起上課、學習的日子，讓我感到很充實。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先生，你們對我的支持，是我奮發向上的原動力，也要謝謝我的小孩小波，你的配合讓媽媽在白天忙於教職後，能專心於學業研究，在此將這一份成就與喜悅，與你們一同分享。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動機

文化大革命[1]是毛澤東（1893-1976）一生做過的二件大事之一，他曾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2]基於對毛澤東的崇拜，紅衛兵和造反派成為文革的響應者。[3]文革本是一場思想革命，是要以社會主義的文化、思想、風俗、習慣，來取代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4]是希望透過天下大亂以達到天下大治，實現毛澤東在「五・七指示」[5]中所勾勒出的理想社會。[6]自 1949 年以來，在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下，大陸社會各階層普遍對官僚特權存在著強烈的不滿，在黨的專政機器鉗制下，群眾這股不平的情緒無法宣洩，長期積壓達到臨界點，當毛澤東適時地登高一呼，

[1] 本文將簡稱為「文革」。
[2] 馬齊彬、陳文斌、林蘊輝、叢進、王年一、張天榮、卜偉華，《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頁 320。
[3]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796。艾愷（Guy Alitto）表示為了重掌權力、實現自己的理想藍圖，毛澤東找到了一批支持者發動文革。艾愷（Guy Alitto），〈文革：四十後的破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期 93（2006 年 2 月），頁 5。
[4] 〈林彪在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 8 月 1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舊時代指的是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之前，所有創造、遺留下來的文化。舊思想，是歷史上從孔子、老莊等先秦諸子，經董仲舒、韓愈、朱熹，到王陽明、曾國藩、胡適、劉少奇等所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思想、著作，以及受到他們影響的其他人的著作。舊文化，指舊時代的禮儀制度、文學藝術、教育思想和實踐等精神現象。舊風俗，指歷史上人們日常生活中代代傳承的衣食住行、年節、婚喪、娛樂、禮節等。舊習慣，歷史上、現實中長期生活形成的行為模式、傾向、風氣。
[5] 指的是毛澤東在 1966 年 5 月 7 日寫給林彪的一封信。這一封信裡，毛澤東所勾勒出的理想社會是軍事共產主義的社會。〈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1966 年 5 月 7 日、14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3；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76。「五・七指示」是毛澤東想要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宣言書，它寄託著毛澤東的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王祿林，〈「五・七指示」初探〉，張華、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頁 154。
[6]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2-9。

在階級鬥爭的號召下，群眾終於找到了洩憤的管道，這是毛澤東可以成功發動群眾運動的主因。[7]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群眾運動的狂飆下，席捲全國，讓剛經歷一場全國性大饑荒的中國大陸，帶來另一個長達十年之久的浩劫。

張春橋（1917-2005）是因文化大革命而起的政治新秀，文革初期因為赴上海處理「安亭事件」而聲名大噪，在文革後期與江青（1904-1991）、姚文元（1931-2006）、王洪文（1935-1992）形成「四人幫」[8]，張春橋是否真如目前中共黨史著作中所提到的那樣是位老奸巨滑、城府極深，在文革期間策劃了很多陷害老將的事，值得再去還原事情的真相。

在文革時期，毛澤東在中共黨內至高權威地位是不容挑戰的，文革新貴張春橋的政治命運，顯然與毛澤東的態度有直接關係，在詭譎多變的文革權力鬥爭裡，張春橋如何在中共內部派系間周旋，即使在文革中遭到多次的「炮打」，也都在毛澤東的一句話之下，化險為夷，這也是值得討論的。文革初期，上海「安亭事件」讓張春橋政治生命起了很大的變化，文革末期，周恩來死後，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四・五運動」，這場運動為日後粉碎江青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此一事件裡張春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是值得去研究探討的。

貳、題目界定

本論文的題目是「張春橋與文革之研究（1966-1976）」，在此就題目中的關鍵詞彙、研究範圍與時間斷限作一番界定。

文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簡稱。張春橋是在文革時期崛起的政治人物，在文革十年中一路由「中央文革」副組長、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國務院副總理，高居中央首長的位置，同時也是文革時期極左派的代表人物。[9]文革在反對修正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口號中展開，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延伸，整個過程是以殘酷的鬥爭

[7]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頁 182。
[8] 中共官方資料顯示，「四人幫」指的是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為核心，企圖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1974 年 7 月 17 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點出「四人小宗派」的問題。〈對“四人幫”的幾次評語〉（1974 年－1975 年），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394。
[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796。

爲焦點的群眾運動。[10]文革的起點最常見的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 1965 年 11 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開始；另一種則說法則是 1966 年 5 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通過所謂的「五・一六通知」，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在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上成立一個全新的中央文革小組，從此文革揭開序幕。[11]1977 年 8 月，華國鋒（1921-）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12]本文將採用後者之說。

本文的時間斷限，是以 1966 年到 1976 年文革時期，張春橋所扮演的角色爲主要討論範圍。由於毛澤東非常重視文革的推動和後續發展，所以他在選人、用人方面特別慎重，往往在運籌帷幄間，牽動到各個派系中的權力平衡，因此張春橋在文革中的角色及功能，主要取決毛澤東的態度。從歷史淵源來看，張春橋的崛起，和他長期與柯慶施（1902-1965）、江青、姚文元的合作，有很大的關係，因此文革之前，張春橋的崛起背景時期，會列入討論範圍。而在文革末期「四・五運動」，張春橋面臨前所未有的「炮打」，以及張春橋被逮捕後在「公審張春橋」時爲何他不發一語，也都將列入討論的範圍。

參、 研究回顧

由於筆者以張春橋在文革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爲主要問題處理對象，因此對於在文革時期，與張春橋有關的研究，都有必要加以回顧與探討。目前仍無專門以「張春橋與文革」爲題來討論的學術論文，而與張春橋生平傳記有關的論著，也只有由葉永烈（1940-）所撰寫的《張春橋沈浮錄》[13]，但該書帶有太多文學報導色彩，書中很多情節像是作者就站在當事人身旁，爲他們進行記錄一般，讓人不免懷疑其真實性。

至於文革時期與張春橋有關的期刊和報導，主要都是中國大陸方面的資料，

[10]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801。
[1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802-803。
[1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877。
[13]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台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年 9 月）。

內容仍是帶有批判張春橋這位在「四人幫」中最具政治權謀特色的人物，如：霞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14]（上）（中）（下）這三篇文章裡，把張春橋形容成一位老奸巨滑、城府極深的人，他在「四人幫」裡「狗頭軍師」、「智囊」之稱。張春橋在文革時期呼風喚雨、權傾一時，唯恐天下不亂，夥同江青集團成員製造了數不清的冤案，做了數不清的壞事。張春橋策劃一月革命，到毛澤東面前告老將們的「御狀」使得很多老將紛紛被打倒，老將們之所以會被打倒，都是因爲張春橋向毛澤東做了虛假的彙報。「四・五運動」也是因爲張春橋的虛假彙報，才讓毛澤東錯誤的將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定性爲反革命的暴動。文中將文革時期中共中央所發生的錯誤皆推往張春橋等人身上，而忽略了毛澤東在幕後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於將毛澤東所犯下的錯誤，說成是因爲被張春橋等人所矇騙等。文革中深受毛澤東倚重的張春橋是否如文中所言主導策劃了文革中的多起事件，值得深入探討。

尹家民在〈“安亭事件”：張春橋的一次政治賭博〉[15]這篇文章，主要談到張春橋是冒著政治賭博的風險前往安亭，不顧中共中央反對，自行決定和「工總司」簽字，在毛澤東的相挺下，他在這次賭博中獲得勝利。文中只提到因爲事後毛澤東的相挺，使得「安亭事件」順利落幕，但並未探討爲會何毛澤東會不顧常委陶鑄[16]（1908-1969）、李富春（1900-1975）、周恩來（1898-1976）等人的意見，

[14] 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黨史博采》，期 6（2005 年），頁 11-17；霞飛，〈紅極一時：“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中），《黨史博采》，期 7（2005 年），頁 44-47；霞飛，〈南柯一夢：“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下），《黨史博采》，期 8（2005 年），頁 49-54。

[15] 尹家民，〈“安亭事件”：張春橋的一次政治賭博〉，《黨史博覽》，期 5（2006 年），頁 10-14。

[16] 陶鑄，湖南祁陽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在中央政治局中位列第四。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把陶鑄調到中央來擔任重要職務，希望他能支持文化大革命，但陶鑄耿直的個性，在文化大革命時比較支持周恩來，因此，逐漸失去毛澤東對他的信任，紅衛兵運動遍及全國後，陶鑄對紅衛兵產生了質疑，最後被扣上「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提到陶鑄的倒台，「毛澤東決心要批陶鑄時，周恩來在『保持晚節』心態的驅使下，縱然有心想保陶鑄，也不敢違抗毛的意旨，只好讓陶鑄先『顧全大局』了。」「他卻沒有對陶鑄援之以手，站出來爲他緩頰，反而硬著頭皮充當了批陶會議的主持人，讓陶鑄爲自己背黑鍋」最後陶鑄因膽癌，1969 年 11 月 30 日在安徽合肥逝世。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做出爲陶鑄平反的決定，12 月 24 日在人民大會堂爲彭德懷、陶鑄舉行了追悼會。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3 月第 36 版），頁 168-171；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頁 217-254。

轉而支持張春橋。爲什麼張春橋敢冒險與「工總司」簽字，又爲了什麼原因使得毛澤東決定支持張春橋，這都是值得探討的。

李艷君、婉君在〈張春橋與「安亭事件」〉[17]這篇文章裡談到，陰險詭譎的張春橋在處理安亭事件時，之所以敢在未告知華東局、上海市委及中央文革下，斷然與「工總司」簽定他們所提的要求，最大的因爲是因爲中央文革成員大都是他的同夥，再加上他深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所以他認爲他一定不會因爲支持造反派而受到處罰。此文將張春橋定位於想在亂中奪權的陰謀份子，因爲有毛澤東的相挺而更加得意忘形，整體而言，還是脫離不了替主角人物冠上大奸大惡之徒的宣傳手法。

霞飛在〈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劃所謂"一月革命"始末〉[18]這篇文章裡提到，在毛澤東對紅衛兵失去了信心後，打算以無產階級爲搞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向走資派發起總攻擊，也就是要從他們手中奪權。張春橋承襲了毛澤東的想法，與王洪文在上海對走資派發動攻擊，企圖將陳丕顯（1916-1995）拉下台，因而展開一連串的奪權行動。本文中張春橋是一位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而忽略毛澤東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一月革命是否真由張春橋等人一手策劃主導，值得再去探討。

秦維憲（1954-）在〈反張春橋的"胡守鈞小集團"〉[19]這篇文章裡談到，張春橋在上海發動一月革命時，復旦大學學生胡守鈞（1944-）對張春橋產生質疑，進而去追查張春橋的過往歷史，掌握了張春橋曾攻擊魯迅（1881-1936）的證據。當張春橋自吹自擂說毛澤東同意他當上海人民公社第一書記時，激怒了胡守鈞等人，因而引發了復旦大學紅衛兵發動「一二八「炮打」張春橋」事件。在此事件之後，張春橋雖然表示不追究，但是私底下卻對他們進行迫害，這件事顯示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張春橋如何迫害政治上的異己。

---

17 李艷君、婉君，〈張春橋與"安亭事件"〉，《黨史博采》，期 9（2004 年），頁 22-23。

18 霞飛，〈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劃所謂"一月革命"始末〉，《黨史博采》，期 9（2004 年），頁 40-45。

19 秦維憲，〈反張春橋的"胡守鈞小集團"〉，《炎黃春秋》，期 9（2005 年），頁 9-14。

何梓林在〈鄧小平長沙之行〉[20]這篇文章裡談到，鄧小平（1904－1997）第二次復出後，迅速得到毛澤東的信任與重用。鄧小平復出後不久立即遭受到江青集團等人的攻擊，爲了爭取四屆人大組閣，王洪文飛往長沙告周恩來、鄧小平的狀。江青集團的這個舉動引來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要求王洪文不要和江青在一起攪和，應該和周恩來、葉劍英（1897-1986）多多談談。此後，毛澤東更多次批評江青等人，要他們四個人和中央幹部多團結，不要搞宗派，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四人幫」的概念。本文多次談及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批評，而忽略了爲何毛澤東會對自己在政治上的伙伴江青，以及深受其重用的張春橋提出批評，他的真正用意爲何，這一點很值得去探討。

梁紅伍在〈康生死前爲何會揭發江青和張春橋〉[21]這篇文章裡提到，康生[22]（1898-1975）因爲想和「四人幫」拉開距離，所以轉而向周恩來、鄧小平靠攏，爲此在病榻中的康生，讓人用擔架抬到周恩來那裡，向周恩來告狀。內容中提到老謀深算的康生雖然很不希望看到鄧小平掌握大權，但爲了讓自己留下好名聲，在臨死之前，托人傳話揭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但這個舉動並沒有讓他留下好名聲，反而留下了他慣於見風轉舵的佐證。

由以上的回顧可看出，關於張春橋在文革時期的相關資料，仍擺脫不了過於渲染張春橋、江青的罪狀，而忽略了毛澤東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這樣的宣傳框架中所描寫的內容，難免會出現與史實有所出入的地方，值得再去深入還原和探討。

肆、資料運用與研究方法

資料運用方面，在文革時期與張春橋有關的資料，將是蒐集上的重點，並試

[20] 何梓林，〈鄧小平長沙之行〉，《百年潮》，期 8（2004 年），頁 19-23。
[21] 梁紅伍，〈康生死前爲何會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百年潮》，期 9（2006 年），頁 19-22。
[22] 康生，1898 年生於山東諸城，在延安時期任職中央書記處書記，文革前曾任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文革期間擔任過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央組織宣傳組組長、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政治局常委。丁望主編，《原版文革密件第一卷：關於四人幫事件（1976）》（香港：田園書屋，2006 年 9 月），頁 244。

圖利用一些中共已開放的檔案資料、相關的黨史著作、專書、期刊論文以及海內外出版的回憶錄，來了解張春橋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處境。

目前已開放的中共歷史檔案並不多，而且查閱檔案還有種種限制，因此在研究上有一定的困難。正如楊奎松（1953-）在〈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一文中所說：

> 一般的研究者，包括海外的研究者，要想直接利用第一手的檔案資料全面地研究中共的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而離開了所需主要檔案資料，要想對自己的研究對象，無論是對事件的經過，還是對傳主的經歷，做出客觀和準確的說明，通常都會變得極困難。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研究中共歷史的成果，之所以水平上參差不齊……有相當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能看到的第一手檔案資料太少，以致於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主觀的推測或並不可靠的各種二手資料。當然，現狀如此，不等於不能研究，畢竟，即使就中共歷史檔案而言，其開放程度較前已有相當進步。[23]

查閱原始檔案有其困難度，因此研究中共歷史的另一種重要選擇，就是利用經過整理和編輯的已出版檔案資料。

在史料檔案方面：文革方面的資料，主要是運用宋永毅（1950-）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4]，此文庫內收錄了文革時期大量的檔案和史料，從裡面可看到文革時期，有關中共中央的指示、重要人物的講話紀錄和批示等；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冊[25]，也蒐集了文革期間相關的中共中央檔案資料。

至於從中共建國後的一些重要的史料，也需要加以注意，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6]，內容包括從 1949 年到 1976 年，毛澤東

[23] 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7（1999 年 3 月），頁 137。
[24]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
[25]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冊（北京：國防大學，1988 年 10 月）。
[26]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3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 年）。

的手稿、經他審閱過的講話和談話紀錄稿或是經他審定用他名義發的其他文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27]、《毛澤東文選》；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的《中共機密文件彙編》[28]等也都收錄了部份中共建國後的史料。

相關人物的傳記或年譜，以及中共的黨史相關出版品，裡面提供相當多的參考資料，但在運用方面，要與其他史料作比對，避免陷入編纂者因其個人意識形態或感情因素，而導致失真的陷阱，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中、下卷[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鄧小平年譜（1975 -1997）》上、下卷[30]、逄先知、金沖及（1930-）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卷[31]、金沖及編的《周恩來傳（1949-1976）》全四冊[32]等。

其他資料在報紙和期刊的部份，文革時期主要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以及《文匯報》等，都是重要的資料，還有一些大陸方面的期刊資料，如：《黨史博覽》、《黨史天地》、《百年潮》、《黨史縱覽》、《黨史文苑》、《中國人才》、《黨史博采》、《炎黃春秋》、《當代中國研究》（香港出版）等，裡面有些相關的文章，有助於了解部份張春橋在文革時期的經歷和處境，不過內容多有情緒性的評批意味，在運用上要適當的解讀，才能反應真正的事件始末。

另外，還有透過相關專書的蒐集和整理，從中找尋有關的論述，加以整理分析，也有助於了解張春橋在文革中所扮演角色。如：吳法憲（1915-2004）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33]、陳永發（1944-）編的《中國共產革命的七十年》

[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譯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28]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編，《中共機密文件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8 年）。

[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

[31]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32]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全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33]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

下冊[34]、徐景賢（1933-）的《十年一夢》[35]、呂相友（1928-）編的《中國大審判》[36]、高文謙（1953-）的《晚年周恩來》[37]、王文正（1922-）的《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38]、鄧小平之女鄧榕（1950-）所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39]等。

伍、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成六章，第一章是緒論，第六章是結論。第二章部份是關於張春橋崛起的歷史背景，下分四節：第一節討論張春橋與文壇之淵源，主要是介紹1930年代張春橋在文壇上因爲批判《八月的鄉村》一書而與爲這本書作序的魯迅所起的一場衝突。第二節是討論張春橋與柯慶施、毛澤東之間淵源，張春橋爲何會和有「毛澤東的好學生」之稱的柯慶施結識，他又將如何透過柯慶施的關係而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將在本節裡探討。第三節是討論張春橋與江青、于會泳（1925-1977）、姚文元，文革發動前江青與張春橋是如何結識，張春橋又在怎樣的情況下讓于會泳及姚文元有所交集，這些將是本節所闡述的重點。第四節是討論張春橋如何進入中央文革，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毛澤東會讓身份不怎麼起眼的張春橋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將是這節所要探討的重點。

第三章部份是關於張春橋在文革時期前期—1966-1967年的處境，下分四節：第一節是討論安亭事件，造就工人造反派取得合法地位的安亭事件，從發生到落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此外爲何張春橋會冒著政治上的風險，不顧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中央文革的意見，自行決定與「工總司」簽字，其中的緣由，將在此做一番探討。第二節是討論「一月革命」，張春橋如何發動上海奪權，上海

---

[34]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
[35]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36] 呂相友，《中國大審判-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圖文紀實》（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 年）。
[37]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3 月第 36 版）。
[38]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
[39]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奪權是否毛澤東在幕後扮演黑手，有待去了解。第三節討論「炮打」張春橋，在發動上海奪權時，張春橋因爲被紅衛兵質疑爲反革命的人物而被「炮打」，後來因爲「中央文革特急電報」而讓他從這場「炮打」戰火裡脫身，這封電報的由來將在本節中加以探討。第四節將探討上海人民公社的設立過程及其改名的原委。

第四章部份是關於張春橋在1967-1969年的處境，下分三節：第一節討論二月逆流，在懷仁堂會議上張春橋爲何會被老將們批鬥，老將們在批了張春橋後爲何會被扣上「二月逆流」的大帽子，在此將深入探討。第二節討論張春橋與游雪濤（1935-），本節將討論張春橋的特務小組「游雪濤小組」的形成原因，及爲何會被解散，此外，也將討論所謂的張春橋的歷史問題，探究其歷史問題的形成原因。第三節是討論張春橋與陳伯達[40]（1904-1989）、陳毅（1901-1972）之間的衝突，首先在與陳伯達的衝突方面將著重在探討九大政治報告，討論爲何毛澤東會捨棄陳伯達所起的九大政治報告，而改用張春橋、姚文元所起的九大政治報告，以及林彪（1901-1971）對這份報告所持的態度；在與陳毅的衝突上，著重在探討爲何九大時張春橋會整陳毅。

第五章部份是討論張春橋步入中共領導階層後到1976年被逮捕，下分四節：第一節是討論九屆二中全會時林彪對張春橋的攻擊，1970年8月14日張春橋和吳法憲針對要不要設國家主席進行爭論，雙方鬧到不可開交，這個爭論在九屆二中全會時繼續延續，張春橋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是如何被攻擊，將爲本節的重點。第二節是討論張春橋與周恩來在批左與批右之間的交手，本節將著重討論張春橋與周恩來在批林彪爲極左或極右上的爭論。第三節是討論張春橋與鄧小平之間的衝突，將討論四屆人大組閣之爭、批經驗主義及「四五運動」時張春橋所起的作用。第四節是討論張春橋被逮捕及其日後被公審時的情形，本節將著重討論爲何張春橋在法庭上會不發一言。

---

[40] 陳伯達，1904 年生於福建省惠安縣，192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 年赴延安並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參與思想文化戰線工作，歷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部主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等，也是《毛澤東選集》的主要編輯者，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頁 1-2。

第二章　張春橋崛起的歷史背景

第一節　張春橋與文壇

張春橋於 1917 年生於山東省巨野縣。巨野縣位於山東西南部的農業區。家中有一些田產，屬於小資產階級，濟南正誼中學畢業。15 歲時在山東《民國日報》發表了他的處女作〈春雨之夜〉，題材以農村生活爲主。[1]張春橋之所以會以描寫農村生活，和他從小的生活環境有關，張春橋在去濟南之前住在農村，熟悉農民的生活，在從事寫作後，常把農民在貧苦中掙扎的情境反映在文章中。

1933 年張春橋加入華蒂社。張春橋自命爲前進的作家，1934 年 7 月 16 日在《中華日報》[2]寫了〈另一個問題〉一文批判了施蟄存[3]（1905~2003），1934 年 11 月 29 日在《中華日報》寫了〈關於臧克家〉一文斥責了臧克家[4]（1905~2004）及郭沫若[5]（1892~1978），在〈關於臧克家〉裡提到：「現階段，『天災人禍』下的我們，對於自身的感受不說，而借古代的事情來寫作，這無疑是故意拋開現實而去尋求過去，用過去來表現現在。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確。」[6]，初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張春橋批評的作家都是當時在文學上成就比他高的作家。[7]

1936 年張春橋以狄克的筆名在《大晚報》的〈火炬〉副刊上發表了〈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文中提到：「《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是一首史詩。可是裡面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

---

[1] 丁望，《王洪文張春橋評傳》（香港：明報出版社，1977 年 12 月），頁 135-163。
[2] 復興社的機關報。于國勳等著，《藍衣社復興社力行社》（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年），頁 145。
[3] 施蟄存，1905 年生。以小說創作成爲 30 年代的知名作家，早期的小說，以秀麗、詩意的筆觸，描繪故鄉的風土人物。後因受弗洛伊德學說的影響，寫心理小說，把心理分析、意識流、蒙太奇手法，納入創作中。應國靖編，《中國現代作家選集-施蟄存》（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88 年）。
[4] 臧克家，山東諸城人。 生於 1905 年 10 月，是中國現代著名詩人。黃曼君選評編輯，《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郭沫若》（台北：海風出版社，1990 年），頁 5。
[5] 郭沫若，四川樂山人。生於 1892 年，爲當代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劉增人、馮光廉選評編輯，《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臧克家》（台北：海風出版社，1989 年），頁 5。
[6] 轉引注自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38。
[7] 尹家民，〈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設立〉，《黨史博覽》，期 1（2006 年），頁 35。

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於他感覺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後，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為什麼沒有人指出呢？」[8]這篇文章引起了替蕭軍作序的魯迅的不滿。因此，魯迅寫了〈三月的租界〉予以反擊，張春橋在得知魯迅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批評他後，曾寫了一封信給魯迅，在信裡提到：「對於田軍，像對於每個進步的作家一樣，我是具著愛護心的。寫那篇文章也似乎是由於太熱愛了他－以致有些話說得過火。但是，先生，對於『田軍不該早回來』這句話我並不是盲從，是有理由的，現在卻不必說了，因為他和蕭紅已經回來了，從那血腥的世界跑到這個血腥的世界裡來了，而又獻給了人們『八月的鄉村』這部書，我還說什麼呢？說出來，只能使我們當中有了誤會和隔膜－我說現在還沒有什麼誤會太大的地方。」[9]魯迅收到來信後並沒有回信，反而在二天後寫了〈《出關》的「關」〉一文繼續抨擊，張春橋與魯迅的這一段歷史成爲日後張春橋被攻擊的材料。[10]

1958 年、1959 年張春橋將自己從 1955 年到 1959 年以來所發表的一些文章集結成《今朝集》[11]、《龍華集》[12]，這二本文集共收錄七十三篇文章，這七十三篇文章裡最出名的就是〈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葉永烈在《張春橋沈浮錄》裡提到：「〈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是張春橋苦苦奮鬥多年才終於一鳴驚人的『成名作』。這篇文章後來成為『張春橋思想』的核心。直到 1975 年張春橋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又再一次重申了他的『 成名作』的基本觀點」[13]，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主要是在批評以八級工資爲代表的等級分配制度，張春橋認爲從歷史上看來在革命戰爭年代，以絕對平均主義爲特

---

[8] 轉引自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56-57。《八月的鄉村》，蕭軍（即田軍）著，反應東北人民抗日鬥爭的長篇小說，魯迅替這本書作序，這本書在 1935 年 8 月由上海容光書局出版。
[9] 轉引自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60。
[10] 陳東林，〈魯迅與張春橋－“狄克”文章發表的前前後後〉，《黨史博覽》，期 11（2001 年），頁 10-14。
[11]《今朝集》共收錄 33 篇文章，1958 年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424。
[12]《龍華集》共收錄 40 篇文章，1960 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426。
[13]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09-110。

色的供給制，在那個年代起了很好的效果，供給制並不像有些人攻擊的是農村作風、游擊氣息，而是一種上下平等的表現，而含八級工資制[14]在內的等級分配制度，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產物，是屬於金錢掛帥，只會激起爭名爭利的積極性，並不會刺激生產的積極性。[15]破除資產法權思想對毛澤東晚年思想進行理論解釋，提倡用供給制取代解放後實行的八級工資制。[16]張春橋也因為發表這篇文章而引起毛澤東的注意，讓他日後有機會進入中共高層。[17]

第二節 張春橋與柯慶施、毛澤東

柯慶施 1922 年入中國共產黨，1954 年由江蘇省委書記調派到上海，接替陳毅在上海的工作，1955 年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秉持緊跟毛澤東的政治原則，1958 年在成都會議上講了一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18]，深得毛澤東的信任，1958 年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的 10 月被任命為上海市市長，1964 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65 年初因肺癌所以曾到廣州、成都療養，4 月 5 日那天李井泉（1909-1989）、李大章（1900～1976）、廖志高（1913-2000）等人設宴招待朱德（1886-1976）、賀龍（1896-1969）

---

[14] 所謂的八級工資制是指依照工人的年齡、技術等因素，將工資分為 8 個等級，1 級是最低，8 級最高。黃岭峻、王作懋，〈八級工資制引發的兩次批評〉，《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17 期 4（2004 年 8 月），頁 475。

[15] 黃岭峻、王作懋，〈八級工資制引發的兩次批評〉，《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頁 476-477。所謂的資產階級權利（法權）指的是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用於描寫社會主義經濟特徵的一個概念。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中，由於實行等量交換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還存在著類似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法定權利。馬克思作於 1875 年的《哥達綱領批判》，針對拉薩爾「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社會主義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勞分配是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因為勞動者工作能力、贍養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從等量勞動取得等量產品的平等原則出發，每個人事實上得到的消費品仍是不平等的。「在這裡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權利」，「還仍然被限制在資產階級的框框里」：因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列寧作於 1917 年的《國家與革命》預測「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時寫道：「『資產階級權利』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範圍內，也只是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權利』才不存在了。」。列寧，《國家與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85-88；陳章津，《俄國革命的性質》（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7 年），頁 227-251。

[16] 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李玉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522。

[17] 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黨史博采》，期 6（2005 年），頁 11。

[18] 轉引自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724。

及柯慶施，柯慶施在招待會上喝了酒，當天晚上臨睡前又吃了油炸花生米，因而引發急性出血性胰腺炎，4 月 9 日時在經由北京、上海、四川名醫所組成的醫療團的搶救下，仍宣告不治。[19]

1937 年南京陷落後，張春橋到了延安，193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20]1948 年張春橋調任《石門日報》社社長，後來《石門日報》易名爲《石家莊日報》，因爲《石家莊日報》石家莊市政府的喉舌，因此，張春橋與身爲石家莊市市長的柯慶施有了密切接觸，善於出點子的張春橋被柯慶施延攬爲市政府秘書兼《石家莊日報》社社長，與柯慶施共事於石家莊成爲張春橋日後能接近中共領導高層的一個契機。[21]

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的柯慶施需要一位對上海熟識的智囊，曾在石家莊共事過而現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的張春橋，就是最好的人選，因此，原本要調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就繼續留在上海《解放日報》，並且成爲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深受柯慶施凡事緊跟毛澤東的行事風格的影響，他也將從柯慶施那裡所得到的毛澤東動向視爲自己的行動指標。透過從柯慶施身上所得到的政治訊息，在 1957 年發表了很多反右文章，成了反右英雄。[22]

1957 年由張春橋參與起草〈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這篇文章深受毛澤東喜愛，柯慶施因此深獲毛澤東的讚賞。1958 年柯慶施成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市長，與毛澤東的接觸更加頻繁。柯慶施常常把他和毛澤東的談話告訴張春橋，張春橋把毛澤東言論記在筆記本裡，並常常利用時間反覆揣測毛澤東內心的想法。張春橋從毛澤東的言談中感覺到，毛澤東對紅軍時期的供給制度深具好感，對八級工資制所造成的等級差別很有意見，在揣摩上

---

19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96-109；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27-29；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791。
20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70、73。
21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84-87。
22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97-165。

意之下，張春橋在《解放》第六期上發表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23]〈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原文節錄如下：

> 我們並不否認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如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正確指出的， 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思想方面，都還帶有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資產階級的法權」的不平等，還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還不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馬克思的這段話，有沒有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法權，資產階級的不平等的等級制度，根本不能破壞，反而應當把它制度化、系統化、更加向前發展呢？是不是只應當片面地強調「物質利益」原則，而不應當從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強共產主義的教育，為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進行鬥爭呢？不是別人，而是馬克思本人，答復了這種問題。他在「法蘭西內戰」 一書中，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他特別著重地讚揚了巴黎公社的英雄們採取的這種措施：「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及支付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請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公社所採取的革命措施，難道不恰恰是徹底破壞資產階級的等級制度，並不講究什麼物質利益原則嗎？難道馬克思以及後來的恩格斯列寧都再三強調這條經驗的時候，他們不記得還有資產階級的法權等等嗎？[24]

這篇文章深獲毛澤東好評，並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外，並親筆爲張春橋的文章寫下一段編者按：

> 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

[23]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06-108。

[24]〈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1958 年 10 月 13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

懂，很好讀。[25]

1958 年 10 月毛澤東在關於到河南遂平調查人民公社問題給陳伯達的信中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想了一下，你和張春橋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衛星公社進行調查工作為適宜，不必聽廿一日劉子厚同志的報告。集中精力在衛星公社調查七天至十天，為杭州會議準備意見，很有必要。可帶李友九去幫忙。如同意，請告訴葉子龍同志，為你們調一架專機即飛鄭州。」[26]1958 年 11 月 6 日在對〈山東范縣提出一九六〇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的批語裡也提到：「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返，會後出征，以為如何？」[27]從毛澤東的二份手稿來看，在張春橋發表〈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後，張春橋這個名字在毛澤東的心裡應該已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節 張春橋與江青、于會泳、姚文元

一、張春橋與江青、于會泳

江青原名爲李進，出生於 1914 年，出生地是山東省諸城縣。江青的父親爲木匠，母親曾經當過幫傭。上小學時江青有了一個新的名字李雲鶴，江青在小學五年級時因爲和老師有衝突，所以就退學。1927 年江青和母親到天津和姐姐一起生活，1929 年江青和母親及姐姐又搬回山東省濟南縣，同年江青入山東省實驗劇院學了一年多的戲劇。1931 年江青到青島大學圖書館工作，並加入由劇作家創立的海濱劇社，劇社的宗旨是以表演政治劇爲主，常常到工廠、鄉村表演戲

[25]〈關於轉載《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給吳冷西的信〉（1958 年 10 月 11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頁 447。
[26]〈關於到河南遂平調查人民公社問題給陳伯達的信〉（1958 年 10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 463。
[27]〈對《山東范縣提出 1960 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的批語〉（1958 年 11 月 6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 494。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其回憶裡曾提到在張春橋發表了一篇歌頌供給制的文章後，毛澤東對這篇文章感到很滿意，並叫張春橋和他一起去北京，這是李志綏第一次見到張春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4 年 10 月），頁 263。

劇。山東省實驗劇院的學習，青島大學和海濱劇社的歷練，江青養成了對小說和詩歌的喜愛。1933 年 2 月江青在青島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 年江青在上海演出《娜拉》深受好評，並以藍蘋爲藝名，成爲知名的電影演員。1937 年 8 月江青到延安，並且在 1939 年與毛澤東結婚。1950 年江青主導對武訓的調查，並推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63 年開始推動對現代京劇的改革。[28]

1963 年 1 月 4 日柯慶施在一次對上海文藝界講話中發表了今後在創作上要厚今薄古，著重提倡寫解放後十三年的言論後，深受江青的注意。江青在 2 月時又再度來到上海，並且邀請柯慶施在錦江飯店會面，當天與柯慶施同行的還有張春橋，在柯慶施的介紹下，張春橋與江青結識，張春橋將江青當日的談話內容歸納爲以下三點：「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罷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現代戲。這一回，在上海看了滬劇《紅燈記》，覺得很不錯。只是滬劇的地方性太強，觀眾面狹窄，她想改成京劇，推向全國；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掛帥，可以成為她的『基地』。今後，她要常來上海，不是為看病而來，是為建設『基地』而來。」[29]，經由這一次的會面江青對張春橋留下了印象。柯慶施之所以會介紹張春橋和江青認識，除了張春橋是柯慶施的秘書外，張春橋和江青同爲山東人，應該也是柯慶施考量的一點。

江青在 1963 年 12 月 25 日至 1964 年 1 月 22 日，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期間來到上海，江青找張春橋掛帥，擔任《奇襲白虎團》的修改工作，又請他針對毛澤東對《智取威虎山》所提出的意見進行修改。在 1964 年冬天又將淮劇《海港的早晨》交給張春橋改編成京劇。[30]

1965 年 4 月 9 日柯慶施突然去世，張春橋雖然頓失靠山，但也由於江青急於「建設」上海「基地」，在柯慶施去世之後，張春橋取代了柯慶施的角色。江

[28] 羅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著，范思譯，《紅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頁 44、50、53、57、63、100、129、150、160、241、308。
[29]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25-130。
[30] 葉永烈，《江青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年），頁 282-284。

青在柯慶施死後到上海的次數非常頻繁，每次在江青到上海時張春橋都到火車月台上迎接江青。江青後來又將芭蕾舞劇《白毛女》以及山東京劇團的節目《奇襲白虎團》交給張春橋，而張春橋也靠這些改編京劇的機會繼續接近江青，江青把張春橋當成自己親信，也因爲江青的關係，毛澤東對張春橋有了更深的印象。[31]

1965 年，江青把「大批判」[32]的秘密任務交給張春橋，因爲張春橋對京劇完全外行，所以張春橋想找一個可靠又懂京劇的內行人協助他進行「樣板戲」的改編工作。1965 年 6 月，江青在聽《海港》劇組人員進行試唱時，向張春橋打聽于會泳這個人，但因爲張春橋並不認識于會泳，所以沒辦法回答，回到上海市委之後，張春橋立刻派人調查于會泳的來歷。原來，于會泳是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教授民族音樂理論的一名教師。解放戰爭時期，于會泳是膠東文工團團員，蔣介石（1887-1975）軍隊在 1947 年進攻解放區時，他寫了一張紙條及一張附有家裡住址的照片放在行李內，紙條的內容是希望看到他的行李的蔣軍弟兄，能夠將他的這一包遺物，按行李內所附的住址寄給他的母親。但這封信卻掉出行李被別的士兵撿到，所以這張紙條並沒有放進于會泳的行李內，而是放入了于會泳的檔案裡。解放後，進入上海的「第一期音樂教育幹部訓練班」，在學習了一年之後，被分配至上海音樂學院。在《海港》劇組成立之後，因爲于會泳懂對京劇有一些瞭解，所以被調去爲部分唱腔作曲。他不僅能依照江青對京劇的見解來分析京劇唱腔與對白，而且還能分析出江青爲什麼要這樣改，並寫成文章發表在上海戲劇雜誌上，因爲文章的內容跟「樣板戲」相關，所以有人將這篇文章送給江青過目。正當江青正認爲張春橋對京劇外行時，發現上海有個「內行人」，同時張春橋也希望有個對京劇內行的助手，所以，張春橋決定提攜于會泳。因爲受到江青和張春橋的拔擢，于會泳在幾年間成爲上海市文化局黨委書記、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文化部部長及中共中央委員。[33]

---

[31] 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黨史博采》，頁 12。

[32] 指進行〈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事。

[33]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44-150；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1 月），頁 328-334。江青對於「樣板戲」的性質及其改革目的，曾經很坦白地向演員們提出。她說：「你們不要以爲我在這裡搞戲。我是在這裡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戰鬥；

二、張春橋與姚文元、江青

姚文元[34]在北京《文藝報》1955 年 1、2 期的合刊上以《文藝報》通訊員身份，發表了〈分清是非，劃清界限！〉[35]，文中不僅斥罵胡風（1902-1985），也批評了《文藝報》。[36]這篇文章表明了姚文元在文藝理論方面的政治上的立場，在當時引起了文學藝術界很大的回響。[37]當上海文藝界召開批判胡風大會時，姚文元也成爲上台發言者之一，會上姚文元指胡風以斷章取義、張冠李戴、硬搬教條來歪曲馬克思主義，姚文元的言論引起張春橋的注意。[38]會後張春橋請《文藝月報》[39]副主編王若望刊登姚文元的發言稿，1955 年 3 月號《文藝月報》刊出姚文元這篇名爲〈胡風歪苗馬克斯主義的三套手段〉的文章，這篇文章讓姚文元在全國文學藝術界出了名，受到重視。[40]3 月初張春橋請姚文元到《解放日報》辦公室，張春橋在了解了姚文元的經歷、家庭、工作之後表示希望他以後要多注意政治，並請他參加《解放日報》批判胡風的座談會及擔任該報的文藝理論通訊員。[41]在張春橋的推薦下姚文元於 3 月 15 日在《解放日報》發表一篇名爲〈馬克斯主義還是反馬克斯主義？－評胡風給黨中央報告中關於文藝問題的幾個主要論點〉，此外，張春橋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將姚文元的文章推薦給《文匯報》，在張

教導大家很好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實踐論』等光輝著作，用光芒四射的毛澤東思想武裝演員們的頭腦，使他們明確了前進的方向，增添了鬥爭的勇氣。」。江青同志論文藝，頁 19。

[34] 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 20 廿紀 20 年代中國文壇上的左翼作家，1927 年經由潘漢年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與魯迅、胡風、夏衍、馮雪峰、丁玲等左翼作家交往密切。後來，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後在獄中寫下了〈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成了叛徒，這一段往事成了日後姚文元在政治生命上揮之不去的陰霾。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上），《黨史博采》，期 3（2006 年），頁 31。

[35] 姚文元在發表此文以前是胡風的追隨者，姚文元之所以會轉向，主要是受到 1954 年 12 月 10 周揚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們必須戰鬥〉的影響，在胡風尚未被定爲反革命集團的首要份子之前，周揚已經使用「反動」一詞來稱呼胡風，爲了怕受到胡風的牽累，姚文元轉而成爲胡風的批判者。霞飛，〈姚文元與胡風〉，《黨史博覽》，期 1（2005 年），頁 52。

[36] 葉永烈，《姚蓬子與姚文元》（台北：曉園出版社，1990 年 2 月），頁 125。

[37]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上），《黨史博采》，頁 32。

[38] 葉永烈，《姚蓬子與姚文元》，頁 127-128。

[39] 《文藝月報》在當時的上海是頗具影響力的文藝刊物，主編是巴金，副主編是唐弢及王若望。葉永烈，《姚蓬子與姚文元》，頁 128。

[40] 霞飛，〈姚文元與胡風〉，《黨史博覽》，頁 53。

[41]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上），《黨史博采》，頁 33。張春橋喜歡有著小辮子可以捏在手心的青年，以便讓他們言聽計從，因爲姚文元父親姚蓬子曾是叛徒，所以，張春橋才會看上姚文元。葉永烈，《姚蓬子與姚文元》，頁 132。

春橋的幫助下姚文元在具有全國影響力的《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文章，使得姚文元真正步入全國文壇。[42]1955 年 6 月 1 日張春橋親自審定、推薦的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胡風反革命兩面派是黨的死敵〉[43]在《人民日報》刊出，一時間，姚文元聲名大噪，成了反胡風的英雄。[44]1955 年姚文元因爲父親姚蓬子（1891-1969）捲入「胡風分子」、「潘漢年分子」事件而沉寂了一段時間。[45]

1956 年 5 月姚文元在張春橋的引薦下進入《萌芽》雜誌工作。[46]1957 年 6 月張春橋將反右派鬥爭即將要開始且第一炮就是要轟《文匯報》的消息告訴姚文元，姚文元寫了內容爲批評《文匯報》的文章〈錄以備考－讀報偶感〉[47]，這篇文章在 1957 年 6 月 10 日的《文匯報》刊出，毛澤東注意到這篇文章，並要求《人民日報》轉載，6 月 14 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此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在新聞節目中摘要播發。[48]當日《人民日報》也刊登毛澤東所寫以「本報編輯部」署名的〈《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該文裡寫到：「**姚文元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這個明顯的和有害的傾向，是篇好文章**」[49]在這二篇文章發表後柯慶施約見姚文元，希望以後藉由他的名義發表文章。1958 年上海市委創辦理論刊物《解放》，姚文元在該雜誌擔任文教組長，從此之後，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接觸就更爲密切

---

[42]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上），《黨史博采》，頁 33。
[43] 姚文元在這篇文章裡除一再強調胡風反黨集團是極端卑鄙的兩面派外並極力要求把胡風反黨集團全部陰謀活動徹底追查清楚。姚文元，〈胡風反革命兩面派是黨的死敵〉，人民日報 49-97：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0&SelectID=2&ChannelID=5020&Page=1（2007/04/07）
[44] 葉永烈，《姚蓬子與姚文元》，頁 135-136。
[45] 葉永烈，《姚蓬子與姚文元》，頁 140。1955 年 5 月底時姚蓬子以因爲胡風及潘漢年的關係被逮捕審查，6 月時姚文元也被審查，受審時姚文元表示自己並不知道父親的叛變事情，所以才會在填履歷史說自己的父親是黨外民主人士，進步作家，對於父親與胡風之間的往來並不清楚，他自己雖然讀胡風書，但他是批判的讀，爲了宣示自己的清白，姚文元與自己的父母親斷絕往來。11 月姚蓬子除了曾是叛徒這個舊帳外，並沒有被審查出和「胡風反革命集團」、「潘漢年反革命集團」有聯繫，所以就被送回上海，此一事件落幕後，姚文元又繼續寫批判胡風的文章。霞飛，〈姚文元與胡風〉，《黨史博覽》，頁 54。
[46] 葉永烈，《姚文元與姚蓬子》，頁 145。
[47] 這篇文章提到同樣的一條消息經過不同的編排方式其價值會差了十萬八千里，藉由這件事批評《文匯報》。姚文元，〈錄以備考-讀報偶感〉，（1957.6.14），人民日報 49-97：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0&SelectID=2&ChannelID=5020&Page=1（2007/4/7）
[48] 葉永烈，《姚文元與姚蓬子》，頁 157、159。
[49]〈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1957 年 6 月 14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了。[50] 1961 年《解放》停刊後，在張春橋建議、柯慶施點名下姚文元於 1962 年到《解放日報》工作，在張春橋的安排下擔任編委兼文藝部主任，姚文元常在報上出頭而張春橋則是擔任幕後指揮者。[51]

1962 年 7 月 6 日北京京劇團演出《海瑞罷官》，江青在觀賞此劇一個多月後，在與中宣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談話時，提出了批判《海瑞罷官》的主張，而部長們根本不理江青，使得江青極為生氣，於是，江青決定自己找人撰寫批判文章，起初江青找了李希凡（1927-），但李希凡不敢進行此事，於是江青轉而求助上海。1963 年 5 月 6 日，在柯慶施的幫忙組織下，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文章〈"有鬼無害"論〉一文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從此， 江青便把所有希望放在上海。[52]

1965 年初，在江青的策劃下，把批判《海瑞罷官》這個任務交給柯慶施，張春橋接下此任務後，找來文人姚文元進行撰寫批判《海瑞罷官》一事。姚文元在上海市委寫作班進行這項工作，張春橋將所收集、整理的明史資料交由寫作班的「羅思鼎」小組負責幫忙，這篇文章是由毛澤東親自審定過的，經過十次的修改過後， 1965 年 11 月 10 日，由姚文元署名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在上海《文匯報》。[53]

關於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事，江青在 1967 年 4 月 12 日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裡明白的指出：「**1962 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真正解決戰鬥的文章，是在上海**

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頁 509。

[50] 葉永烈，《姚文元與姚蓬子》，頁 154、168；霞飛，〈姚文元在 1957 年〉，《黨史博覽 》，期 9（2005 年），頁 52。其實在 1957 年 2 月 6 日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教條和原則－和姚雪垠先生討論〉一文攻擊姚雪垠時就受到毛澤東的注意，因為受到毛澤東的注意所以上海市委派姚文元去參加全國市委宣傳會議，3 月 10 日毛澤東在接見上海代表團時又再一次提到姚文元，並讚提他。夏國勝，〈姚文元"成長"三步曲〉，《黨史文苑 》，期 5（2004 年），頁 54。

[51] 葉永烈，《姚文元與姚蓬子》，頁 183-184。

[52]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50-154。

[53]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4-5；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12 月），頁 1397；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中），《黨史博采》，期 4（2006 年），頁 49。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10 月），頁 4-5；埃德加・斯諾（美）著、賀和鳳譯，《漫長的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80-84。

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主席就駁我說，我就要看，並且還說要保護幾個歷史學家。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彭真提出的，他說我把整個歷史學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無是處。這真是委曲了我。我說我能保留我的意見嗎？主席說：你保留意見可以。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裡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保留意見，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 ，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54]1967 年 2 月 3 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卡博及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55]對於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事，曾發表了以下的談話：「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以後，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后頭我說印小冊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

[54]〈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 年 4 月 12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關於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相關問題可參閱丁望主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三卷）彭德懷問題專輯（增訂二版）》（香港：明報月刊社，1979 年 2 月），頁 51-149。

[55]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頁 123。

因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56]從江青和毛澤東的談話反應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在江青的策劃以及毛澤東的多次修改下，由張春橋和姚文元完成了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在得知毛澤東認爲以彭真（1902-1997）爲首的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後，江青又把批判的矛頭瞄準北京市委，以批判《三家村札記》[57]做爲突破口，江青、張春橋授意姚文元寫文章，全面批評「三家村」。[58]在經過江青及張春橋動筆進行修改、補充後，將這篇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完後覺得題目太過於冗長，將原本的〈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標題裡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刪掉， 這篇文章以姚文元爲署名在 1966 年 5 月 10 日的《文匯報》刊出。[59]這篇文章將鄧拓（1912-1966）、吳晗（1909-1969）、廖沫沙（1907-1990）打成反革命集團：「鄧拓、吳晗、廖沫沙這個時期所寫的大批向党進攻的文章並不是各不相關的“單幹”，而是從“三家村”的合夥公司裏拋出來的，有指揮，有計劃，異常鮮明地相互配合著。吳晗是一位急先鋒，廖沫沙緊緊跟上，而三將之中真正的“主將”，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則是鄧拓。」[60]在文章的末端還指出要將指使的後台人物找出來：「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

---

[56]〈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速記草稿，未經本人審閱）（1967 年 2 月 3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李志綏在其回憶錄裡指出毛澤東告訴他，〈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江青和張春橋共同商量，由姚文元執筆寫成的，毛直到要刊出前才看到這篇文章，事前並不知道內容。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26-427。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58。

[57]《三家村札記》簡稱「三家村」，鄧拓（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吳晗（北京市副市長）、廖沫沙（北京市委委員、市委統戰部長）三人將文章發表在《前綫》所開設的一個專欄裡，這個專欄就稱爲《三家村札記》，三人共同取一個名爲吳南星的筆名發表生動活潑、務實、講真話、文鋒犀利的雜文，因爲與江青的思維本質上不同，當江青知道《三家村札記》的作者是鄧拓、吳晗、廖沫沙後，便認定這三個人是彭真、劉少奇的人馬。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中），《黨史博采》，頁 51。

[58]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中），《黨史博采》，頁 50-51。

[59] 葉永烈，《姚蓬子與姚文元》，頁 249。

[60] 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1966.5.1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61]這篇文章後，大火果真燒到了姚文元在文章裡所指的「指使」、「支持」的「三家村」的後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彭真。[62]連寫了二篇對江青、張春橋有功的文章後，日後在江青、張春橋的提攜下姚文元得以進入中央文革小組。[63]

第四節 進入中央文革小組

1964 年在中共中央及毛澤東的指示下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擔任，副組長由政務院副總理陸定一（1906-1996）擔任，組員分別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1908-1989）、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1919-2002）。[64]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匯報》刊登姚文元所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名批評著名歷史學家同時也是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身爲「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並不知道這篇文章是由毛澤東同意後發表的，所以並沒有在北京各報轉戴，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後請上海人民出版社將這篇文章印成單行本發行，並且批評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澤東在杭州發表談話時提到：「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慶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95 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65]對於毛澤東的批評彭真並不贊同，所以，12 月 22 日，彭真向毛澤東表示，經過調查後並沒有證據顯示彭德懷（1898-1974）和吳晗並沒有任何組織上的關聯。[66]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引起各界的政治批判，1966 年 2 月 3 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召開會議，2 月 4 日根據討論結果，由彭真所領導的

---

[61] 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1966.5.1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2] 葉永烈，《姚蓬子與姚文元》，頁 253。
[63]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下），《黨史博采》，期 5（2006 年），頁 39。
[64] 天磨之，〈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前後〉，《黨史天地》，期 11（2005 年），頁 4。
[65]〈毛澤東在杭州的談話〉（1965 年 12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6]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396-1401。

「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起草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會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希望將這場批判由政治批判轉爲學術批判。2 月 8 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時到武漢對毛澤東進行彙報，會中毛澤東說：「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同廬山會議、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的。對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絕不是匆促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彭真說要對左派左風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67]毛澤東並沒有對〈二月提綱〉表示不同的意見，所以，彭真以爲毛澤東同意這個提綱。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布〈二月提綱〉，這個舉動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68]

1966 年 3 月 11 日，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許立群（1917-2000）在彭真的授意下，打電話問上海市委爲什麼沒有事先知會姚文元將在上海發表文章。對於這件事情毛澤東感到很不高興。[69]3 月 28 日到 3 月 30 日毛澤東曾多次和康生、江青、張春橋進行談話，對〈二月提綱〉提出嚴厲的批判：「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70]，並且要彭真針對請許立群打電話給上海市委一事，向上海市委道歉。[71]3 月 31 日康生向周恩來、彭真等中央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幾次的談話內容。[72]4 月 9 日至 12 日，康生將毛澤東的指示傳達給參加中央書記會議上的每一個人，會中決定由陳伯達負責起草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陳伯達找了吳冷西和王力[73]（1922-1996）一

[67]〈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宮〉（1966 年 2 月 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8] 天磨之，〈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前後〉，《黨史天地》，頁 9；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401-1403；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31-432；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2 月）頁 615-616。叢進在《曲折發展的歲月》裡提到會中毛澤東在問了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後，毛表示吳晗經過批判後仍可以擔任北京副市長，毛還表示「要害是罷官」的發明權是康生。康生在 1964 年即提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的看法，當時毛澤東可能是沒注意，也可能是沒同意，所以沒表示什麼。1966 年 2 月 8 日毛表示「要害是罷官」的發明權是康生，當時康生還不敢承認，不久後，康生就以發明人自誇。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 616。
[69]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406。
[70]〈與康生等談話紀要〉（1966 年 3 月 28-3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71]〈與康生等談話紀要〉（1966 年 3 月 28-3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72] 尹家民，〈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設立〉，《黨史博覽》，頁 34。
[73] 王力，原名王光賓，文革前曾任中聯部副部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文革時擔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起參與這項工作，並在 14 日時將稿子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74]此時毛澤東決定在杭州召開批判彭真的常委擴大會議，並在上海成立起草小組，成員有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尹達（1906-1983）、陳亞丁（1920-？）、關鋒（1918-）、戚本禹（1931-）、穆欣（1920-）。起草小組的任務就是將毛澤東修改過後的稿子順一順、理一理，這個稿子經過毛澤東多次修改後才通過。[75]1966 年 5 月 4 日到 5 月 26 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5 月 16 日通過經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這次會議裡「二月提綱」被撤銷，「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被撤除，另外成立 隸屬於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76]

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8 月 2 日，中共中央補發通知，正式宣佈中央文革的組長為陳伯達，顧問是陶鑄、康生，副組長為江青、王任重（1917-1992）、劉志堅（1912-2006）、張春橋，組員為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77]中央文革小組中組長和副組長都有一定的資歷，組長陳伯達在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身邊的第一號大秘書，建國後長期參與思想大化戰線的領導，是中央的筆桿子。顧問陶鑄和康生在黨內都是老資格的人，有一定的理論底子。副組長江青是第一夫人，王重任一直是毛澤東信得過的人，除了資深外，當時所擔任的職務也很高，劉志堅是部隊政治工作領導幹部，建國後是中將。雖然當時的張春橋資歷淺、職務低，且名列副組長的最後一名，但因為身為組長的陳伯達管不了江青，江青成了實際上的組

[74]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 6 月修訂版），頁 260。
[75]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頁 585、587。關於「五‧一六通知」的另一個說法是 1966 年 4 月第二次杭州會議時，根據王重任紀錄的要點所整理出來的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來，這一份紀錄和後來的正式通知的變動很大，根據康生的說法是一共修改了八次。陳曉農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一書裡表示由於參加起草的人都參與一部分的起草工作，所以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起草的整個過程。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張華、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頁 595；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266。
[76]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408。
[77]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60；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黨史博采》，頁 13。

長，而張春橋常是幫江青出主意的人，所以，張春橋在中央文革實際上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78]

出任中央文革副組長對張春橋而言是讓他得以跨出上海進入中央的重要一步，尤其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文革成員得以列席政治局會議，張春橋更向中共中央邁進一步。

[78] 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黨史博采》，頁 13。

第三章　張春橋與上海風暴（1966~1967）

第一節　安亭事件

1966 年 11 月 9 日由王洪文所領導的跨行業、跨單位造反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1]當時的上海市市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曹荻秋（1909-1979）根據中共中央 1966 年 9 月 14 日「 抓革命促生產」的精神及中央常務書記陶鑄的支持，對「工總司」採取「三不方針」[2]，所以曹荻秋並沒有去參加「工總司」的成立大會，於是潘國平（1946-）、王洪文等人率領大批人馬前往上海北站，藉紅衛兵可免費串聯之名，衝上月台，登上一列北上列車，列車抵達安亭站時，被上海鐵路局下令攔阻，於是王洪文、潘國平所率領的一千多名上海造反派工人滯留在安亭，為了向上海市委施壓，決定臥軌攔車，這一個舉動導致滬寧線被堵塞了 31 小時 34 分。[3]

關於安亭事件中斷行車狀況，王年一在其所編寫的〈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裡指出：「1966 年 11 月 10 日淩晨，自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一夥，衝進上海火車站，強行登上 602 次列車，開車不久，接到上級指示：應就地解決問題，不能進京。於是由鐵路領導決定將 602 次列車扣在安亭站。602 次列車上的人員則臥軌攔車，甚至連乘有外賓的 14 次滬京特別快車也不讓通過。這樣，就將列車攔阻在安亭，造成了滬寧線行車中斷。從 11 月 10 日上午 9 時 20 分至 11 月 11 日下午 16 時 54 分止，共中斷行車 31 時 34 分」[4]這個消息很快的就傳到中共中央，周恩來和陶鑄前往中央文革辦公處進行磋商，周恩來指示以陳伯達名義致電中共中央華東局韓哲一，要華東局及上海市委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也不能承認臥軌攔車的行為是革命行動。同時也要做說服上海工人的工作，希望他們不要影響全國交通，應該回工廠抓革命、促生產。隨後中

---

[1]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88。

[2] 三不方針是指：不參加「工總司」9 日的成立大會；不承認「工總司」這個造反組織；不支持「工總司」的活動。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89。

[3]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28-129；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89-90。

[4] 轉引自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 6 月修訂版），頁 310-311；王銳，〈「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和再研究〉，《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總期 55（2006 年 10 月），二十一世紀網路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607039.htm（2006/11/13）

央文革決定派張春橋去上海處理這件事。[5]

11 月 10 日晚上張春橋帶著陳伯達所寫的電文[6]搭乘飛機抵達上海，準備和在安亭的造反工人談判，希望他們回上海。[7]在陳伯達的指示下張春橋到上海後並沒有直接與上海市委連絡，而是直接去了安亭與在安亭的造反工人談判，[8]張春橋抵達安亭車站後張春橋與「工總司」代表潘國平等人談判，答應他們回到上海後會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9]

11 月 13 日上午徐景賢告訴張春橋說黃金海等帶領一批造反工人在文化廣場，要求與張春橋談判，張春橋答應了，曹荻秋、陳丕顯得知張春橋將和「工總司」談判的消息後，11 月 13 日上午上海市委召開市委常委會，商擬「工總司」

---

[5] 高文謙，《晚年周思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3 月第 36 版），頁 163；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88-89；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 月），頁 189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9 月），頁 19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28。關於派張春橋到上海處理安亭事件一事，陳伯達曾於 1979 年 11 月 29 日被審問時指出是周恩來、陶鑄派張春橋去上海處理這件事的。陳曉農，《陳伯達的最後口述回憶》，頁 312。而嚴家其、高皋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裡則是說張春橋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回上海處理安亭事件。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台北：遠流出版社，1990 年），頁 163。王力在《王力反思錄》一書裡則是說，派張春橋到上海去處理安亭事件是李富春決定的，而非現今一般說法由中央文革小組決定的。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頁 653。王銳在〈「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再研究〉一文裡提到，現今主流專家學者傾向支持張春橋是由中央文革小組派出，但王銳本人則認為中央派張春橋去上海的主要任務是「恢復通車，鐵路不能中斷」，這一問題是中央和國務院管轄的範圍，所以王力及陳伯達的說法比較可信。王銳，〈「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和再研究〉，《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總期 55（2006 年 10 月），二十一世紀網路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607039.htm（2006/11/13）

[6] 陳伯達的電文內容中提到：你們這次的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也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陳曉農，《陳伯達的最後口述回憶》，頁 311-312。

[7]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9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28。

[8] 陳曉農，《陳伯達的最後口述回憶》，頁 312。

[9]〈張春橋接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部分工人講話〉（1966 年 11 月 1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軍區機關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 年 5 月 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92-93。在葉永烈所著的《張春橋沈浮錄》裡指出在安亭車站時王洪文提出五個條件的要求，但張春橋因為想打倒上海市委，因而表示支持王洪文的請求，陳丕顯回憶錄裡也提到張春橋暗示王洪文先將安亭造反工人帶回上海，回上海後會解決他們所提出的要求，但在徐景賢的回憶錄裡卻表示王洪文曾跟他說在安亭車站時因為身體不適，所以代表談判人是潘國平而非王洪文，1966 年 11 月 13 日與張春橋簽定工總司所提出的五項條件的也是潘國平。潘國平在日後接受采訪時也表示王洪文並沒有在 1966 年 11 月 13 日那天下午到文化廣場。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台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年 9 月），頁 165-166；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92-93；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黨史博采》，期 6（2005 年），頁 14；煥然，〈上海安亭事件始末〉，《黨史天地》，期 9（2004 年），頁 11；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1 月），頁 29；尹家民，〈"安亭事件"：張春橋的一次政治賭博〉，《黨史博覽》，期 5（2006 年），頁 12。

可能會提出的種種要求[10]，會中決定不承認「工總司」爲合法的革命組織，也不承認「安亭事件」爲革命事件，會議中曹荻秋並打電話給中央文革，請求中央文革進行裁決，接電話的陶鑄同意曹荻秋的意見，同時陶鑄也在電話裡向張春橋表明自己的意見，張春橋也同意按陶鑄的意見。[11]13 日下午張春橋到上海文化廣場和從安亭回來的工人座談，並且當眾簽字同意「工總司」的「五條要求」。[12]

張春橋在「工總司」的「五條要求」上簽字的消息傳到陳丕顯、曹荻秋那裏後，他們打電話給陳伯達，陳伯達表示同意張春橋的作法，於是他們又打電話給陶鑄，陶鑄則仍然堅持自己原來的意見，在兩個中央文革領導人持不同的兩個意見時，曹荻秋要求中央給一個統一的、最終的意見，問題反映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這一個問題，會中周恩來、陶鑄堅持不承認「工總司」，陳伯達、江青及其他出席的中央文革成員則支持張春橋的做法，政治局常委會將這二種意見彙報毛澤東，毛澤東表示支持陳伯達、江青的意見，同意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毛澤東以「**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13]，批准了張春橋的處理。[14]張春橋在安亭事件的處理上符合毛澤東的文革大戰略，深得毛澤東的贊同，以往毛澤東對張春橋的賞識主要是在理論上，安亭事件讓毛澤東見識了張春橋在處理重大事件的能力。

關於毛澤東爲何爲選擇支持張春橋而不支持陶鑄、李富春、周恩來等常委，

[10] 近年來有人採訪潘國平，潘國平對採訪者說張春橋曾派徐景賢去巨鹿路找他，他說張春橋要他來了解我們有那些要求，經過潘國平口述後徐景賢歸納出五條，準備回去向張春橋彙報，並且說當天下午張春橋將在文化廣場接見我們。尹家民，〈“安亭事件”：張春橋的一次政治賭博〉，《黨史博覽》，頁 12。這篇採訪指的應該是由亞衣（美國人）採訪潘國平，而將其訪談記錄在所著的《流亡者訪談錄》一書。亞衣，〈“潘司令”談張春橋之死—要爲“四人幫”翻案〉，《議報》期 200，http://www.chinaeweekly.com（2006/11/13）。

[1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29；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93-94；尹家民，〈“安亭事件”：張春橋的一次政治賭博〉，《黨史博覽》，頁 12。

[12] 尹家民，〈“安亭事件”：張春橋的一次政治賭博〉，《黨史博覽》，頁 7-11；煥然，〈從工人到黨中央副主席躍變的“文革”神話序曲－“安亭事件”始末〉，《黨史縱橫》，期 10（2004 年）頁 25-26；煥然，〈陶鑄在“中央文革”〉，《黨史天地》，期 5（2004 年），頁 15。五條要求指的是 1.承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合法的組織；2.承認“一一.九”大會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問題派代表－張春橋同志加的）；3.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完全負責；4.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5.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張春橋接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部分工人講話〉（1966 年 11 月 1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尹家民，〈“安亭事件”：張春橋的一次政治賭博〉，《黨史博覽》，頁 12。

[13]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45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3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64。

[14] 煥然，〈上海安亭事件始末〉，《黨史天地》，頁 11；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頁 592；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94-96。關於 11 月 1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大會情形，可參閱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655。

江青起了關鍵性的作用，13 日晚上陳丕顯打電話給陳伯達，對張春橋簽字一事表達抗議，並說他已經跟陶鑄報告過了。接完電話後，陳伯達與王力一起去找江青，並把陳丕顯來電的內容告訴江青，除了問江青的意見外，也要江青將此事轉達給毛澤東知道。江青態度非常鮮明，認爲陳丕顯對待張春橋的態度是不對的。她說：「我看上海市委就是要整。我馬上報告主席，連夜報告，不能讓陶鑄先報告。」[15]王銳在〈「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和再研究〉一文裡表示，江青在 13 日晚上求見毛澤東一事，在毛澤東之所以會肯定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至於江青和毛澤東到底談論了哪些事情，因爲目前並無相關的史料，所以，至今仍是一個謎團。[16]

在安亭事件中張春橋之所以敢先斬後奏一事有不同的兩種說法，有一種說法是張春橋自己擅自決定的，另一種說法則是張春橋事先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呂相友在《中國大審判》一書中指出張春橋曾對王洪文說：「我是提著顆榔頭簽字的，我想過，可能弄不好坐班房。他還對老婆說：處理這件事，要麼記一大功，要麼犯一大罪。」[17]而張春橋在 1966 年 11 月 16 日接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部分工人講話時談到也談到：「我組織手續並不完備，沒有和華東局同志商量，也沒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沒有和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因為來不及，就下了決心。然後從文化廣場回到我住處，才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並且也把五條協議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報告給了他。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就討論我在文化廣場所講的五條，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認為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是完全正確的，是應該這樣做的，對於你們的組織，你們的行動作出了判斷完全正確的，陳伯達、江青同志都參加了會議，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是正確的」[18]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則是認爲：「張春橋之所以敢這樣做，並非是自作主張，或是像後來所宣傳的那樣"先斬後奏"，而是在事先繞過中央包括自己的頂頭上司、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直接請示毛澤東本人。這一點，他自己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簽字前同工人的座談中轉彎抹角地露了

---

15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655。

16 王銳，〈「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和再研究〉，《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總期 55（2006 年 10 月），二十一世紀網路版：hppt://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607039.htm（2006/11/13）

17 呂相友，《中國大審判-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圖文紀實》（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71。

18 〈張春橋接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部分工人講話〉（1966 年 11 月 1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出來，說：『安亭事件向主席報告了』，『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樣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很顯然，在文革那種人人自危的年代，如果沒有事先得到毛的首肯的話，張春橋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擅作主張的。」[19]

關於張春橋到上海與在安亭的造反工人談判情形，王年一在〈關於"安亭事件"的一些資料〉裡提到在安亭現場有一位名義上是《解放日報》記者而實際上是中央文革駐上海聯絡員甄文君，他在 11 月 12 日給周恩來的電話回報裡指出：

張春橋同志昨晚 9 點多抵滬，即赴安亭車站，跟 9 個工人代表談判，談判中間有波折。9 人中有 3 個同志同意說服工人回上海，6 個不同意。一直談到天亮，未達成協定，他們堅持要步行去京。

今早 7 時，春橋同志又到現場找工人談話。

工人對伯達同志的信（按即電文）有意見，說只講生產，不講革命，他們不同意。有些人談起來情緒激昂，進行控訴。

現在看，有少數人是堅決主張到北京的，他們起領導作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上海聯絡站支持他們。

第二種人是多數人。他們提了 5 個條件，如答應他們，他們就回上海……第三種人，也是少數人，主張應聽中央的話，回上海去。但他們不占領導地位。據有些工人私下談，他們有顧慮：這次到安亭有七八十個單位，除了一個單位來的人很多，有 300 多人外，都是零星的來一些人，其中有些還是受過批評的，擔心回去後被圍攻、挨整。

擠在安亭的工人，生活問題市委已注意，不會出問題。

鐵路交通，昨已恢復，工人的那一列車，停在叉道上。

張春橋同志還在安亭。[20]

而王力在《王力反思錄》一書裡提到：

十三日晚，我正在陳伯達那裡，接到張春橋的電話，陳伯達接的，我也聽到了。電話裡聽到張春橋不是那麼得意，很狼狽的樣子。他說：『我不能不簽字』，工總司五條要求我不能不簽字，也來不及請示華東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組，不然車就不能通，他們不肯回上海。我一回上海就去了安亭，有廣播車反復念中央文革的電報，請他們回去，有問題到上海談，廣播後我只強

[1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64。
[20] 轉引自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312-313。

調一條，有什麼問題回上海再談，並說，我不是以上海市委書記的身份，是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處理問題的。當時我被包圍了，他們提出的五條要求我簽字了，不簽不行，不簽就不通車。』[21]

張春橋本人事後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則是表示：

如何對待群眾運動，這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導我們的也是如何對待群眾問題。我想舉幾件事來說明這個問題。

一件是對安亭事件的處理。

在上海一談到工人運動，就會談到安亭事件……

對待這件事，實際上有兩條方針、兩條路線。一條是鎮壓，一條是支持。主張壓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鑄和上海的陳丕顯、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處理這件事，陶鑄給的方針，就是把工人趕回上海，對他們的組織，不支持，不承認。我趕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談話，勸他們回上海，理由無非是生產要緊啦！鐵路不能斷啦！等等。這些大道理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沒有用。我就平心靜氣的聽，聽他講，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著開群眾大會，一直開到下午四點，幹了十六個鐘頭，工人才答應回上海。

從這個談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廠裡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來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們為了造市委的反，就組織了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按著陶鑄那個方針做，工人根本不會回上海……是工人群眾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導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關頭沒有犯大錯誤。我答應認真負責地解決他們的問題，才說服了他們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們的代表繼續談。把情況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現象，是結果，工人起來鬧革命才是本質，才是根源。決定承認他們的組織是革命的組織，合法的組織，只是勸他們，火車中斷是不好的，以後不要採取這種手段，沒有過多的責備他們。[22]

---

[2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654。

[22]〈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 年 4 月 1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從記者甄文君給周恩來的電報、王力在《王力反思錄》裡提到張春橋打電話給陳伯達、張春橋在去上海之前曾見過江青以及張春橋本人事後的說法，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極有可能因為他在出發前已和江青有所聯繫，在安亭時和造反派工人進行談判時並不是很順利，以及他本人對毛澤東性格的研究，所以他才敢冒著極大的危險下簽下「工總司」所提的五個條件，張春橋在簽下「工總司」所提的五個條件後，心中仍有些擔心，等到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作法後，張春橋才放下心中的擔憂。[23]

在毛澤東的壓力下，曹荻秋親自於 11 月 23 日代表市委簽字同意「工總司」的五條要求，安亭事件就在毛澤東的一句話下劃下了句點。[24]在張春橋「先斬後奏」下，王洪文的「工總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成為支持張春橋的一股強大政治力量。[25]

安亭事件促成上海文革中最重要的二位人物張春橋和王洪文的相遇，文化大革命中重要的一股政治勢力的形成就是從這次見面開始的，這次見面為日後形成的「四人幫」奠定基礎，藉由這次事件也讓中央文革派找到了一股真正能夠為他們所用的社會力量，而這股社會力量不僅左右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形式，也左右全國的文他大革命形式。[26]

毛澤東在對紅衛兵感到失望，把目光轉向工人時，安亭事件成為工人造反派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的典型，並且依照他靠工人造反來推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掀起 1967 年上海奪權風暴。[27]

第二節　上海一月革命

一、後院起火

1966 年 11 月 20 日聶元梓[28]（1921-）到上海進行活動。11 月 24 日張春橋在

---

[23] 因為目前並無史料談及張春橋在去上海之前和江青到底談了哪些問題。針對江青在「安亭事件」所起的關鍵作用，王銳在〈「安亭事件」再認識和再研究〉一文裡有較詳盡的討論。可參閱王銳，〈「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和再研究〉，二十一世紀網路版：hppt://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607039.htm（2006/11/13）

[24]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68-170。

[25] 李艷君、婉君，〈張春橋與“安亭事件”〉，《黨史博采》，期 09（2004 年），頁 23。

[26] 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台北：時報文化，1996 年），頁 115。

[27] 煥然，〈上海安亭事件始末〉，《黨史天地》，頁 11。

[28] 聶元梓在文革時是北京造反派領袖，1966 年 5 月 25 日與北京大學哲學系六名教授在北京大學共同貼了一張「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被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因而聲名大噪。聶元梓，《文革五大領袖－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1 月），頁 1-17。

上海市的友誼電影院裡對上海造反派講話時點名常溪萍（1917-1968），說她在北大的問題很嚴重，點燃批鬥常溪萍的火苗。[29] 在張春橋回到北京後，希望能夠發動「丁學雷」[30]「羅思鼎」[31]起義，1966 年 11 月「羅思鼎」負責人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北京時，張春橋和姚文元請他轉達希望徐景賢能帶領上海市委寫作班子成員到群眾中，對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執行錯誤路線的上海市委進行造反活動，姚文元也親自打電話向徐景賢表達張春橋、姚文元希望徐景賢帶頭對上海市委進行造反活動。[32]「解放日報事件」[33]12 月 12 日姚文元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告訴他上海寫作組可以準備造反了，12 月 13 日徐景賢到上海寫作組召開全體會議，向與會的人傳達張春橋、姚文元的指示，並決定寫作組將全體一起參與造反行動，後來寫作組與「支部生活」造反派建立聯合陣線，取名爲「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34]12 月 18 日下午市委寫作班在群眾面前批鬥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1915-1989）、常溪萍等人，他們喊出的口號爲：「**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常溪萍**」[35]。大會上市委寫作組發表了「中共上海市

---

[29]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76-177。

[30] 「丁學雷」是指上海市委寫作組，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因爲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所在地在丁香花園旁的一幢小洋樓，在寫作組創立之際，正是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時，所以寫作組的人就取丁香花園的「丁」爲姓，以「學雷」爲名，在上海報刊上以「丁學雷」的署名發表文章。「丁學雷」的負責人是徐景賢，徐景賢是因爲被張春橋看中而被調入上海市委寫作班子。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79-182。關於徐景賢是否受張春橋提攜而進寫作班底，徐景賢在其回憶裡並沒有特別說明，只說在 1963 年市委寫作班成立時，由市委文教書記石西民分管，把他從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調去，又提到張春橋是他的老上級，在市委文藝工作部和市委宣傳部時都當過他的領導。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3-4。

[31] 「羅思鼎」取義於雷鋒的名言：「做一顆永不生锈的螺絲釘」。「羅思鼎」寫作組的負責人叫朱永嘉，原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姚文元在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曾請他幫助查閱明史資料。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79。

[32]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83-184；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5-6。

[33] 指 1966 年 11 月 27 日「紅革會」要求在 11 月 28 日時將第九期刊有一篇〈《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文章的《紅衛戰報》與當天的《解放日報》一起發行，遭到拒絕後「紅革會」（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的紅衛兵被激怒了，11 月 30 日「紅革會」向解放日報社提出三項無理要求：「一、《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內一起發行，版面要與《解放日報》一樣；二、《解放日報》必須全文刊發〈《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一文；三、把市委有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以及市委對報社的指示告訴「紅革會」，這種無理的要求當然又被拒絕，「紅革會」一再被拒絕後就發出勒令，勒令《解放日報》停止發行，「紅革會」的造反得到「工總司」的支持，於是開始了九天九夜圍攻解放日報社事件。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99-105。

[34]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84-186；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05。

[35]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6；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07。關於在市委寫作班所發動的造反活動裡所提出的口號，在葉永烈所著的《張春橋浮沉錄》裡是說這口號是由徐景賢和聶元梓所擬出的，事後張春橋要姚文元打電話給徐景賢，說他們的口號提的很好，四人分四檔，表示是有區別的；在陳丕顯的回憶錄裡則是說這口號是由徐景賢和聶元梓根據姚文元指示所擬定的，事後還受到張春橋多次讚賞；而徐景賢在其回憶錄裡表示在 1966 年 12 月 27 日接到姚文元來電，姚文元說毛主席很欣賞他們所提出的口號，這幾個口號的提法有區別；

委寫作班造反聲明」，並宣布「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在徐景賢造反後，上海市各機關內造反組織林立，讓上海很多機關都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的狀態。[36]

關於聶元梓到底是奉誰指示到上海一事眾說紛紜。根據聶元梓回憶錄裡指出：「我到上海期間，先後見到了張春橋和王洪文。我找張春橋談話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我是應毛主席發動羣眾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指示來上海的，應該向上海市委打招呼。張春橋既是上海市委的，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所以應該首先對他而不是對別人說明來意。第二，瞭解上海發動羣眾的情況和意見。我同張春橋談話開始說明了來意。是毛主席讓我們來串連的。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具體宣傳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37]

王力在其回憶錄裡指出：「現在歷史學家、紀實文學家說聶元梓和張春橋早有勾結，有計劃、有組織地用聶元梓轟上海市，一切都是預謀的、有計劃的，這不符合事實，他們沒有那麼高的預見。……張春橋對聶元梓非常反感，張春橋打電話給我，問怎麼回事？聶元梓為什麼打著“中央文革”旗號？為什麼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講了毛主席指示的幾條，我說沒有交代她有事去問張春橋，是因為張春橋要回來了。也沒有必要，因為她只是代表北大羣眾組織去進行串聯。沒有叫她打著“中央文革”旗號。」[38]

葉永烈所著《張春橋浮沉錄》一書裡則表示，江青派聶元梓從北京到上海，在張春橋的安排下進後住進了衡山賓館[39]，為了「從常溪萍身上，炸開上海市委的缺口」[40]並和張春橋密謀借助「工總司」的力量，在華東師大發動批鬥常溪萍[41]的運動。[42]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裡也指出聶元梓是受到江清的指使

聶元梓在其回憶錄裡對於她到上海進行串連一事，並沒有提到她曾和徐景賢有過見面一事。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86-188；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07；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8；聶元梓，《文革五大領袖－聶元梓回憶錄》，頁 185-191。

[36]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6；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05-10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67-168。

[37] 聶元梓，《文革五大領袖－聶元梓回憶錄》，頁 185-186。

[38]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758-759。

[39] 聶元梓在其回憶錄裡指出她在上海進行串連時是住在華東師大。聶元梓，《文革五大領袖－聶元梓回憶錄》，頁 190。

[40]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76。

[41] 常溪萍，山東萊陽人。193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副部長、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北大社教工作隊黨委副書記、北大社教工作隊九人領導小組成員。聶元梓，《文革五大領袖－聶元梓回憶錄》，頁 192。

[42]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72-176。衡山賓館位於上海市區西南的十五層的高級賓館，建於 1936 年，解放前叫「畢卡索公寓」。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76。

來到上海。[43]

聶元梓在其回憶錄提到，江青曾批評她打中央文革的旗號到上海進行串連，陳丕顯也認爲她是中央文革派來的。[44]關於聶元梓來到上海一事，應該是聶元梓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來到上海，來到上海後因爲曾和中央文革的一些人有所接觸，所以，會有人以爲她是奉中央文革之命來到上海進行串連活動。

二、康平路事件

「赤衛隊」是由上海模範工人楊富珍（1931-）等人所組織的造反團體，這個由 80 萬人所組成的團體是「工總司」最強而有力的對手。[45]1966 年 12 月 23 日「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向上海市委提出含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的群眾組織等八項要求，在迫於無奈下曹荻秋簽字同意，12 月 25 日在「工總司」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在「工總司」的壓力下曹荻秋又宣佈與「赤衛隊」的簽字無效，這個舉動激怒了「赤衛隊」。12 月 28 日「赤衛隊」召集了將近一、二萬名隊員進入康平路上海上委機關，要求曹荻秋重新承認「赤衛隊」所提出的八項要求。[46]張春橋在北京接到馬天水（1911-1988）的彙報，說赤衛隊抄了他在上海的家。[47]12 月 28 日晚上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給王洪文，要王洪文立即向「赤衛隊」發動攻擊，並要人在北京的二兵團司令耿金章趕回上海，「工總司」和「聯絡站」等在衡山飯店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12 月 29 日曹荻秋與「赤衛隊」談判後，決定接受「赤衛隊」的合理要求，正當「赤衛隊」要撤離康平路時，「上海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組織十萬多名群眾包圍康平路。[48]12 月 29 日下午，

---

[43]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32；167。
[44] 聶元梓，《文革五大領袖－聶元梓回憶錄》，頁 191。
[45]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09。
[46]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69。
[47] 關於這件事徐景賢表示，1966 年 12 月 28 日下午時他曾到康平路的大宅，赤衛隊到過張春橋家，但並沒有抄他的家，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家屬都是安全的。見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3。陳丕顯在回憶錄裡也提到，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在一張名爲《造謠派破產》的辟謠傳單上面指出赤衛隊是到過張春橋和柯老家，但並沒有抄家。見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13。
[48]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69；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11-113。在徐景賢的回憶裡指出在 12 月 28 日下午時工總司等造反派已包圍康平路大院，說什麼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他們是來保衛中央文革的，此時，在康平路大院門口「赤衛隊」和「工總司」互相對峙，但他覺得「工總司」的做法很愚蠢，因爲此時的市委大院是座空城，過不了幾天，待在那的赤衛隊會潰散，於是他回去後急著找「工總司」和「二兵團」的領導人，請他們把隊伍撤走，但找不到，所以他決定採文鬥，把矛頭指向市委，從政治上瓦解赤衛隊，後來因爲他接到李文靜的電話，得知張春橋知道赤衛隊提出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後，要徐景賢轉告上海各造反派，不要讓赤衛隊把勝利的果實奪走，接到張春橋的指示後，他和聯絡站的人商量後決定按張春橋的精神指示，正式喊出「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而和赤衛隊起武鬥的是耿金章

張春橋的妻子李文靜（1916-？）在上海接到張春橋的來電：「勝利果實不能被赤衛隊奪走。要告訴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你有沒有辦法通知造反派？還說：現在上海的桃子熟了。這個桃子不能讓陳丕顯摘去，對赤衛隊要加強政治攻勢，要瓦解他們。」[49]李文靜向徐景賢轉達了張春橋的指示，徐景賢和「指揮部」討論後決定在 12 月 30 日凌晨 2 時以「不許赤衛隊抄了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家」爲理由對「赤衛隊」進行圍攻，在這場武鬥裡「赤衛隊」有 91 人受傷，30 日赤衛隊就被擊敗撤離康平路。撤離後的「赤衛隊」，主要負責人被捕或被審判，基層組織被搗毀，總部也被解散。[50]「康平路事件」是全國第一次大規模武鬥，張春橋在 1967 年 3 月 8 日對山西省太原市在京的代表曾表說：「赤衛隊進入康平路，我們就打電話叫造反派趕快參加戰鬥。這次較量是個轉折點。這一仗一打，市委癱瘓了，垮了，講話沒人聽了；赤衛隊也垮了，造反派佔優勢了。」[51]「康平路事件」後，上海市委已變得搖搖欲墜。

三、奪「文匯報」、「解放日報」大權

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澤東在壽宴上發表了一個新的想法：「無產階級一定要把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的那部分權力奪回來，只要把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的權力奪回來，即使亂一點也不要緊，可以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52]。與會的陳伯達、張春橋等文革人士，原本想以這句話作爲 1967 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元旦社論的標題，但怕說的太白，無法讓毛澤東滿意，所以，就另外擬定了一篇名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社論，並將毛澤東的這一個新的想法展現在這篇社論裡，這篇社論是經過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文中提到：「1967 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967 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1967 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工人和農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必須放手發動工農群眾，鬥垮工

在得知張春橋的來電後，不願以文攻，於是增派了大批工人造反派，在不聽勸阻下衝入市委大院，造成九十一人受傷的武鬥事件。事後張春橋打電話問徐景賢有關於康平路武鬥的狀況，並且要他把矛頭對準上海市委，指明這場武鬥是市委挑動群眾鬥群眾而起的，罪魁禍首是上海市委，同時也希望不要再提「赤衛隊抄張春橋家一事」。見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3-20。

[49]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69-170。

[50]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67-170；陳祥生，〈陳丕顯、曹荻秋在風雨飄搖的 1966〉，《黨史縱橫》，期 3（2005 年），頁 34-35；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頁 593-594。

[5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70；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14。

[52] 霞飛，〈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畫所謂“一月革命”始末〉，《黨史文苑》，期 5（2004 年），

礦企業和農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鏟除一切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舊的東西。只有這樣，才能把資本主義復辟的根子挖掉。」[53]，從毛澤東在生日會裡的談會以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可以看出 1967 年將會是發動全面奪權的一年。

1966 年 12 月 30 時下午，在「康平路事件」中被鎮壓的部分赤衛隊人員決定到北京告狀，「工總司」知道這件事後派人去阻止他們，12 月 31 日下午，赤衛隊與「工總司」在昆山發生衝突，導致滬寧交通中斷。[54]1967 年 1 月 1 日凌晨，周恩來打電話給陳丕顯，希望他能出來工作，要他盡快解決「昆山事件」。[55]當時上海有七十多個工人組織，其中有十幾個組織最大，復出後的陳丕顯邀請規模較大的工人組織領導人來開東湖會議，王洪文、耿金章、徐景賢、朱永嘉以及一些紅衛兵代表都來參加會議。1967 年的元旦張春橋打電話給徐景賢，在徐景賢的回憶錄裡指出張春橋在電話裡告訴他：「上海的赤衛隊鬧著要乘火車到北京來告狀，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有一個赤衛隊的頭頭，名字叫王玉璽，他利用職權同意調車，我們知道了都很生氣。剛才中央開會研究了，已經由總理直接打電話通知上海市委陳丕顯，要他到鐵路分局去對王玉璽採取措施。同時，還告訴陳丕顯，讓他召集各個造反組織的負責人開一個會，討論一下怎麼把上海的秩序穩定下來。赤衛隊幾千人上北京的話怎麼辦呀，還是要“抓革命、促生產”嘛！不過，現在陳丕顯說話可能不靈了，造反派的頭頭們不肯聽他的，所以我打電話給你，你可以在會上說一說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56]，所以參加東湖會議時的徐景賢是另有目的。會議一開始，陳丕顯傳達周恩來的指示，希望能貫徹毛主席「抓生產、促革命」的方針，希望能和不同群眾組織的負責協商，

頁 40。

[53]〈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紅旗》，（1967 年 1 月 1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 199。

[54]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15。

[55]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頁 106；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897。

[56]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21。關於張春橋在 1 月 1 日凌晨跟徐景賢所說的話在陳丕顯的回憶錄裡是說，張春橋在電話裡一面向徐交「底」，一面出點子。張告訴徐，周總理已給陳丕顯打過電話，要陳丕顯出來工作，解決鐵路中斷的問題，你們不要讓陳丕顯抓到旗子，要讓「造反派」抓。現在曹荻秋出不來了，現在要陳丕顯出來。陳丕顯的帳，你們要算清楚，但現在不急，等以後算。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20。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裡是說 1967 年凌晨 1 時許，張春橋打電話給陳丕顯，要他找各造反派組織解決交通中斷問題。這是給正在養病的陳丕顯出了個難題。一個多小時後，張春橋又打電話給徐景賢，告訴他這件事，並說這是給陳丕顯一次機會，但不是支持陳丕顯，陳丕顯的帳，你們要清算，以後算。又說曹荻秋不能出來了。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71。

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能因爲革命而使交通中斷，革命要有革命的秩序。此外陳丕顯也表示他已經打電話到上海鐵路分局，並且在依據周恩來的指示下將那一個擅自簽字同意調度發車，破壞交通秩序的王玉壐抓起來了，但因爲上海的交通已中斷二十多小時，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受到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受到耽誤，很多旅客的吃、喝都成了問題，上海現在的狀況非常危急，希望大家能集思廣益提出解決的方案。與會的人有的指責市委，認爲是因爲受到市委的挑動，才會發生群眾鬥群眾的事情，有的人則認爲陳丕顯應該親自出馬，處理這件事情，在大家紛紛表示自己的意見下，會議場面變得非常混亂。在情急之下徐景賢想出一個方法，徐景賢先出面指責陳丕顯，說陳丕顯才是「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禍首，接著傳達了張春橋的指示，並且順勢要求在場的造反組織發表一份聯會聲明，把批鬥的對象轉向陳丕顯、曹荻秋，要市委各級幹部聽從革命造反派的命令，派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到昆山勸赤衛隊回上海，這個要求獲得在場造反派的同意，在徐景賢的逼問下，陳丕顯也同意了。陳丕顯同意後，由紅衛兵負責擬定〈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陳丕顯在旁準備簽字，而徐景賢等人則趕赴昆山準備勸赤衛隊回上海。[57]

1967 年 1 月 3 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阿大（1942－）在北京見面。[58]1967 年 1 月 4 日，「《文匯報》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以〈告讀者書〉：「**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革命的同志們，我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宣告：經過一段時期的艱苦鬥爭，從今天起，我們『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接管了《文匯報》**」[59]，宣告奪權；1 月 5 日，「解放日報社」也以一篇〈告讀者書〉宣告奪權。[60]

1 月 5 日《文匯報》發表了一篇由在東湖會議時各群眾組織商議後起草的〈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全市一切革命學生和革命的機關幹部們！讓我們和廣大革命工人緊緊結合在一**

---

[57]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22-24。霞飛在〈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一文裡指出「告全市人民書」當造反派得知是周總理的意見後，大家紛紛提出建議，陳丕顯表示要將這些意見整理成爲「告全市人民書」，但因爲王洪文及徐景賢的抵制，東湖會議就草草了事了。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黨史博采》，頁 15。

[58]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30；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20。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可大在北京見面一事，有另一種說法是指他們在北京密謀將要展開兩大報奪權一事。霞飛，〈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畫所謂"一月革命"始末〉，《黨史文苑》，頁 42；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92。但關於《文匯報》奪權一事，徐景賢表示張春橋和姚文元事先並沒有接到請示。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37。

[59] 〈文匯報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告讀者書〉，（1967 年 1 月 4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國防大學，1998 年 10 月），頁 233-234。

起，為了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廣泛地開展宣傳和鬥爭，更堅決地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開火，打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切新反撲，將工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一個新高潮！」[61]，張春橋、姚文元並將這篇文章轉交毛澤東。[62]

1月9日《人民日報》轉載〈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經過毛澤東審定的編者按如下：「上海《文匯報》1月5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63]，從《人民日報》的這段話可以看得出來毛澤東對於兩報奪權表示肯定。[64]

1月5日，張春橋和「工總司」代表王洪文等人進行會談，談到要將領導權從市委手中搶過來，上海應該由工人階級來掌管，會中也決定1月6日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而張春橋並不會出席。[65]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1月6日王洪文等造反派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批鬥陳丕顯和曹荻秋，大會發出三個通令：「一、宣布從即日起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市長；二、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七天內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三、

---

[60]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171；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121-122。

[61] 〈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1967年1月4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2]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172；徐景賢，《十年一夢》，頁32。關於在《文匯報》刊發－〈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一事，徐景賢在其回憶錄裡說張春橋事先並不知情，而霞飛在〈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畫所謂"一月革命"始末〉一文中說刊發－〈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一事是由張春橋策劃的。徐景賢，《十年一夢》，頁32；霞飛，〈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畫所謂"一月革命"始末〉，《黨史文苑》，頁42。

[63] 〈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編者按語，《人民日報》，（1967年1月9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40-241。

[64]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175。

[65]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172；徐景賢，《十年一夢》，頁30-31。

請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級幹部堅守崗位。」[66]會後徐景賢將大會發言稿及通令呈報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由這三個通令看來，上海的實際領導權已落入造反派手中。[67]關於這件事情，張春橋在 1967 年 2 月 24 日在上海文化革命廣場召開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也提到：「實際上遠在公社成立以前，1 月 6 日的大會上就奪了權了。」[68]； 1967 年《紅旗》雜誌第二期曾發表〈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的文章（此文在 1967 年 1 月 16 日經《人民日報》轉載），文章中提到：「上海工人階級、其他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提出的革命方針和採取的革命行動，給全國樹立了榜樣，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新經驗。他們的經驗是多方面的。這些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把上海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裡。」[69]從〈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上海的奪權行動也持肯定及讚揚的態度。

1967 年 1 月 12 日張春橋和姚文元出席「上海革命造反派歡呼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在會中講到：「在這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間，上海無產階級在偉大的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芒萬丈的燦爛的光輝照耀下，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新勝利。〈告上海全市民眾書〉和〈緊急通告〉就是上海的無產階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們已經取得的勝利的總結，又是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動新的進攻，粉碎資產階級新的反撲，開展全面階級鬥爭的前進的號角，是我們奪取新的勝利的進軍的號角」[70]，這是張春橋回到上海後第一次公開談話，從這段談話可以看得出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已實際掌握了上海大權。[71]

---

[66]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40。
[67]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33-4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72-174。
[68]〈張春橋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 年 2 月 2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9]〈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紅旗》（1967 年 1 月 16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 251。
[70]〈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歡呼中央賀電大會上的講話〉（1967 年 1 月 12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1967 年 1 月 9 日由「工總司」等 32 個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表 〈緊急通告〉，〈緊急通告〉作出九條規定，責令市委、公安局照此執行。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76。
[71]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94-196；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46。關於奪權問題毛，澤東

從 1967 年 1 月 19 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裡引用了毛澤東在 1 月 8 日的談話：「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必將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72]；以及毛澤東指示陳伯達和其他文革成員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對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發出賀電，[73]賀電裡提到：「你們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制定了正確的政策。你們實施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功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74]，從這些話可以反映毛澤東當時是支持工人派造反奪權，然後以工人造反派爲核心，掌握地方領導權，同時「抓革命、促生產」。[75]

第三節　「一‧二八炮打」張春橋事件

1967 年 1 月 4 日張春橋、姚文元到上海後，在復旦大學有一個以胡守鈞爲首號稱爲「孫悟空」戰鬥組的紅衛兵小集團，收集了很多有關張春橋的資料，[76]與「上三司」、「紅革會」等紅衛兵組織開始調查張春橋，基於以下三個理由，他們決定「炮打」張春橋：

> 第一，張春橋是反革命二面派。1967 年 1 月，上海發生過四次奪取市委、市人委一切權力的行動，這就是：1 月 15 日以"上三司"為主的奪權；1

曾指示過張春橋：「如果權本來就在右派手裡，奪過來！如果再被別人奪過去，仍然在右派手裡，沒有什麼了不起，還可以再奪。」〈對張春橋上海來電請示奪權問題的答覆〉（1967 年 1 月），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72]〈對《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事件的談話〉（1967 年 1 月 8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185。

[73]〈對《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等兩篇電訊稿的批語〉（1967 年 1 月 10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 186-187。

[74]〈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見〉《人民日報》，（1967 年 1 月 12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 245。

[75] 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黨史博采》，頁 16。王力表示關於〈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原本署名並沒有中央文革小組，後來毛澤東要求在署名裡加上中央文革小組。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66。

[76] 秦維憲，〈反張春橋的"胡守鈞小集團"〉，《炎黃春秋》，期 9（2005 年），頁 9。

月 23 日"上三司"再次奪權；1 月 24 日"紅革會"的奪權；以"工總司"為主體的"大聯合"的奪權。張春橋打擊異己，培植親信，護衛以他為首的奪權，排斥任何其他奪權。紅衛兵們從張春橋的奪權活動中逐漸看出了他的兩面三刀手法，又回想到他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報》事件"中的表現，認定張春橋是危險人物。

第二，紅衛兵們在揭發原市委的"問題"時，聯繫到張春橋。張春橋原在上海主管文教工作。紅衛兵們認為，原市委在文教方面的"問題"，張春橋不能辭其咎，他也有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錯誤。下面"問題很大、很多"，許多人被揪出來了，而張春橋卻是大"左派"，這是說不通的。

第三，張春橋歷史上的問題和疑點，不斷為紅衛兵們所覺察。如已經了解到張春橋就是 30 年代攻擊魯迅的"狄克"。有的紅衛兵組織掌握了張春橋在歷史上被捕叛變的嫌疑。對於李文靜的叛徒問題掌握的情況，更多一些。有的紅衛兵曾懷疑張、李二人是"雙料貨"（即是叛徒又是特務）[77]

1 月 24 日上海外灘、南京路貼滿了反對張春橋當上海第一書記的標語，1 月 26 日復旦大學「紅革會」決定了抓徐景賢的計畫，1 月 27 日深夜「紅革會」派人強行將徐景賢押到復旦大學，要求徐景賢交待張春橋及寫作班子的問題。張春橋得知徐景賢被抓到復旦大學後，打電話給上海警備區，調派軍隊到復旦大學進行鎮壓，對於解放軍的鎮壓行動，紅衛兵感到非常不滿意。1 月 28 日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展覽館與「紅革會」等紅衛兵展開了爲時六小時的鬥爭，紅衛兵責問張春橋爲何要鎮壓紅衛兵？爲什麼在 30 年代時要化名狄克攻擊魯迅？1 月 29 日復旦大學再度召開「炮打」張春橋大會，並決定於 30 日在人民廣場召開全市「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78]關於 30 日將於人民廣場召開「炮打」張春橋的消息剛好被留在復旦大學的徐景賢聽到，徐景賢透過復旦大學學生的幫忙，透過公共電話將這一項消息告訴張春橋。張春橋聽到這項消息後，要徐景賢繼續待在復旦

[77]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83-184。
[78] 秦維憲，〈反張春橋的"胡守鈞小集團"〉，《炎黃春秋》，頁 10-11。

大學，以免節外生枝，並表示表示中央會妥善處理這件事。[79]1 月 30 日，一份「中央文革的特急電報」將徐景賢從復旦大學解救出來，「炮打」張春橋運動也被鎮壓下來了。[80]「中央文革特急電報」內容如下：[81]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同志們並轉復旦大學的同學們：

（一）復旦紅衛兵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

（二）復旦的某些人，無理綁架上海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革命同志，必須立即釋放，並向他們道歉。

（三）人民解放軍採取保護革命群眾組織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扣押人民解放軍的師政委和參謀，是十分錯誤的，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四）各群眾組織內部之間的爭執，應當採取協商和談判的方式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綁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復旦和上海的同學們，幫助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我們將要採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後果應當由製造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後操縱者負責。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關於這一份電報在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一書裡表示：「1 月 27、28、29 日，張春橋曾打電話給王力，向中央文革小組作了歪曲事件真相的彙報，要求陳伯達、江青採取措施；王力提出由“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寫報告給中央文革小組，以便表態。“聯絡站”上送的報告歪曲事實，市委辦公廳有關人員拒絕拍發。張春橋焦慮萬分，於是在 1 月 30 日親自用鉛筆起草了“中央文革特急電

---

[79]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63-6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85。關於通報張春橋這一件事，秦維宪在〈反張春橋的“胡守鈞小集團”〉一文裡說告訴張春橋將在 1 月 30 日時召開「炮打」張春橋一事的人是由游雪濤“掃雷縱隊”小組向張春橋彙報的。秦維憲，〈反張春橋的“胡守鈞小集團”〉，《炎黃春秋》，頁 11。

[80] 秦維憲，〈反張春橋的“胡守鈞小集團”〉，《炎黃春秋》，頁 11。

報”，嚴厲譴責“紅革會”的負責人，要求紅衛兵“幫助”他們“立即改正錯誤”。簽署日期提前為“1月29日”。經別人謄清後，又由張春橋自己批示“印八開，20萬份”，發到全市。1月27日王力同姚文元通了電話，根據姚文元的記錄，王力講的有與張春橋起草的電報類似的內容；但“中央文化革命特急電報”確系張春橋所偽造。」[82]，根據徐景賢《十年一夢》裡指出1月29日早上市委寫作班裡的郭仁傑到復旦大學裡找徐景賢，跟徐景賢提到張春橋等人共同起草一份向中央文革的告急電報，徐景賢在1月29日當晚將翌日要進行的「炮打」張春橋大會的消息告訴張春橋，所以，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裡指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特急電報」是張春橋親自擬定一事應該屬實。

關於「中央文革特急電報」一事，毛澤東事後曾指示：「關於中央文革緊急指示（指1月30日就炮轟張春橋問題給上海紅革會的電報）我看了，寫得很好，有造反的氣派。最後一點說“將採取必要措施。”這一次炮轟張春橋大會開的話，一定要採取必要的措施抓人。」[83]，從張春橋傳達的訊息裡可知毛對這一份電報的肯定。

這個事件後雖然張春橋一再表示不追究「炮打」者的責任，但是私底下卻藉由「清理階級隊伍」[84]、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85]、「一打三反」[86]等，對於參加「炮打」的人員進行政治迫害。[87]

---

[81]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68。
[82]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185。
[83]〈張春橋在上海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傳達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1967年2月24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84] 所謂「清理階級隊伍」與毛澤東自1967年夏天起在實際工作上把整走資派轉爲打擊群眾組織中的壞人有關聯。毛認爲「大聯合」及「三結合」遲遲不能實現與群眾裡混進了壞了有關，因此，1968年5月在多數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已成立後，他要求全國展開「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297-299。
[85] 1967年7、8月時有一自稱「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在北京散發污蔑攻擊周恩來的傳單，群眾看了十分氣憤，紛紛揭發「五一六」的罪行。然而毛要揪的「五一六」份子不只是污蔑周的這個組織，毛要揪的是要打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打擊解放軍、打擊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的形左實右的反革命分子。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271-273。
[86] 指的是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331。
[87]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185-186。

第四節　上海人民公社

兩報奪權後上海成爲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共同領導的局面，因爲中共中央並沒有下達正式的人事命令，因此，上海成爲權力競爭者爭奪的地方。首先向張春橋等人挑戰的是「上三司」[88]及「工總司」下屬的二兵團司令耿金章，1 月 15 日「上三司」及「工總司」下屬二兵團的耿金章，在未告知張春橋、姚文元及一些其組織之下，給合一批工人及學生衝向上海市委機關大樓，奪下上海市委的大印，以爲控制了上海市委的大印，就擁有了上海的領導權，耿金章奪走了上海大印後，向中共中央發了電報，要求中央承認他們這一次的奪權行動，電報也希望中央批准張春橋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擔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的請求。耿金章奪得印章之後，張春橋、姚文元就約耿金章、徐景賢到張春橋位於興國路的住所談談。張春橋向耿金章提出身爲共產黨員應該要聽中央文革的指示，不能單方面的奪權，應該要聯合起來一起奪權，如果群眾沒有表示支持，等於沒有奪權及，張春橋並允諾在新政權成立後要給予職位。在張春橋的威脅利誘下，耿金章退出了這一次的奪權，轉而支持王洪文。[89]

1 月 22 日「上三司」的造反派占領了上海市機關，宣佈奪取上海市委一切權力，此時正值張春橋等人討論上海奪權後成立新組織的相關問題之際，徐景賢打電話給「上三司」的趙全國，希望他能一起參與討論，但被拒絕。上海造反派對於「上三司」不合群的態度感到很不能接受，後來就採取武力的方法，由潘國平帶領一千多名小兄弟衝進「上三司」在市委的指揮部，將「上三司」的人打跑，「上三司」這次的奪權又宣告失敗。[90]

1 月 24 日深夜上海「紅革會」奪走上海黨政機關的 23 顆大印，25 日上海貼滿了「紅革會」的奪權通告，同時也要上海警備區派解放軍保護他們，「紅革會」希望與市委聯絡機關及上海造反派團體會談，簽署奪權聲明。徐景賢在赴約前已事先請示過張春橋，於是在會中提出應該召開全市各造反組織的聯合會議，大家

[88] 「上三司」是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簡稱，是屬於學生造反組織，其負責人是上海戲劇學院的學生趙全國。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52。
[89]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44；霞飛，〈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畫所謂“一月革命”始末〉，《黨史文苑》，頁 43-44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56-57；〈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安徽造反派的講話〉（1967 年 7 月 22 日），文革研究網，http://www.wengewang.org/index.php（2006/11/13）
[90] 霞飛，〈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畫所謂“一月革命”始末〉，《黨史文苑》，頁 43-44；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57-58。

共同來討論奪權一事，不應該只由幾個組織比較大的造反派團體來決定。徐景賢並利用機會打電話給姚文元，彙報當時的會談情形，不久後姚文元打電話給「工總司」的潘國平，希望他不要答應「紅革命」的要求。姚文元也打電話給「紅革會」的領導人，告訴他張春橋希望「紅革會」能顧全大局，和其他造反派一起聯合奪權，而且張春橋也將召開會議，邀請上海各個造反派共同來商討新的政權機構組織形成方式。「紅革會」在聽了姚文元的電話以及在「工總司」不願配合的情況之下，就答應把印章交出來，結束了這次奪權事件。[91] 2 月 1 日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高校討論「紅革會」時，張春橋、姚文元認為「紅革會」的後台是陳丕顯、曹荻秋，「紅革會」搞錯了鬥爭的方向，上海大革命造反派的任務是要和陳丕顯、曹荻秋等走資派當、權派鬥爭，是要大聯會、大奪權。[92]

王洪文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下奪二大報的大權後，上海的大權已掌握在張春橋一行人手中。春橋決定建立一個「三十八家聯絡總站」，這個機構就是將上海較具規模的三十八個造反組織聯合起來的總機構，張春橋將這個機構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並在 1 月 25 日上報中央。從毛澤東批准並親自審定《人民日報》發表了肯定和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由下而上的奪權看來，毛澤東是支持及肯定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奪權的。毛澤東對於上海工人奪權是支持的，但對於「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稱就持保留意見，1 月 31 日在《紅旗》刊登了一篇由王力、關鋒起草，毛澤東審閱、修改名為〈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的社論，社論中毛澤東加上了一些意見：「要克服小團體主義和分散主義；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反對排斥一切，打倒一切；要防止停止生產，中繼交通。」[93]，表示此時的毛澤東心中已經在思考，在工人造反派奪權後，應該要防止產生無政府主義的問題。[94]

2 月 5 日張春橋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舉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並發表談話，在談話中他將從奪「文匯報」大權開始的一連串奪權行動稱為「一月革命」，他提到：「《文會報》《解放日報》新生了，〈告上海全市民眾書〉和〈緊

[91]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47-51；霞飛，〈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畫所謂“一月革命”始末〉，《黨史文苑》，頁 44。
[92]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96-209。
[93]〈對《紅旗》雜誌社論稿《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的批語和修改〉（1967 年 1 月 30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 210-214。
[94] 霞飛，〈紅極一時：“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中），《黨史博采》，期 7（2005 年），頁 45。

急通告〉發表了，一小撮赤衛隊頭頭揚言要“三停”的碼頭，車站等等要害部門的權奪回來了，資產階級老爺們的簽字權作廢了。在這場偉大的階級搏鬥中，無產階級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場勝利，如同 1949 年 5 月 27 日中國民眾解放軍解放上海一樣，將永遠記在上海民眾的心裡，將永遠記在我國民眾的心裡，我們將千百次地歡呼，偉大的一月革命萬歲！ 一月革命的勝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上海革命造反派、我們上海革命民眾在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親自指揮下奪取來的偉大勝利！」[95]「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張春橋將「一月革命」的材料托中央辦公廳轉交毛澤東，2 月 12 日毛澤東召見張春橋、姚文元，毛澤東提到：「上海民眾很喜歡民眾公社啊！很喜歡這個名字，怎麼辦啊？你們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幾個辦法，第一種是不改名字。（仍用“民眾公社”）這個辦法有好處，也有缺點。好處是可以保護上海民眾的革命熱情，缺點是全國只有你們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嗎？現下又不可以在《民眾日報》上登載。一登，全國都要叫。否則，人家有意見：為什麼只准上海叫，不准我們叫？這樣不好辦。第二種是全國都改，那麼就要發生上面的問題，改變政體，改變國號、旗號，承認不承認的問題。第三個辦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國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點改，不一定馬上改。如果大家說不想改，那麼你們就叫一些時候吧！你們怎么樣？能不能說得通啊？」[96]從這段談話可以知道毛澤東認爲「上海人民公社」這個名稱不好，涉及了國家體制的問題。最後毛澤東決定將「上海人民公社」改爲「上海革命委員會」，張春橋任革命委員會主任，2 月 24 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改爲「上海革命委員會」。[97]從「上海人民公社」改名這件事

---

[95]〈張春橋在上海成立民眾公社大會上的講話〉（1967 年 2 月 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96]〈張春橋 2 月 24 日傳達毛澤東接見張春橋、姚文元時的談話〉（1967 年 2 月 2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97]〈張春橋二月十九日在上海群眾大會上傳達的毛澤東指示〉（1967 年 2 月 12-1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481；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196-209；霞飛，〈紅極一時：“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中），《黨史博采》，頁 44-46；余煥椿，〈大權旁落“文革”中人民日報奪權紀實〉，《百年潮》，期 12（2004 年），頁 9。毛澤東的談話原文節錄如下：「民眾公社成立以來，一系列問題你們考慮過沒有？如果全國都成立公社，那中華民眾共和國要不要改名？改的話，就改成中華民眾公社，人家承認你嗎？蘇聯就可能不承認，英法倒可能承認。改了以後，駐各國大使怎么辦？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你們考慮過沒有？現下許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請成立民眾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民眾公社外，其它地方都不准搞民眾公社。上海還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員會或者是改成市委和市人委。」〈張春橋二月十九日在上海群眾大會上傳達的毛澤東指示〉（1967 年 2 月 12-1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關於上海人民公社本身，毛澤東也懷疑

可以看出，當時的政治權力最終是取決於毛澤東個人的思想。[98]

公社組織形式是否能保持必要的革命警覺性。莫里斯・邁斯納著， 杜蒲、李玉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438。

[98] 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李玉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頁 439。

第四章　九大前的張春橋（1967~1969）

第一節　二月逆流

1967 年 1 月 19 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常委碰頭會，商討在軍中要不要開展「四大」[1]問題，葉劍英、聶榮臻（1899-1992）、徐向前（1901-1990）與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人爭吵起來，後來葉群（1917-1971）才到場。兩軍對壘，會場一片硝煙。總政治部主任蕭華（1916-1985）因在軍中推動文革不力，首當其衝，遭到江青等人猛烈批評。由於軍委從未討論過批判蕭華的問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深知，如果無法保住蕭華，這把火遲早會延燒到他們的頭上。顯然，江青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想從總政治部打開缺口，先整掉蕭華，再順勢打倒他們這批老帥。由於批鬥蕭華事關重大，當天散會時，徐向前特別要求嚴格保密。但因爲事機敗露，當天晚上，造反派抄了蕭華的家，蕭華連夜逃到西山，向葉劍英求救。隔天，繼續在京西賓館開會，江青緊咬住蕭華不放，並質疑蕭的行蹤。剛好這時候，蕭現身會場，訴說昨晚被抄家的經過。由於葉劍英昨天已經向周恩來求援，要求制止揪鬥蕭華，不僅獲得周的支持；而且周也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也同意保蕭華。因此，徐向前、葉劍英憤而反擊，拍桌怒罵。這就是「大鬧京西賓館事件」的梗概。值得注意的是，徐向前回憶錄則指出，在會上葉群與江青聯成一氣，由葉群發難，首先炮轟蕭華。張雲生的回憶錄則指出，1 月 19 日當天下午，江青親自到「毛家灣」見林彪，葉群也在場。江青離開後，葉群隨即找張雲生，她的第一句話就是：「要打倒蕭華啦！」接著，葉群代表林彪趕赴京西賓館，參加批蕭華的會。可以理解的是，在批蕭華這件大事上，若林彪不點頭，葉群絕對不敢造次。可是，張寧（1949-）在《塵劫》中卻出現了另外的說法，張寧指出，林彪曾一再叮嚀葉群：「蕭華不能輕易點名打倒，這樣大的事必須請示主席。」林還說：「蕭華歷史上沒有錯誤，紅小鬼出身，對待他一

[1] 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定要慎重。」在批蕭華的問題上，顯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2]

由於文革爆發後，黨政機關不斷遭到造反派衝擊，而告癱瘓。因此在周恩來折衝下，成立一個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由當時主持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一起解決各種問題的任務組織，此一組織從1967 年 2 月開始運作。當時周恩來提議，每星期六天在「釣魚台」及中南海懷仁堂（或國務會議室）兩地輪流開碰頭會。周恩來有其功能性考慮，在「釣魚台」召開的碰頭會主要是商討文革的一些問題。換句話說，周恩來的用意是將黨政的經常工作與文革問題區隔開來，2 月 7 日開始，每當在懷仁堂召開碰頭會時，幾位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在會中均強烈抨擊文革，而與中央文革的人馬發生激烈的爭執。當時這批老幹部質問的重點有三：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要不要穩定軍隊？結果這場鬥爭在 12 月 16 日懷仁堂會議上達到高潮，會議裡老幹部們將內心對文革以來所積壓的不滿全部發洩了出來，參加會議的軍中大老，拍案陳言，將內心對中央文革的不滿一一宣洩出來，此舉在政壇上引發一場軒然大波，這場風波被毛澤東鎮壓了下來，黨內元老派在這場風暴中幾乎都受到了波及，中央文革的勢力大增。[3]

全國展開全面奪權後，各地區、各部門兩大派組織爲爭奪領導權打得不可開交，黨政系統大亂，於是毛澤東決定讓軍隊介入文革，希望他們能在混亂中成爲一股穩定的力量，能控制局面，並幫助造反派完成奪權。[4]但「大鬧京西賓館」的風波，讓毛澤東意識到軍隊與中央文革的關係緊張，爲了平息軍方將領的不滿，毛澤東決定在軍方將領面前，拿軍隊意見最大的陳伯達、江青開刀。[5]

[2] 徐向前，《徐向前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年），頁 619-620；劉志，《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年 11 月），頁 582-584；范碩、丁家琪，《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年 7 月），頁 582-584。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上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149-154；張雲生，《毛家灣紀實》（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頁 50-51；張寧，《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5 年 5 月），頁 33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3 月第 36 版），頁 197；范碩，〈“二月抗爭”前後的周恩來〉，《漳州職業大學學報》，期 2-3（2000 年），頁 8。
[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93。
[4]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12 月），頁 1471-1472。
[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98。

1967年2月10日毛澤東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參加的常委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6]會上毛澤東針對陳伯達、江青宣布「打倒陶鑄」[7]一事進行批評，毛澤東批評他們說：「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陳伯達，過去專門在劉少奇和我之間進行投機！……你這個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裏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沒有別人的事！……我看現在還是同過去一樣有事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有重大問題，他是向我報告的。」[8]毛澤東並在常會上表示中央文革小組要召開批評陳伯達及江青的會議，並要王力以電話連絡張春橋、姚文元，請他們兩人回北京。毛澤東希望批評陳伯達、江青一事只在中央文革內部進行，不要對外宣傳，但這件事被葉劍英、李富春等人說了出去。[9]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在釣魚臺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江青因生病沒參加。會上康生批評江青，說陳伯達被江青逼得要鬧自殺。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則只批陳伯達不批江青，張春橋認爲毛澤東對陳伯達的批評是屬於品質和路線上的大問題，對江青的批評則是作風、小節問題。[10]

2月14(13)日到2月1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碰頭會。[11]2月16日的碰頭會，譚震林(1902-1983)向張春橋責問爲何不讓陳丕顯到北京？

---

[6]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95。

[7] 指的是1967年1月4日時江青、陳伯達在接見湖北造反團時，宣布陶鑄是「中共最大的保皇派」，陳伯達表示陶鑄到中央文革後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是劉鄧路線的執行者。毛澤東在1月8日的中央會議上也批准了打倒陶鑄，同時也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95-96；毛澤東，〈關於陶鑄問題的談話〉(1967年1月8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年)。

[8]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頁239。

[9]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頁974。

[10]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頁240；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76。

[11]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冊，(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頁197-19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00。關於2月14日到2月16日召開政治碰頭會的日期，《毛澤東傳(1949-1976)》、《王力反思錄》只提到2月16日那次會議，《周恩來年譜》、范碩〈“二月抗爭”前後的周恩來〉提到2月11日，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日期是2月11日，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引用范碩、丁家琪《葉劍英傳》日期是2月11日，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裡提到的是2月11日到2月16日，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因爲引用王年一所著一書，所以日期也是2月11到2月16日，但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裡引用紀希晨〈一場捍衛黨的原則的偉大鬥爭－揭穿林彪、“四人幫”一伙製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及宋瓊、孫造剛、邵一海〈所謂“二月逆流”的歷史真相〉裡卻是寫2月13日，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裡寫2月14日到2月16日，但王力《王力反思錄》及葉永烈《張春橋

張春橋表示這件事將由群眾來決定，聽到這句話後的譚震林非常生氣，對著中央文革的人說，一天到晚老是群眾、群眾，不要黨的領導，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倒。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譚震林說話的語調愈來愈生氣，最後表示：「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幹不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12]譚震林把話講完後，生氣的準備離開時，被周恩來叫回來。接下來換陳毅發表言論，陳毅不僅直接針對林彪進行批駁，而且也影射毛澤東。陳毅說，這些傢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義，斯大林（1879-1953）交棒給赫魯雪夫（1894-1971），赫魯雪夫一上台不是就進行了修正主義嗎？接著陳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風，在延安整風時，劉少奇（1898-1969）、鄧小平、彭真、薄一波（1908-2006）、劉瀾濤（1910-1997）、安子文（1909-1980）等人最擁護毛澤東思想，這些人從來沒有反過毛澤東，因爲他們根本沒見過毛澤東！但是受到整肅的是他們這一批老將，其中也包括了周恩來，將來歷史會證明，到底是誰在反對毛澤東。當陳毅談及延安整風時，周恩來接著說，所以才要進行文化文革命。陳毅發言後，葉劍英、余秋里（1914-1999）等人接著發言，當天的會議就在老將們激烈發言後結束。[13]會中因爲陳毅及譚震林的發言已踰越尺度，所以，周恩來曾在會議中致電毛澤東，毛澤東派汪東興

傳》裡提到張春橋是在 2 月 12 日才回到北京，范碩版在提到這一段歷史時有提到張春橋，所以，2 月 11 日的日期應有誤。紀希晨版及嚴家其、高皋版裡有提到張春橋，對照他所提到的時間 2 月 13 日、及 2 月 14 日應比較可信。范碩，〈“二月抗爭”前後的周恩來〉，頁 9；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9 月），頁 231；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8 年 2 月），頁 191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20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00；紀希晨，〈一場捍衛黨的原則的偉大鬥爭－揭穿林彪、“四人幫”一伙製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國防大學，1998 年 10 月），頁 297；宋瓊、孫浩剛、邵一海，〈所謂“二月逆流”的歷史真相〉，《解放軍日報》（1979 年 2 月 26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 306-307；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冊，頁 197；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74；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台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年 9 月），頁 225。

[12] 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01。

[1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00-203；藝函，〈譚震林“大鬧懷仁堂” 〉，《中國人才》，期 4（1997 年），頁 2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08-210；宋瓊、孫浩剛、邵一海，〈所謂“二月逆流”的歷史真相〉，《解放軍日報》（1979 年 2 月 26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 307-309；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77-979。

（1916-）前來，但當汪東興來時，老將們批判的高潮已經過去了。[14]

值得一提的是懷仁堂會議事件，當事人之一的王力在《王力反思錄》一書裡提到，出席懷仁堂會議的名單中並沒有報刊上謠傳的聶榮臻、谷牧、關鋒、戚本禹，且座位上的「兩軍對壘」也是虛構的。當李先念（1909-1992）在會上批評《紅旗》十三期社論後，周恩來對康生說：「十三期紅旗社論，這麼大的問題，你們也不跟我們打個招呼，送給我們看看。」[15]周恩來的這一句話實際上是在批評陳伯達、康生、江青。陳伯達及康生皆對周恩來表示他們並沒有看過，但事實上他們兩人都有看過這一篇社論。[16]

關於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記錄者王力在《王力反思錄》裡表示：「會後，姚文元發起，說：『今天是一場大的鬥爭，王力，你要站穩立場。』張春橋說：『明天我們要回上海了，主席說過，臨走前要再見我們三人，今天的事要報告主席，我們先對對情況。』我說：『可不能隨口亂講，要如實，要準確。』這次對情況我記下了一個文字要點（這不是後來的「記錄」，也沒有用任何文字形式「上告」）因此，聶文所說『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三人當天……整理了一個紀錄，上送告狀……』並無此事。」[17]現存「懷仁堂會議記錄」是因爲在 2 月 26 日到 3 月 18 日召開對陳毅等人的生活會裡有一些原本沒參加 2 月 16 日懷仁堂會議的人出席，所以，周恩來請他重新整理一份新的資料，但這一份資料已不同於張春橋向

---

1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03。

15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78。

16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77-979。聶榮臻是否有出席 2 月 16 日懷南堂會議，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宋瓊、孫浩剛、邵一海〈所謂“二月逆流”的歷史真相〉裡皆有有提到聶榮臻有參加 2 月 16 日的會議，然而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提到這段歷史時並沒有聶榮臻並末出席，葉永烈在《張春橋浮沉錄》一書裡也沒有提到聶榮臻有在會議中發言。王年一引用的資料是紀希晨〈一場捍衛黨的原則的偉大鬥爭－揭穿林彪、“四人幫”一伙製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及宋瓊、孫造剛、邵一海〈所謂“二月逆流”的歷史真相〉，雖然二篇文章裡提到聶榮臻在會議上有發表言論，但這句話並沒有出現在「懷仁堂會議記錄」裡，所以，筆者推論聶榮臻應如王力所言並末參加這次會議。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914；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08；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225-229；紀希晨，〈一場捍衛黨的原則的偉大鬥爭－揭穿林彪、“四人幫”一伙製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 299；宋瓊、孫浩剛、邵一海，〈所謂“二月逆流”的歷史真相〉，《解放軍日報》（1979 年 2 月 26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 308。

17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頁 241-242。聶文指的是聶榮臻元師回憶錄。聶榮臻，《聶榮臻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年），頁 679。

毛澤東報告的那一份當時對出來的情況。因爲這個事端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引起的，所以，王力將他們兩個人的名字加在署名裡，這份記錄周恩來及康生都看過而且也有修改，當時陳毅提出，他沒有說過赫魯雪夫一上台，就進行修正主義這一件事，但周恩來表示不改了，因爲他的確有說過。懷仁堂會議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將懷仁堂開會情形對了一下，由王力記成要點，三人一起去找江青報告懷仁堂會議的情況，江青說：「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在路線鬥爭中動搖。」[18]江青認爲毛澤東請王力通知張春橋及姚文元一起來參加這個會議，因此他們三人應該一同去向毛澤東報告這件事，在江青的安排下張春橋等人到毛澤東那裏跟毛澤東彙報懷仁堂會議的情況。[19]關於張春橋跟毛澤東彙報時的情況，王力的回憶指出，張春橋在向毛澤東報告會議的情況時，開頭毛澤東只是笑笑，後來提到陳毅的話以後，毛再也笑不出來了，當講到周恩來對於紅旗十三期社論沒送給他看表示有意見時，毛表示黨章上沒有黨報黨刊社論要常委審查這一條。[20]

關於張春橋對毛澤東提到周恩來對《紅旗》第十三期社論沒送他審查有意見這件事，在《周恩來年譜》裡還提到了：「毛澤東說：黨章上沒有規定社論要經過常委討論。並叫張春橋同周恩來談一次話，要把中央文革小組當成書記處看待，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21]

譚震林在「懷仁堂事件」後寫信給林彪，信上說到：「他們有興趣的是打老幹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定，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拼下去。」[22]林彪把這封信

---

[18]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0。
[19] 王力，《王力反思錄》，頁 98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03；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482。
[20]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頁 241-242；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0-981。
[21] 引自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127。
[22]〈譚震林給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澤東的批語〉（1967 年 2 月 1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

交給毛澤東，並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信上說到：「主席：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23]，毛澤東看完這封信後批示：「已閱」、「恩來同志閱，退林彪同志」[24]根據張雲生在《毛家灣紀實》一書裡表示，林彪收到那封信後是以「坐山觀虎鬥」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但這封信到了毛澤東那裏後，卻引起了意外的反應。[25]

2 月 18 日深夜（2 月 19 日凌晨），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康生、謝富治（1909-1972）、葉群等人參加由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對於在 2 月 16 日懷仁堂碰頭會提出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不滿的譚震林、陳毅等提出嚴厲的指責。[26]毛澤東在會上提到：「我馬上走，林彪也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這些叛徒當組員。力量嫌不夠，就把王明、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幹脆請美國、蘇聯一塊來吧！」[27]會中周恩來勸毛澤東不要生這麼大的氣，周恩來自己也做了檢討，說當天他沒有掌握得很好，緩和一下氣氛後，毛澤東的氣也就稍稍消了下去，當天決定召開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進行批評檢討的生活會。2 月 25 日到 3 月 18 日，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等人召開了七次的「政治局生活會」，江青等人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當時被打成爲「二月逆流」。[28]懷仁堂事件後，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周恩來主持

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布日，〈譚震林寫信痛斥江青一伙〉（1969 年 2 月 26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 294。

[23]〈譚震林給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澤東的批語〉（1967 年 2 月 1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4]〈譚震林給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澤東的批語〉（1967 年 2 月 1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5]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頁 93-95。

[26]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482-1483；周延，〈和大鬧懷仁堂的戰友們〉，安建設編著《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0 月），頁 47-48。

[27] 引自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3。關於毛澤東當天的發言，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裡有盡爲詳盡的描述，可參閱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16。

[28]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482-148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16-217；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頁 244-245；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7；藝涵，〈譚震林"大鬧懷仁堂"〉，《中國人才》，頁 29。「二月逆流」後毛澤東與老帥們的往來可

的中央碰頭會也被中央文革碰頭會所取代。[29]

第二節　張春橋與游雪濤小組

一、「四·一二炮打」張春橋

歷經 1967 年全面奪權和到處派性武鬥的大動亂後，1968 年毛澤東開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反對派性、制止武鬥、促進大聯合，成立「軍、幹、群」的革命委員會。毛澤東很看重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從《人民日報》社論可看到毛當時的想法：「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修：一條是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系群眾的領導班子。」[30]當毛澤東把注意力放在三結合的同時，發生了楊成武（1914-2004）、余立金（1913-1978）、傅崇碧（1916-2003）遭到整肅的事件。1968 年 3 月 22 日中央發佈將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職務。[31]林彪在 3 月 24 日在軍隊幹部大會上表示，楊成武與余立金勾結，想要打倒吳法憲，篡奪空軍的領導權，楊成武又伙同傅崇碧準備打倒謝富治。楊成武基於個人的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32]（1905-1985）、韓先楚（1913-1986）、黃永勝（1910-1983），中央已開會決定撤銷楊成武（1914-2004）的代總長職務，逮捕余立金、撤銷北京的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33]康生在這場大會上更指出楊成武背後有黑後台在支持，張春

參閱陳揚勇，〈抗爭與策略：對周恩來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黨史研究》，期 1（2002 年），頁 76-80。

[29] 范碩，〈砥柱中流 艱難抗爭－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範學院學報》，卷 21 期 5（1999 年），頁 60；陳揚勇，〈周恩來寫給老同志的一封信 1967 年 2 月『大鬧懷仁堂』事件之前〉，《黨史文苑》，期 5（2002 年），頁 31。

[30]〈關於國家機構的改革和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根據 1968 年 3 月 30 日《人民日報》刊印），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477。

[3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85。

[32] 張春橋與許世友在文化革命初期就結了怨。1967 年春，南京軍區黨委就「三支兩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中共中央做了一次檢查，張春橋看了檢查後認為「上綱上線不夠」，後來因為周恩來出面表示，上綱太高，往軍隊臉上抹黑，只會使得階級敵人高興，才使張春橋作罷。在上海一月風暴期間，張春橋曾擬請中央，要南京軍區派二十七軍進駐上海，保衛「一月革命」的勝利果實，許世友持反對意見。許世友認為軍隊的主要責任是對外，如果軍隊進駐上海，將會陷入群眾運動中，將會無法自拔。許世友發電報向中央表達自己的看法，毛澤東表示同意。為了許世友不派軍駐上海一事，讓張春橋對許世友十分反感。王宣，《毛澤東之劍-名將之星許世友》（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218-219；胡居成，〈許世友上將在文化大革命中〉，《黨史縱橫》，期 1（2000 年），頁 15；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許世友將軍〉（六），《黨史縱橫》，期 4（2003 年），頁 23。

[33]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14；〈林彪在軍隊幹部上的講話〉

橋並未出席這場大會。[34]3 月 27 日中央又在北京開了一場十萬人大會，會上周恩來、康生、江青、陳伯達等人都有發表對「楊余傅事件」的看法，這一次的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温玉成（1915-1989）、葉群等人皆有參加，中央並沒有通知張春橋參加這次大會，因爲中央沒有通知張春橋參加這一次大會，所以引起《文匯報》負責人朱錫琪的懷疑張春橋是否爲叛徒。[35]

1967 年「一、二八炮打張春橋」事件後，在大專院校中紅衛兵反對張春橋的活動並沒有停止，尤其在 1968 年工宣隊、軍工隊進駐大學，清查 1967 年「炮打」張春橋事件，把胡守鈞以反革命分子隔離起來後，引發紅衛兵更大的不滿。[36]1968 年 4 月上海發生第二次「炮打」張春橋，即「四•一二炮打張春橋」。

在「炮打」張春橋事件尚未發生之前，張春橋在康平路召開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會議時，會上同濟大學紅衛兵陳敢峰表示近來有人散佈謠言，說張春橋是叛徒，但張春橋表示，從來都沒有被逮捕過，怎麼會是叛徒，會後張春橋是叛徒的

（1968 年 3 月 2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宋鳳英，〈文革期間的楊成武〉，《文史月刊》，期 5（2005 年），頁 32。楊、余、傅得罪林彪、江青的起因是，1967 年楊、余陪毛視察大江南北，途中楊聽到毛對林的批評，當楊回北京時葉群問楊成武是否有聽到毛談及林，楊表示沒，不久後林彪表示楊對他進行封鎖，在陪毛視察的三個月不向他彙報。1968 年 3 月周恩來根據毛的要求要楊派人查魯迅手稿，這手稿被戚本禹拿走了，當擔任查找任務的傅崇碧在秦城監獄找到戚本禹，戚表示文件已被江青拿走，傅到「釣魚台」時被江青指爲是到「釣魚台」抓人，因爲這些事件致使楊、余、傅得罪林彪及江青。因爲林彪在毛澤東面前表示和楊成武勢不兩立，所以，毛澤東在研究了四次後才同意打倒楊、余、傅。雖然毛同意打倒楊，但毛仍作了一些保留，在〈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會的批示稿上的批語〉批示：退周再閱，楊成武、張平化均不點名，留有餘地，將來要點也不遲。請酌定。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在出席中央軍委會議上表示，所謂的「楊、余、傅事件」是林彪弄出來的，在這件事上他犯了錯誤。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14-1515；〈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會的批示稿上的批語〉（1968 年 4 月 6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 483；〈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人員時的談話〉（1973 年 12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舒雲，〈傅崇碧和“楊余傅事件”〉，《黨史博覽》，期 9（2006 年），頁 23；文安，〈楊成武將軍七年冤獄的前前後後〉，《福建黨史月刊》，期 4（2004 年），頁 29。周恩來非常清楚「楊余傅事件」是林彪一手製造出來的冤案，但當年他並沒有出來替楊成武講什麼話，反而參與其中，扮演了執行者的角色，這點讓周很不好受，在「林彪事件」後，周對楊成武全家實行保護性轉移。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6。

[34]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14；〈中央首長在接見軍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8 年 3 月 2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聶榮臻的兒子聶力表示康生所指的黑後台是指聶榮臻，聶榮臻在其回憶錄裡也提到當時他打電話問葉群，黑後台指的是誰，葉群沒說黑後台是指他，但也沒說不是他。聶力，《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年），頁 341；聶榮臻，《聶榮臻元帥回憶錄》，頁 674-675。

[35]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頁 136-137。

[36]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36；秦維憲，〈反對張春橋的“胡守鈞小集團”〉，《炎黃春秋》，期 9（2005 年），頁 11-12。

話在外頭流傳，游雪濤小組在外蒐集資料後認爲上海正在醞釀第二次「炮打」張春橋。4 月初，張春橋在一次全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總結報告時，張春橋在上台講話時，談到「楊、余、傅事件」，當他在介紹楊、余、傅身份時，錯把余立金的名字說成吳法憲，此事引起很多人的議論。一連串事件後，4 月初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旗」[37]，首先上街貼出「揪出楊余傅黑後台」標語，署名爲三軍無革派。因爲當時張春橋是南京軍區第一政委，所以徐景賢等人並沒有把張春橋和黑後臺聯想在一起。此外新華社認爲，上海召開的「活學活用毛著積極份子代表大會」的消息屬地方活動，所以並沒有向全國發佈。新華總社發佈張春橋出席江蘇、浙江，去參加當地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的報導時，只稱張春橋是上海革命委員會主任，並沒有提到他是中央文革副組長及南京軍區第一政委頭銜，這些事件使得朱錫琪對張春橋有所質疑。不久後《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艾林，傳來北京學生在傳張春橋是叛徒，以及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1909-1996）用黨籍擔保張春橋是叛徒的消息。賀瑞林把張春橋的名字沒有在中央文件傳閱單裡一事告訴艾林，艾林把這個消息告訴朱錫琪，這個消息使朱錫琪更加相信張春橋真的有問題。朱錫琪在 4 月 11 日深夜開會，分析情勢，議論的內容包括上海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新華社爲什麼不報導？爲什麼張春橋沒參加 3 月 27 日的北京十萬人大會？張春橋在參加江蘇省、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時沒有中央文革副組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頭銜？爲什麼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提出要用黨籍擔保張春橋是叛徒？當天的會議提出了好多的疑問，他們將這些疑問印成一份〈十個爲什麼〉的傳單，傳單的署名爲「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爲什麼戰鬥隊」，在第二軍醫大學、復旦大學等處散發。[38]

4 月 12 日，《文匯報》以大字體刊出「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中央文革！」等大標語。報紙一出刊後，學校及熱鬧街道上貼滿了「揪出楊余傅

[37] 徐景賢表示在當時第二軍醫內部有「紅旗」、「紅縱」兩派，「紅縱」支持上海奪權，「紅旗」不支持，「紅縱」在北京主張打倒邱會作，「紅旗」則是支持邱會作、擁護林彪。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40。

[38]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38-142。1967 年 11 月毛澤東將修改黨章的工作交給張春橋，張春橋在草案裡寫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看到後回贈張春橋「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職銜。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244。許世友得知張春橋要擔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兼黨委第一書記時，以現在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沒打過仗的也穿上軍服了的話語來影射張春橋，並且在一次軍區工作會議上編了一首諷刺張春橋的順口溜：戴眼鏡，拎皮包，能總結，會提高，論思想，一團糟。王宣，《毛澤東之劍-名將之星許世友》，頁 219；溫子春、李永春，〈許世友在 1966-1976 年〉（四），《黨史縱橫》，期 8（1998 年），頁 39。

黑後臺張春橋」、「打倒大叛徒張春橋」等標語、傳單。[39]身任上海警備第一政委的張春橋要求上海警備區司令廖政國派部隊保護，廖政國向許世友請示，許世友表示不可行。許世友認爲軍隊要穩定，要堅守崗位，不能讓張春橋調派任何兵馬。[40]後張春橋將「炮打」這一件事告訴姚文元並請他提供意見，姚得知這消息後將此訊息轉告江青，江青決定找中央軍委辦事組[41]李作鵬（1914-）討論這件事。[42]後來李作鵬做了軍隊不介入「炮打」張春橋、覆蓋已經貼出的大字報、不要搞反擊等三點電話指示。除了李作鵬的電話指示外，空軍也通知復旦大學空四軍軍宣隊，向學生表明反對「炮打」張春橋，當時復旦大學是「炮打」張春橋最猛烈的地方，軍方的表態起了很大的嚇阻作用。[43]

12 日晚上，徐景賢、馬天水等人與朱錫琪及《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的人進行辯論，針對「爲什麼戰鬥隊」所提出的十個爲什麼進行論戰，會中馬天水表示他和張春橋共事過，張春橋的歷史他很了解，張春橋沒有被捕也沒有坐過牢，張春橋不是叛徒，「炮打」張春橋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徐景賢、馬天水等人的力挺以及軍委辦事組的李作鵬來電指示所引發的效應下，《文匯報》帶頭引發的「炮打」終被壓制，原本徐景賢等人要繼續追查參與「炮打」的單位，但在張春橋的授意下，就停止追查。張春橋從北京回來後，表示 12 日那天是毛澤東授意要他到北京中南海見毛澤東，毛澤東告訴他只要他向「炮打」者說「無事」學生就無法再「炮打」了。「四、一二炮打張春橋」

---

[39]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43。
[40] 王宣，《毛澤東之劍-名將之星許世友》，頁 219。
[41] 中央軍委辦事組成立於 1967 年 9 月 26 日，該組織對下不單獨行文，不發文件，不下命令，是一個辦事機構，採集體辦公的方式，每日下午 3 時開始辦公，集體討論需要辦理的事情。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頁 677。
[42]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45。徐景賢認爲找李作鵬的原因是因爲：這件事涉及到保邱會作或是反邱會作，所以找邱會作不方便；張春橋在之前的講話時把余立金錯講成吳法憲，把吳法憲扯進來，所以，這些人都不便找。李作鵬是海軍第一政委，又是軍委辦事組成員之一所以可以找他。見前引書，頁 145。
[43]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46。徐景賢表示吳法憲沒介入四·一二「炮打」張春橋事件，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提到吳法憲當眾宣讀來自北京的四點指示。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245。軍隊出面幫張春橋一事，另一個說法是江青請林彪幫忙關心一下，林彪下了一道「春橋同志是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你們要好好處理這件事情」的指示給許世友，許世友說：「派兵就算了，表個態吧。」後來，南京軍區以黨委名義，向所屬部隊發了一份電報，電報內容裡提到，把矛頭指向張春橋同志是不對的。王宣，《毛澤東之劍-名將之星許世友》，頁 219-220。

就在毛澤東一句「無事」下落幕。[44]

關於江蘇、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報導中沒提到張春橋中央文革及南京軍區的身份一事，張春橋表示新華社記者原本有提到，但他認爲中央沒有授權他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賀，他是以上海革命委員負責人身份去的。基於這個理由在審閱稿子時，張春橋就把關於他的身份的相關報導刪掉。[45]

關於引發「炮打」張春橋的原因，張雲生的回憶錄裡提到 1968 年 4 月葉群從「釣魚台」回到辦公室後，就請郭連凱將去年張春橋在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拿出來好好研究，看看張春橋在講話裡是否有問題。事後郭連凱告訴葉群，並沒有發現任何問題，葉群也就沒有再追問下去。這件事過後的某一天，江騰蛟送來一份關於張春橋問題的材料，經過葉群親自修改後，江騰蛟又重新抄了一式兩份，這兩份材料以林彪的署名批出。這二份材料，一份是送給毛澤東，另一份則是由葉群親自送往「釣魚台」給江青、陳伯達及康生。張雲生表示他從一分文件中看到關於上海出現「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風潮，且主導這場「炮打」的人在北京，這次「炮打」是「毛家灣」和「釣魚台」共同策畫的。後來因爲某種原因「毛家灣」和「釣魚台」有授意保了張春橋，這場「炮打」和以往比較不同的是在決定「炮打」和決定保張春橋，「釣魚台」和「毛家灣」都沒有任何人出來公開講話。[46]照理說「炮打」中央文革大將，張春橋本人或是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員應該會反擊，但事後張春橋本人也沒有大動作，可見張春橋對於自己的歷史也有所顧忌。

關於張春橋的歷史問題，1975 年底康生找王海容（1938-）、唐聞生談話，想透過他們將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都是叛徒的訊息傳達給毛澤東。[47]康生還躺在

[44]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44-155；王勇，〈馬天水投靠“四人幫”的結局〉，《黨史文苑》，期 17（2006 年），頁 47。

[45]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40。

[46]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頁 184-190。江騰蛟送來有關於張春橋的材料，應該是指在葉永烈在《張春橋沈浮錄》裡提到西安交通大學紅衛兵在上海徐家滙藏書樓透過葛正慧得到張春橋曾以狄克爲筆名和魯迅有過一番論戰。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250-252。

[47]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二版），頁 434。康生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爲毛近來批四人幫，他怕被波及到，他這麼做是想讓毛對他留下忠誠感。葉永烈，《張春橋沉浮錄》，頁 303、305、307。

擔架上，請人抬他到醫院找周恩來，兩人密談了一個多小時，那次談話的內容無人知曉，但據說康生是告訴周恩來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曾有過政治變節的行爲。[48]爲什麼康生要跟政治上的對手周恩來揭發江青、張春橋曾是叛徒，仍是有待後人去解的謎。

關於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人事安排之際，周知道張受到毛澤東的賞識，甚至有意讓他接班，爲阻止張更上一層樓，周決定將張的歷史問題向毛澤東報告，但毛表示他已知道張的歷史問題一事。[49]毛澤東還數落了向周恩來舉發此事的康生，毛澤東說康生歷來極左，在延安時期就這個樣子了。[50]

在文革期間張春橋的歷史問題一再被提起，毛澤東也表示他已經知道張春橋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51]從現有的資料裡可知 1936 年張春橋以狄克的筆名和左翼文化的魯迅進行論戰，這件事成爲日後張春橋遭受「炮打」時被人提出來批判的事件。[52]張春橋和魯迅之間的筆戰會被說成張春橋是叛徒，應是和張春橋在 1933 年時曾與國民黨復興社[53]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華蒂社有關。由復興社出資創辦《華蒂》月刊，「華蒂」暗含「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同時也是中堅分子，積極爲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54]1935 年張春橋來到上海後，在《大晚報》及其副刊《火炬》上發表文章，1936 年並以狄克名筆名和魯迅展開一場論戰，而《火炬》的

---

[48] 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 1966-1976》（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 2 月），頁 74-175。1974 年 12 月 26 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見中央黨校負責人時，說出了他爲什麼要舉發江青、張春橋歷史問題的想法，康說黨內鬥爭複雜，暹群犯了錯誤，黨要有危險了，要落到壞人手裡。梁紅伍，〈康生死前爲何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百年潮》，期 9（2006 年）頁 22。

[4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40-541；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頁 688。

[50] 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 1966-1976》，頁 15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41。

[51]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頁 688。

[52]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 206。

[53] 民國 24 年在蔣介石授意下由一批黃埔軍校出身的中級幹部及少數文官組成復興社。復興社是時代性之產物，當時法西斯主義興盛一時，成爲開發中國家豔羨的目標。復興社之成立主旨爲創造一國民黨內有組織有紀律的團體。于國勳等著，《藍衣社復興社力行社》（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年），頁 46-47。

[54] 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組，〈從歷史反革命到現行反革命－評張春橋的反革命道路〉，《人民日報》（1977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報 49-97：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9&SelectID=2&ChannelID=5020&Page=1
（2007/3/8）；呂相友，《中國大審判-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圖文紀實》，（瀋陽：遼

主編崔萬秋，而崔萬秋是國民黨復興社[55]特務，張春橋到上海後在崔萬秋的指使下，以狄克之名代崔萬秋與魯迅展開一番筆戰。[56]

在中共發表的歷史材料裡指出，張春橋是奉山東復興社特務秦啓榮之命到延安活動，到延安隱瞞了自己的家庭狀況和反革命歷史加入了中共黨組織。[57]關於張春橋到延安一事，以客觀的角度來看張春橋與復興社人員有過往來應該是事實，但如果說他是國民黨派遣的特務人員，長期爲國民黨效命，這個說法恐怕是日後被硬加上去的，因爲張春橋到延安後一直從事共產主義活動。[58]

張春橋的另一個歷史問題，指的是張春橋的妻子文靜的歷史問題，文靜原名李淑芳，天津人，加入共產黨後到晉察普解放區擔任宣傳工作，因爲常在《晉察冀日報》投稿，所以和張春橋結識，進而相戀。1943 年 12 月李淑芳被日本侵略軍押到石家莊，關進日本憲兵司令部，爲了苟活，她向日軍投降，並進宣傳班進行訓練，讓她對八路軍進行心戰，李淑芳留在石家莊日本憲兵特別警備隊期間，撰寫反共宣傳文章，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喉舌。當八路軍在華北反攻，駐石家莊的日軍潰逃後，李淑芳被留在石家莊，留在石家莊的李淑芳與張春橋相會後，張春橋安排她進入報社擔任編輯工作，並改名爲文靜。抗日戰爭勝利後，張春橋與文靜結爲夫妻，文靜曾向日本侵略者自首變節的事很快就被黨組織掌握，在後來

寧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67；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35-36。

55

56 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組，〈從歷史反革命到現行反革命－評張春橋的反革命道路〉，《人民日報》，1977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報 49-97：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9&SelectID=2&ChannelID=5020&Page=1
（2007/3/8）；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53。青年黨元年李琪先生表示，中共將崔萬秋稱爲國民黨的骨幹分子是與事實完全不符合的，崔萬秋早年留學日本，爲青年黨黨員，派別門戶觀念淡薄，他既與國民黨人士交往，也與許多左翼文人或中共黨員做朋友，田漢、廖沫沙、張春橋就是其中的一部份。丁望，《王洪文張春橋評傳》（香港：明報月刊社，1977 年 12 月），頁 149。

57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日報》評論員，〈新老反革命結成的黑幫〉，《人民日報》，197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組，〈從歷史反革命到現行反革命－評張春橋的反革命道路〉，《人民日報》，1977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報 49-97：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9&SelectID=2&ChannelID=5020&Page=1（2007/3/10）

58 丁望，《王洪文張春橋評傳》，頁 161。1976 年 10 月姚文元被隔離審查後，從他的住處找到了關於張春橋和文靜的四件材料，其中有三件是上海市委組織部審查張春橋參加國民黨復興社和黨籍問題的重要材料，另一件是關於文靜在政治歷史問題上有重大問題的材料，姚文元將這些材料隱藏了八年之久。呂相友，《中國大審判-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圖文紀實》，頁 54-55。

的審幹、肅反的政治運動中，她的政治歷史問題受到了反覆的審查，也因爲這段歷史使得她在政治上不得志。六十年代初期華新社上海分社原建議請文靜擔任副社長，但因爲文靜有過那一段歷史，所以並沒有被市委批准，文靜的歷史成爲張春橋的一塊心病。[59]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裡表示，在文革期間沒有是非對錯的準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雖然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多次被提及，但爲了政治上的需要，毛澤東始終不讓人提及張春橋的歷史問題。[60]

二、張春橋與游雪濤小組

游雪濤（1935－），出生於江蘇貧苦人家，父親很早就去世了，母親辛苦工作養活他們幾個兄弟姐妹。游雪濤在 16 歲時到上海絨布廠當工人，1949 年解放後，又到工廠裡學習文化，喜歡看書，寫文章，並在報紙投稿，後來他被調到報社做編輯、記者，195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游雪濤在團市委《青年報》工作。文革以前他就不斷地跑文藝界，徐景賢在《青年報》發表過文章，因爲工作上的關係，和徐景賢有所來往。游雪濤的妻子吳錫敏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後被分配到青年話劇團工作，因爲吳錫敏的關係，所以，游雪濤與文藝界造反派往來很密切。徐景賢起來造反後，游雪濤得知徐景賢的造反與張春橋、姚文元有關，就常去找徐景賢，藉機和他靠攏、接近。[61]

游雪濤知道，上海武康路二號是張春橋及姚文元對外聯絡的一個重要據點，且張春橋回上海興國路招待所時每天皆會派人向徐景賢拿上海市委機關聯絡

---

[59]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390。在 1968 年「炮打」張春橋時，文靜是叛徒的標語出現在上海，上海市委的幹部從幹部檔案箱中秘密調閱文靜的檔案，這件事讓張春橋很生氣，除了撤了一些幹部外，並將文靜的檔案取走，並請王少庸將這份檔案鎖在他的辦公室裡。有一次外地派人到上海外調，因爲有一位女幹部被調查時談及她和文靜叛變投敵的經過，所以他們想和文靜當面談談，張春橋拒絕文靜與外調人員見面。接二連三的事件，讓張春橋意識到文靜的歷史問題將會讓他招致很大的麻煩。徐景賢表示鄧穎超在 1973 年 9 月陪周恩來到上海時，鄧穎超到幹部家裡探望，鄧有到康平路王少庸家，但卻沒有到同在康平路大院的張春橋家，鄧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爲她知道文靜的歷史，她不見文靜，表明了鄧的原則性，這件事傳到北京，傳到張春橋的耳裡後，對張而言是一個嚴重警告，十大以後取得更大權力的張春橋，意識到自己正處在政治上的關鍵期，他將面臨更大的鬥爭，不能有把柄在他人手裡，而鄧穎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靜，真正促使張春橋下定決心要和文靜離婚的關鍵因素。見前引書，頁 392-393、395-396。

[60]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330-331。

[61]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13-114；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213。

站所編的情況動態及其他各種各樣的動態和情況。1967 年 1 月游雪濤拿了一份資料來找徐景賢，希望他能將這份資料轉交張春橋、姚文元。資料裡有二份已經打印好的《掃雷簡報》、照片、簽字條，而簡報內容是專門反應上海走資派如何隨便幫人簽字發錢。徐景賢知道游雪濤和北京的部分紅衛兵有來往，和文藝界的人有串聯，本身並沒有屬於自己的組織，於是就問游雪濤關於那份資料上的署名「掃雷縱隊」是屬於何種組織，游雪濤表示「掃雷縱隊」是他向幾個伙伴自己組織而成的，地點就在他自己的家裡，組織的宗旨是要掃除無產階級司令部前進道路上的一切暗雷，因爲，覺得那份資料本身有一些價值，所以，徐景賢就把那份材料留了下來。在上海尚未發生「一、二八炮打」張春橋事件前，游雪濤送給徐的資料裡就有北京的紅衛兵在上海音樂學院咒罵張春橋、姚文元的訊息。游雪濤會派人到別人身邊去打聽、刺探各式各樣的狀況，徐景賢覺得他的資料比較可靠，答應他將替他把資料轉送給張春橋、姚文元，希望他以後能將資料密封好親自送來，如果徐景賢不在，也可以請王鋼、陳冀德代爲轉送。[62]

游雪濤的「掃雷縱隊」採取地下情報方式所做出來的《掃雷簡報》很快的受到了張春橋及姚文元的注意。姚文元覺得「掃雷縱隊」的做事方法並不是很贊同，但張春橋覺得雖然「掃雷簡報」的內容不可全信，但仍有一些資料是值得參考的，例如北京的紅衛兵在上海音樂學院罵張春橋、姚文元的消息就是透過這一份資料才得知的。關於「掃雷縱隊」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看法是不同的。張春橋並不排斥游雪濤送「掃雷簡報」，張春橋知道游雪濤是以特務手段進行活動的，所以，他要徐景賢及王少庸提醒游雪濤要小心謹慎。游雪濤在知道張春橋對於他所提供的資料很感興趣後，更加放手進行掃雷行動。[63]

張春橋講過游雪濤那一種工作手法只有非常時期才能用。一月革命奪權前後的那一段時期上海秩序混亂，游雪濤提供了不少的幫助，上海市革命委會成立

---

[62]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14-115。上海「一、二八」「炮打」張春橋事件發生時，被「紅革會」抓走後又被釋放的徐景賢，是游雪濤調了一輛汽車將他送回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後來因爲「掃雷縱隊」的人愈來愈多，游雪濤要求徐景賢將市委機關聯絡站對外接待處讓給「掃雷縱隊」使用。詳見前引書，頁 115。

[63]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16。

後，公安機關逐漸恢復正常工作，社會秩序也漸漸穩定下來，徐景賢建議將「掃雷縱隊」解散，請游雪濤擔任「市革會」群運組副組長。在張春橋的同意下，透過市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轉告游雪濤，將安排他擔任群運組副組長，請他解散「掃雷縱隊」，其成員有的回原單位，有的也可以到群運組工作。到群運組工作的游雪濤和張春橋的妻子李文靜因為編輯《動態簡報》而有所接觸，在張春橋和李文靜的支持下游雪濤離開群運組，到永福路 244 號重新建立游雪濤小組。[64]

游雪濤小組常以「康辦」[65]的名義對外進行工作，游雪濤所從事的活動主要有：監控走資派及老幹部們的活動以及偵察一切反對中央文革及反對張春橋、姚文元的言行活動；掌控上海各主要群眾組織內部的情況、聯絡江蘇、浙江的主要造反派組織。用的方法，除了偵察調查審訊之類外有時也使用了暗中綁架的手段。重新建立後的游雪濤小組在游雪濤被勞改之前總共編《動態》、《動態增刊》及一些手寫專題彙報，總共有 300 多期，其中張春橋批過 54 件，可見張春橋對這些報導的重視。[66]

1968 年 11 月 30 日游雪濤送張春橋一份〈一年工作總結〉，文中提到：「一個非正式的工作機構，二十幾名沒有合法活動身份的'小小老百姓'，由於是在兩派鬥爭激烈的時候，突然離開戰場的，又長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幹什麼，引起別人無意的猜測和有意的誹謗。這一年來，大量的工作是同敵人進行隱蔽的鬥爭，從中央到地方直接間接地摸了不少老虎屁股。一年多來，極大部分同志始終像戰士處於一級戰備那樣，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睡覺就是工作，什麼時候有情況，就什麼時候出勤。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我們在一條特殊的戰線上戰鬥了一年兩個月，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戰鬥指揮部提供了大約一百萬字以上的各種情況反映和調查報告，預報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現

---

[64]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23-124。
[65] 「康辦」指的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康平路辦公室。
[66]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25。游雪濤的情報只送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等極少幾個人。有的資料只送張春橋一人。王洪文，卻始終被游雪濤排除在送閱情報的名單之外。游雪濤也將王洪文及「工總司」列入偵察的對象。王洪文在得知游雪濤探聽「工總司」的高層狀況後，一度揚言要追查游雪濤。前引書，頁 124。關於游雪濤所進行的一些掃雷行動可參閱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26-129；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217-223。

了一批混進革命陣營的反革命兩面派。」[67]張春橋在〈一年工作總結〉上批了二句話：「『已閱，退游雪濤同志。謝謝同志們。』、『你們的經驗，我還要想一想』」[68]，關於張春橋所批示的這二句話，徐景賢表示，第一句話是對游雪濤的勉勵，要從張春橋的口中說出「謝謝同志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第二句話則是張春橋爲了將來替自己開脫，所留下來的伏筆，因爲張春橋對徐景賢說過：「游雪濤這樣搞法不行，他們的材料太懸了。誰相信了他們，被他們牽著鼻子走，會犯錯誤的。」[69]但是爲了知道更多對手們的資料，張春橋對游雪濤特別關照，曾經多次爲他的特務活動提供各種條件。

有了張春橋支持，游雪濤甚至將他的情報系統延伸到南京軍區、上海警備區、空四軍。他不僅在簡報裡寫許世友支持廖政國（1913-1972）在上海奪張春橋的權，也將軍隊內部狀況整理成〈關於警備區整理春橋同志黑材料問題的點滴〉。游雪濤小組找人挖上海警備區的行徑引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不滿，插手公檢法，得罪了空四軍政委王維國（1919-1993），再加上當時張春橋和南京軍區關係緊張，毛澤東希望他們兩人改善關係，互相團結，且張春橋也察覺軍方已開始注意游雪濤，所以，他希望游雪濤將他的小組解散，到「市革會專案辦」當領導核心。游雪濤雖有到「市革會專案辦」，但仍和以前的同伴聯繫，後來，張春橋害怕連累到自己，1970 年 8 月在張春橋的指示下將游雪濤撤職下放勞改。[70]

徐景賢在其回憶錄裡表示，現今很多文章把游雪濤小組稱爲「掃雷縱隊」或「244」小組，用它後來的所在地永福路 244 號命名，但他覺得這二種稱呼都不是全面。因爲「掃雷縱隊」只是其中一段，後來才演變成「244」的。張春橋、

---

[67] 轉引自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31。徐景賢表示，這份報告游雪濤也送他一份，他把這份報告放在保險箱裡，文革結束以後這份報告被有關部門拿走。前引書，頁 131。

[68]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31。

[69]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31。

[70]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31-134。接到要被下放勞改後的游雪濤寫了一封信給張春橋，認爲自己是被王洪文、王少庸、王維國、王秀珍等人陷害，張春橋看完信件後非常生氣，認爲是跟無產階級司令部下戰書。游雪濤接到被下放勞改的通知後推說自己身體不好，所以並沒有去。廬山會議後游雪濤表示對陳伯達的同情，在清查五、一六運動時，他以前的部下揭發了他以前的種種行徑，這些資料送到王洪文那裡後，王洪文覺得他的很多言論攻擊文化大革命，反對毛澤東、同情陳伯達，建議將他隔離審查，張春橋也批准了這項決定。1975 年撤銷隔離，提議將他送到「五七」幹校。前引書，頁 134-135。

姚文元、徐景賢、王洪文、李文靜都是稱呼它爲「游雪濤小組」，內部從來沒有稱呼過「244 小組」或「掃雷縱隊」。[71]

第三節 張春橋與陳伯達、陳毅

一、九大政治報告

1969 年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作出兩項重大決議：一是將劉少奇開除黨籍；二是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72]九大的各項具體準備工作中，毛澤東最關心的是九大報告的起草，2 月 7 日毛召集周恩來、林彪、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開會，會中討論了第三個五年計畫具體指標，也決定九大報告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起草，會中商定政治報告稿在 2 月 20 日交卷，3 月 15 日召開九大。2 月 19 日毛澤東問陳伯達是否有把握在 20 日時交稿，並希望陳伯達與張春橋、姚文元能找林彪談談。3 月 3 日毛澤東對於陳伯達延遲交稿，而且又不說明理由感到很生氣。3 月 12 日，毛澤東決定改由康生主持，張春橋、姚文元負責撰寫，另外再起草一份報告。毛澤東除了點明報告主題外，又表示報告中可以不提鄧小平，但要提及劉少奇。3 月 15 日時毛澤東表示將給張春橋、姚文元二人半個月時間起草九大報告，並說九大報告上不要講「二月逆流」，這次的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3 月 16 日起張春橋、姚文元陸續將報告分批送審，九大報告經過毛多次修改後，終於在 3 月 31 日完稿。這就是起草九大報告的大致過程。[73]

關於陳伯達所起草的九大報告，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提到，陳伯達在接到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任務後，撇開張春

---

[71]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13。游雪濤小組是確實存在的，關於游雪濤小組的資料並不太多，除了徐景賢回憶錄有提到這一段歷史外，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也有所著墨，不過葉永烈表示自從發生「一‧二八」「炮打」張春橋事件後，便決心建立一支「掃雷縱隊」，請參閱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212。

[72]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33、1537。

[73]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45-1546；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頁 279、281、283-28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68-271。

橋、姚文元二人，自己一個人經常往「毛家灣」跑，和林彪商量怎樣寫。[74]吳法憲則指出，陳伯達去請示林彪，林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陳伯達根據林彪的意見寫了一個提綱，並將政治報告的標題定爲〈把我國建設成爲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陳伯達的第一部分內容主要是強調把中國建設成爲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75]而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則回憶說，陳伯達對於毛澤東決定讓他負責起草九大報告一事感到很高興，對於另外兩位負責人張春橋及姚文元，陳則對秘書們表示不要理會他們，因爲他們兩人和他的想法不一樣，他要自己寫，他們兩人願意怎麼寫就怎麼寫好了。陳伯達跟兩位秘書說他的主題設想，陳伯達認爲經過了政治上的大革命，接下來應該是要掀起生產上的大躍進，希望兩位秘書幫他找這一方面的資料。由於是林彪要在九大會議上作報告，所以林彪就請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在「毛家灣」談了一下，表示林彪委託他們代勞，報告內容由陳伯達考慮，林彪就不多過問了。陳伯達回到辦公室後，很快的擬了一個題目爲〈爲把我國建設成爲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提綱，題目下還列了幾個小標題，陳伯達帶了這個提綱找林彪商量過後，回來就改成總題目下有十個小題目，陳親筆給了一個報告並附上提綱呈報毛澤東，毛很快圈閱退回。在陳伯達埋首寫報告的這段期間，姚文元、張春橋曾來電，但陳伯達透過秘書表示，要他們根據提綱，想怎麼寫就怎麼寫。[76]然而林彪辦公室祕書張雲生的回憶中，

[7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69；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46。

[75]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39。

[76]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期 2（2003 年），頁 88-89。王文耀、王保春提到 1969 年 1 月底陳伯達表示毛澤東把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一事交待給他，筆者查《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時發現 2 月 1 日周恩來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九大的準備工作，2 月 7 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與會成員有林彪和中央文革碰頭會全體成員，而張雲生在其回憶裡也是說 2 月裡的一天林彪從毛澤東處回來，要他在九大時作報告，所以，王文耀和王保春的記憶可能有點誤差。王文耀、王保春提到他們在找資料的過程中，汪東興給過一批北京「六廠二校」的資料。因爲陳伯達對北京市抱很大的希望，認爲謝富治應該會支持他，但他們打電話向謝富治要資料時，謝富治表示寫九大報告時，中央文革要北京市的資料是可以給的，其他人則不能給，陳伯達不完全相信謝富治不提供他資料。王文耀表示在人民大會堂 118 開會後，他聽到陳向謝要資料，謝對陳說要陳不要怪他，如果是中央文革跟他要資料，要多少給多少，但陳要他則不能給，請陳能理解他。陳碰了軟釘子後心情很不好。後來陳要他們轉而向河北省李雪峰要一些材料。前引文，頁 89。汪東興在其回憶裡提到，毛澤東對於陳伯達起草的初稿有過批示，但陳伯達並沒有告訴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爲此江青以「封鎖毛主席聲音」爲理由，同陳伯達大鬧了一場。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香港：三

對於這件事卻有另外不同的說法。他回憶說 1969 年 2 月的一天下午，林彪表示毛澤東要他在九大時作政治報告，並且說這次報告不必事先寫稿子，用口頭講，然後整理一下即可，如果需要對外發表，摘用記錄稿。林彪向毛提出在黨代表大會上作正式報告，最好還是請中央文革寫稿子，如果有必要他再作口頭報告，毛澤東同意他的建議，並決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組成一個政治報告起草小組。林彪跟祕書說他向來不習慣念別人準備好的稿子，只願意自己順口講，所以他想採取一個平行作業，既準備一個正式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講話用的條子，而口頭講話就用十二中全會上講的那六個題目。林彪在 2 月一旬邀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到「毛家灣」商量起草九大報告的事，因爲林彪會客時不喜歡工作人員在旁，所以會談內容不清楚，但從會後聽到張春橋、姚文元對陳伯達說你就先動筆，有需要時就隨時找，商談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應該是融洽的。在陳伯達的起草稿子被否決後，陳伯達請葉群將他的稿子拿給林彪看，葉群還特定交待祕書們在跟林彪講時不要說得太細，以防林彪突然對陳伯達所寫的內容產生興趣。[77]根據這三種說法，可以看出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確實有一起到「毛家灣」與林彪一同商量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相關事宜，但林彪對九大政治報告內容的設想和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主題並不太一樣，所以，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 1949-1976》指陳伯達所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是陳伯達和林彪兩人商量的，仍有待更多的史料來證明。[78]

陳伯達的祕書王文耀、王保春回憶說，陳伯達曾將他所起草的九大治政報告稿交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這篇報告卻被張春橋、姚文元攻擊爲是在鼓吹「唯

聯書店，1999 年），頁 87；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 2 版），頁 17。

[77] 張雲生、張叢坤，《“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 年），頁 463；張雲生，《毛家灣紀實》，頁 210-213。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所講的六個題目是：第一個，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個，是文化革命的勝利、意義和它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第三個，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線、做法的問題；第四個，是主席對馬列主義的偉大發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革命怎樣繼續前進的問題；第五個，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個，是今後怎麼做法。〈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林彪〉（1968 年 10 月 26 日），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78] 王年一、何蜀、陳昭，〈毛澤東逼出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期 2（2004 年），頁 139-140。

生產力論」而遭到否定，陳伯達的稿子遭到否定後，葉群還打電話來安慰他，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由中央辦公廳送來後，陳伯達說他們的稿是伯恩斯坦的，運動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他們就是搞運動，陳伯達並要他們比較張、姚和他所寫的稿子。後來中央開會討論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時，陳伯達很激動的抨擊了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並表示還是要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張春橋則反駁陳伯達，說陳伯達說是唯生產力論，這次會上的爭論很激烈。後來毛主席表示可以考慮在報告中加進陳伯達的意見。[79]陳曉農在《陳伯達最後口述遺稿》裡提到在中共中央確定使用由張春橋、姚文元所起草的報告後，中央政治局曾經特定開了一次批判陳伯達的會議，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陳伯達回憶說：討論張春橋、姚文元稿子時，我批評他們的稿子是伯恩斯坦的觀點：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雖然我寫的稿子已流產，但我說的話異常激怒了康生、江青、張春橋。他們要找機會對我提出的這個比擬進行報復。過了兩天，中央開了一個會，對我進行了言辭極其激烈的斥責和批評，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他們主要是批判我提出的以發展生產爲主要任務的觀點，說我是唯生產力論，是修正主義。我倒了以後，他們在報上反過來說我是伯恩斯坦。毛澤東在會上說陳伯達本性難改，總是看重經濟，說帝國主義的本性不可改變，陳伯達的本性也不可改變。[80]從王文耀、王保春及陳伯達的回憶可看出，陳伯達對張春橋、姚文元所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很不贊同，陳伯達和張春橋在政治見解上有很大的分歧。

關於張春橋與姚文元所起草的九大報告，根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叫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另外起草報告後，毛澤東曾把他們找來，講了有關報告的思想和框架，而康生在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過程中藉口生病不參加討論。[81]張春橋、

---

[79]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頁 90。王文耀、王保春表示，陳伯達曾將寫好的第一部分稿子報送毛澤東，但卻遲遲不見回音，九大後，收到從毛澤東那裡退回的九大政治報告稿的第一部分，毛原封不動退回，並在封面上寫著退陳伯達同志，此時我們才知毛澤東從未拆封看過。前引文，頁 89、91；滌生，〈"文革"中陳伯達爲什麼選擇投靠林彪〉，《黨史縱橫》，期 11（2005 年），頁 53。

[80]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361。

[81]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頁 17。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

姚文元的稿子出來後毛澤東表示：「看了一遍，寫得好，只需要個別詞句的修改。」[82]認爲他們的稿子大致上可以用，並且對於如何修改提供了很多具體的意見：「一、四、五部分問題較少，略作修改就可以了。二、三部分問題較多，需要大修或重寫，缺點是論點過多，近於集納，可以考慮兩部分集合起來，把重複的刪掉，不要去描述許多階段，中央文革成員的名字一個也不要提」[83]

張春橋、姚文元版的九大政治報告，深受毛澤東的肯定，但卻被陳伯達批評爲伯恩斯坦的觀點：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之所以會深受毛澤東肯定，除了毛澤東曾點明報告主題外，張春橋緊跟著毛澤東思想也是一個很關鍵的要素。張春橋很可能是從 1967 年 5 月 18 日《紅旗》、《人民日報》發表了〈偉大的歷史文件〉的編輯部文章中看出毛對文化大革命所抱持的態度是要不斷的革命、繼續的革命：「現下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民眾，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84]

陳伯達所起草，但卻被張春橋等人指爲「唯生產力論」的九大報告，應該也是陳伯達在揣摩毛澤東的想法後所寫出來的。毛澤東在 1967 年 8 月 16 日同阿爾巴尼亞兩位專家談話時表示：「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85]1968 年 10 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說：「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麼到底呢？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86]以毛澤東的

（1949-1976）》裡表示毛澤東與中央文革成員碰頭會談會裡就已提及九大報告的主題。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45。

[82]〈對林彪中共九大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1969 年 3 月、4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11。

[83]〈對林彪中共九大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1969 年 3 月、4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11。

[84]〈偉大的歷史文件〉（1967 年 5 月 1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85]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499。

[86]〈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68 年 10 月 13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

講法，1969 年文化大革命即要結束，那麼下一步以經濟建設爲主也就順理成章，然而事實上是陳伯達的認知和毛澤東仍有一段距離，毛澤東所要的九大報告是突顯出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是繼續革命，而非著重在發展經濟建設。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會議期間共開了三次全體大會，其他時間則是小組討論。[87]林彪問過秘書張雲生那二份稿子哪一個比較好，並且很輕蔑地說不要相信那些大秀才，這句話是衝著張春橋、姚文元說的。對於這一份報告，林彪只注意毛澤東的批示和修改，3 月底周恩來把經過中央文革碰頭討論通過的九大政治報告送林彪審閱，林彪還是一字未看一字未改，只在稿子封頁上寫上呈主席審批。[88]由於林彪對九大的政治報告改用張春橋、姚文元二人所起草一事很不贊同，所以在九大上他只是照著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89]林彪甚至於還對葉群說多念錯一點才好，可見得林彪對張春橋、姚文元二人所起草的報告的厭惡之情。[90]由於林彪對九大整個政治報告有看法所以從來沒有讀過一遍，因此在讀報告時有些地方讀得不太順暢，這個舉動顯示出林彪事先可能沒有看過，也顯示出林彪並不贊同這份報告，林彪的態度引起了江青、康生的不滿。[91]從九大政治報告起草的過程，可以看得出毛澤東很不滿意陳伯達的觀點，同時毛澤東和林彪對當時的主要任務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二、張春橋與陳毅的衝突

在起草九大報告期間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張春橋如何在此期間策劃一場在九大整陳毅的緣由。陳毅擔任過新四軍代軍長、三野司令員[92]，解放後接任上海首任市長兼軍管會主任，在上海享有很高的威望，張春橋爲了讓自己在上海能

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87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47。

88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頁 214；周敬青，〈毛澤東對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確立和廢黜〉（中），《黨史縱橫》，期 12（2003 年），頁 33。

89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頁 18。

90 張聶爾，《風雲“九一三”》（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 年），頁 198。王年一、何蜀、陳昭，〈毛澤東逼出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頁 140。

91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42。

92 即第三野戰軍司令員。根據中央軍委 1949 年 1 月 15 日命令，將華東野戰軍改稱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是由抗日戰爭時期的新四軍和部份八路軍山東軍區部隊，逐步改編擴建而成的。龍介秋、張學讓、柯煒編著，《中國軍事辭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 年），頁 879。

站穩腳步，爲了上海市的黨政一把手，必須削弱陳毅在上海的影響力。[93]八屆十二中全會後，張春橋在上海市革會擴大會議上傳達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當天會上張春橋把重點擺在陳毅身上，當天會上張春橋表示，陳毅在上海工作過一段時間，所以仍有人對他有著過分的迷信，竟然在聽了陳毅被批後掉眼淚，其實陳毅的老底是，他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反對毛澤東，他在軍事上的成就並不是像大家所說那樣神乎其神，其實他不會打仗，他只會下棋。[94]但籌備九大期間張春橋通知徐景賢、王洪文、王少庸，要他們通知陳毅說上海打算選陳爲「右的代表」，看看陳的態度如何。徐景賢寫了一封信給陳毅：「**根據中央的決定，你作為"九大"代表將由上海選舉產生。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萬共產黨員同意推選你作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95]陳毅回信表示對於上海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選他作爲右的代表參加「九大」，感到慚愧。張春橋看了陳毅的回信後要徐景賢等人搜集陳毅資料，準備在「九大」時與陳毅一戰。徐景賢等人將陳毅的材料編成《陳毅同志言論小集》[96]徐景賢覺得這個標題上綱上得不夠，所以將標題改爲《陳毅反動言論小集》，送給張春橋、姚文元過目後印了八十多本，準備在「九大」時發給上海的代表。在張春橋的指示下上海舉辦「九大」代表學習班，並發給每一位參加者一冊《陳毅反動言論小集》，要他們預作準備，以便在「九大」和陳毅展開鬥爭，除陳毅外張春橋也指名搜集了葉劍英、譚震林等二月逆流幹將的資料，準備在「九大」向他們展開攻擊。[97]九大會上陳毅被編在華東小組，這個組裡有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因爲上海代表事先已收到《陳毅反動言論小集》，所以陳毅在會上不管說不說話都會被批判，整個九大期間陳毅

---

[93] 徐景賢，〈張春橋"九大"整陳毅的經過〉，《湖北檔案》，期 3（2004 年），頁 12。
[94] 徐景賢，〈張春橋"九大"整陳毅的經過〉，《湖北檔案》，頁 12。
[95]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71。
[96] 這本小冊子是將陳毅從 1953 至 1966 年期間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種會議上的報告、講話及接待外賓時的談話記錄摘抄而成的，共分爲九個部。王洪文表示，這本小冊子分給九大代表，是爲了整陳毅。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72；呂相友，《中國大審判-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圖文紀實》，頁 44-45。
[97]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67-174。陳毅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說他不當九大代表，他受到許多批評，不夠格。毛澤東聽了以後說他認爲陳毅當九大代表是夠格的。〈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1968 年 10 月 3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1210-1211。

的處境十分艱難。[98]徐景賢表示在北京京西賓館開上海代表會議時，張春橋故意不在場，讓他和王洪文等人進行對陳毅的批判，王洪文當場送陳毅一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陳毅當天被批得很慘，隔天張春橋從「釣魚台」過來京西賓館時表示，不能光批判陳毅，也要讓陳毅講講話。進行第二次開會時，陳毅發表講話，談及自己的革命歷史，當場徐景賢拿出已準備好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簡報，陳毅的歷史都寫在簡報裡。簡報的內容及徐景賢的煽動性發言，導致現場打倒陳毅的吶喊聲到處響起。當年陳毅在紅四軍七大上的確和毛澤東有過爭論，這段歷史中央早已做過結論，陳毅也為這件事做過多次檢查，但在 1968 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有人把這段歷史提出來，讓張春橋等人可以藉此機會在九大上對陳毅做出批判。當天會後吳法憲請徐景賢等人到秘書處找吳法憲，吳法憲表示九大代表已開了兩二次會幫陳毅做檢討了，周恩來指示要適可而止。所以就不要再開下一次的會議了。吳法憲又表示毛澤東指示九大新選出的中央委員要讓捲進「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選上。由於周恩來的保護，張春橋和徐景賢就停止了在九大整陳毅的行動。[99]

張春橋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因為陳毅在紅衛兵召開批鬥他的大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話，這篇即席講話在事後由工作人員整理成題目為〈我這個外交部長〉，這次講話的內容直接批中央文革，也帶有反對文化大革命宣言，陳毅的講話被紅衛兵記錄下來，傳到中央文革江青那裡，江青將此記錄稿送給毛澤東看，但毛並未表態。這份記錄稿傳到林彪那裡時，林彪很不高興，要吳法憲在軍隊一定範圍裡批陳毅，江青、張春橋得知林彪的反應後，江青要張春橋具體落實這件事，所以張春橋幾經思考下才決定在上海搜集陳毅的資料，並請徐景賢、王洪文等人在上海進行此事。[100]

---

[98]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265-266。九大後陳毅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在中央軍委組成人員中雖仍名列軍委副主委，但當時中央軍委在楊余傅事件後就被軍委辦事組取代，所以陳毅只是掛名，不能過問軍委的工作。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頁 266。

[99]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174-181。1980 年 12 月 6 日王洪文在接受調查時表示他是在張春橋的指使下編印《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呂相友，《中國大審判-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圖文紀實》，頁 45。

[100] 滌生，〈陳毅發表一篇特殊演講始末〉，《黨史縱橫》，期 8（2006 年），頁 11-12。

第五章　九大後的張春橋（1969~1976）

第一節　林彪對張春橋的攻擊

九大以後中央文革的取消，在客觀上是削弱了江青等人的勢力，雖然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九大後進入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但江青等人在政府和軍隊裡並沒有實權，江青發牢騷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閒人」[1]林彪等人在九大後權勢達到高峰，林彪不僅成爲法定接班人，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人更是控制了軍委辦事處，因爲九大後情勢的變化，致使原本曾是密切合作的江青、林彪二大集團產生了一些衝突。[2]

林彪與江青、張春橋等人之間的衝突在九大選舉前就已浮現，葉群跟吳法憲等人表示林彪覺得江青太猖狂了，而且張春橋、姚文元過去不過是無名小卒，黃永勝也說張春橋曾嘲笑他是個什麼也不懂的大老粗，黃永勝則回說張春橋在晉察冀時不過是個小記者，陳伯達也說張春橋在上海不過是個小癟三，爲殺他們的銳氣，在選九大的中央委員時不可以把票全部投給他們，要殺殺他們的銳氣。[3]九大以後，「毛家灣」與「釣魚台」之間的關係愈來愈複雜、微妙。林彪、葉群要去蘇州時，葉群曾向工作人員宣布對於她和林彪要去蘇州一事對外要保密，特別是對上海的張春橋，免得驚動張春橋來蘇州看他們，葉群對張春橋是有所戒備的，而她對張春橋的戒備是出於她對江青的戒備使然。其實張春橋在林彪抵蘇州的第二天就已知道了，但他佯裝不知，想等林彪有所動作再說。[4]毛澤東在帶張春橋等人去蘇州前曾批評張春橋說，林彪人在蘇州，你們怎麼都不往來，張春橋表示是因爲林彪保密。[5]當毛澤東帶著張春橋到蘇州去看林彪，毛澤東對林彪說

---

[1] 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 1557。

[2]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57-155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3 月第 36 版），頁 272。張耀祠表示他問過汪東興爲什麼會把林彪爲接班人寫入黨章，汪表示是江青建議的，張春橋第一個表示贊成，康生也表示贊成。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香港：三聯書店，1999 年），頁 85-86；陳立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關係始末〉，《黨史縱覽》，期 10（1994 年），頁 23。

[3]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頁 744。

[4]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年），頁 220-221。

[5] 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頁 164。

周恩來年紀也大了，毛澤東自己年紀也大了，而林彪身體又不好，以後準備由誰來接棒，問林彪覺得張春橋怎麼樣，林彪一時不知怎麼回答。後來，林彪藉著毛澤問他，到底要怎樣才能防止「出修正主義」這個問題時，林彪趁機表示還是要靠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從小跟著毛澤東革命的人才行，除此之外還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6]但不管林彪的本意如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聽到林彪的這段話後，一定會認爲林彪的這一番話，是對著他們而來的。

1970 年 3 月 8 日毛澤東透過汪東興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修改憲法的意見，並且建議不要設立國家主席，如果大家認爲要設的話，毛澤東本人不想當，而能擔任的人選也就只有林彪了，汪東興傳達完毛澤東的指示後，當天會議就結束了。會後汪東興本來想到「毛家灣」向林彪傳達毛澤東的意見，但因爲林彪已經就寢，所以就請葉群代爲轉達。汪東興去不成「毛家灣」後，就邀請葉群及「四大金鋼」一起到他家坐坐，當天江東興提到了毛澤東說過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才能當。因爲自從九大後，汪東興一直和葉群、李作鵬、吳法憲等人有密切的往來，所以，毛澤東的一番話對他們來說意義非凡，他們認爲這是毛澤東對林彪的信任與關懷。[7]就是因爲汪東興的這一番話，才會葉群等人覺得毛澤東有意讓林彪任國家主席。

3 月 13 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小組，由康生擔任組長，其他的成員有陳伯達、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1923-1988），關於是否設立國家主席的問題，也將留待憲法修改小組去研究，在毛澤東同意這個方案後，憲法修改小組就在懷南堂的會議室，開始進行工作。[8]九大後軍委辦事處和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就分成兩派，因此在討論設不設國家主席這

---

[6] 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頁 21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7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388。李文普（曾任林彪衛士長）表示，張春橋到過蘇州，到過毛家灣，趾高氣揚，要他寫講話稿他不寫，推給陳伯達，不把林彪放在眼裡，因此，林彪真的對張春橋很不滿。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蕭思科組稿，〈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國內版），期 2（1999 年），頁 14。

[7]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75-776。

[8]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76-777。

個問題時，時有爭論，陳伯達、李作鵬、吳法憲堅持林彪的意見，認爲國家主席還是要設，由毛澤東來當國家主席，考慮到毛澤東不便出國訪問，可以設國家副主席，總之是要設國家主席，但張春橋、康生則不同意設國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設委員長，只設人大常委會主任，在設不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很大的衝突，爲了緩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憲法上寫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9]

5 月 17 日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林彪準備向毛澤東進行彙報前，先到林彪住處進行彙報，提到軍委辦事處已派吳法憲及李作鵬參加憲法修改小組的工作，也說到毛澤東對於設不設國家主席一事的看法，當林彪聽到毛澤東說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才能當，林彪馬上表示：「我不當國家主席，這個不妥。應該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才是名正言順。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國家主席，沒有一個元首，這樣名不正、言不順。……毛主席出國有困難，可以設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國對其它國家進行訪問。我也不適合當這個副主席，我的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活動，不能出國訪問。要設國家主席還是毛主席來當」[10]吳法憲認爲國家主席的位置只是一個虛職，九大黨章中及憲法草案中已明確規定林彪是接班人，且林彪本人的身體又不好，不適合參加外事活動，再加上劉少奇就是在國家主席這個位置上被打倒的，因此，在當時的情勢下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的說法並不確切。[11]把林彪堅持設立國家主席的想法，擴大解釋成是因爲他想當國家主席；把林彪不想當國家副主席的想法，擴大解釋成是因爲他想當國家主席，是不會邏輯的。

吳法憲透露當天林彪沒有出席會議，由葉群代表他開會，會上周恩來要葉群代爲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及開會狀況，林彪將贊成設立國家主席的意見透過葉群轉告在北京的黃永勝及吳法憲。毛提議不設國家主席建議獲得大多數黨政軍負責人

---

[9]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79-780。
[10]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78。
[11]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78-779。中國共產黨章程裏寫著「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1969 年 4 月 14 日通過），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

的同意，但林彪仍堅持要設國家主席，這件事是毛、林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公開表現出意見分歧。4 月間毛澤東與林彪持續對是否設立國家主席一事各持不同意見，林彪透過秘書向政治局傳達建議由毛澤東任國家主席、可設亦可不設副主席、林彪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等三個意見，但毛澤東得知此建議後表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12]4 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並對林彪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13]毛澤東已經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得很清楚了，但林彪仍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林彪跟吳法憲說國家要有頭，所以要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頭就會名不正，言不順。林彪要吳法憲及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要設國家主席一事。[14]

爲什麼毛澤東堅持不設國家主席，林彪一直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呢？雖然吳法憲曾經供稱，葉群私下跟他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要怎麼辦？要往哪裡擺。不過吳法憲後來又表示，他當時講這句話是迫於無奈。九一三事件後專案組爲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證據，硬要他把這句話講成是葉群所言，因爲專案組加了很多壓力在他身上，所以他在一些假話都作了記號。而這句話其實是吳法憲從程世清（1918-）那裡聽到的，是汪東興跟程世清提到的。[15]李文普也說過，他從來沒有聽過葉群說過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那裡擺這樣的話。[16]但根據《周恩來傳（1949-1976 年）》披露，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這應該不是毛澤東與林彪二人之間的分歧而是毛澤東與中央領導集體的對立。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暗含不

---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361；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67。

[13]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年）。，頁 22。

[14]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65-1567；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頁 19-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361、364；王曉曉，〈“九大”前後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報林》，期 3（2004 年），頁 17。自從楊、余、傅事件後汪東興常到三座門找黃、吳、李、邱，當把一些小道消息跟毛家灣報告，汪說張春橋既滑膽子又小，以爲巴結江青就可以接近毛澤東。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頁 84。

[15]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88-789。

[16] 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蕭思科組稿，〈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國內版），頁 13。

贊成林彪當國家主席。[17]這是毛澤東對林彪的信任發生搖動的一個信號。而林彪主張設國家主席並由毛澤東擔任，可以使林彪在政治上獲得有利地位，獲得中央集體的支持，迫使毛澤東讓步，擔任國家主席，進而成功掩飾毛澤東與他的矛盾，林彪的堅持是爲了保全自己，保全現有的權力與政治生命。[18]事事緊跟毛澤東思想走的張春橋在得知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後，當然會在憲法小組會議上與吳法憲有所爭執。[19]

1970 年 7 月 17 日中央成立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毛澤東爲主任，林彪爲副主任，17-22 日舉行全體會議，會中要求設立國家主席的問題又再度被提起。[20]會議期間毛第四次提及不同意設立國家主席，並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21]，7 月 27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和陳伯達就「二報一刊」的社論產生分歧，陳伯達主張將原稿中「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語中的「毛主席和」四個字刪掉，因爲這是過去幾年來的一貫提法，但張春橋堅持不刪，此事提報毛澤東，毛澤東表示不在意，並請汪東興幫他把「毛主席和」幾個字圈掉，毛澤東雖然同意了陳伯達的建議，但對此事顯然不太滿意，他對汪東興說，爭論中的二種意見他都不贊同，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嗎？締造者又不止我一個，還有很多人，之後毛澤東還多次提到這件事，可見他很在乎此事。[22]8 月 13 日憲法修改小組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李作鵬及紀登奎因故沒有出席這次的會議，會議開始時陳伯達也因爲有事出去不在會場，會議中張春橋和吳法憲在討論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時起了嚴重

---

[17]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8 年 2 月），頁 1975、1973。

[18] 劉明鋼，〈林彪何以堅設國家主席〉，《黨史天地》，期 3（2005 年），頁 42。

[19] 霞飛，〈紅極一時："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中），《黨史博采》，期 7（2005 年），頁 47。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380。

[21]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頁 26-27；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67。

[22]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頁 23。閻長貴，〈締造和指揮的風波〉，《黨史博覽》，1 期（2006 年），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381。其實這一句話在 1969 年 10 月 1 日「二報一刊」社論裡就曾經出現過。〈爲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人民日報》，1969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報 49-97：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0&SelectID=3&ChannelID=5020&Page=1（2007/2/12）

的爭執，會上，康生提出不設國家主席，而吳法憲則堅持要設國家主席，雙方爭論不下，後來康生表示這個問題各自保留意見，以後再提交政治局討論。討論國家機構的問題時，吳法憲表示在國務院這一章應該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句話，但康生與張春橋一起表示反對，他們說：「再寫上重復，毛主席也不同意寫」[23]當時張春橋對著吳法憲說：「有人口口聲聲馬列主義到處都掛」[24]接著又說：「到處堆砌毛澤東思想，並不是馬列主義，有人口口聲聲說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連赫魯雪夫都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呢。這簡直是一種諷刺。」[25]吳法憲覺得張的話是對著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來的，所以吳法憲就責問張春橋是不是在諷刺林彪，吳法憲又對張春橋說：「你是在諷刺林副主席吧？你張春橋這裡也不寫毛澤東思想，那裡也不寫毛澤東思想，倒是你捍衛馬列主義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裡不寫毛澤東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說赫魯雪夫何時天才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你口口聲聲赫魯雪夫，你指的是誰？」[26]吳法憲話一說完，張春橋急忙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是毛主席說的，赫魯雪夫發展了馬列主義」[27]當時雙方都很激動，吳法憲又對張春橋說：「你今天吹這樣的風是幹什麼？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你們不贊成，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你也反對，你們不准稱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我堅決反對你這種謬論。」[28]後來康生就表示將在國務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澤東思想爲指針。張春橋公開把矛頭指向林彪的話語讓吳法憲感到很生氣，一氣之下吳法憲給張春橋扣上「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29]當陳伯達回到會場後，吳法憲和張春橋之間的爭論已結束，陳伯達聽吳法憲說張春橋反對毛澤東是天才之後，陳伯達站在吳法憲這

[23]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81。
[24]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81。
[25]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81。
[26]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81。
[27]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81。
[28]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81。
[29]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82。

邊。[30]

吳法憲表示他當天有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表示支持吳法憲在國務院的指導思想應加上毛澤東思想的看法，且周恩來說他沒聽毛澤東講過赫魯雪夫也是天才的，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列主義這句話，周恩來說三個副詞的發明人是鄧小平，周恩來同時也表示支持設國家主席，除了周恩來表示支持外，黃永勝及林彪也都支持吳法憲。吳法憲表示有了周恩來、陳伯達、林彪、黃永勝的支持，於是他和陳伯達、李作鵬就準備了要駁斥張春橋等人的資料。[31]會後吳法憲到陳伯達處詳談當時發生的爭吵情況，並且透過黃永勝將此事與林彪報告。吳法憲也將此事向周恩來報告。8 月 14 日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憲法修改草案一事，在會議前葉群打電話給陳伯達及黃永勝要他們準備「天才」問題的語錄，以便在會議上和張春橋等人鬥爭。當天會議上張春橋等人並沒有再堅持刪改的意見，憲法草案就獲得通過。[32]但林彪暗中囑咐黃永勝、吳法憲，要他們要多小心，這件事還沒結束，到廬山開會時，可能又會被拿出來討論。[33]但是不管出了什麼狀況，一定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及堅持天才的觀點。[34]

張春橋堅持刪除三個副詞，是有理由的。張春橋參與過九大相關文件的起草，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黨章及九大政治報告時，已經多次刪除過這三個副詞。張春橋知道這三個副詞即使寫進去，也會被毛澤東刪除。毛澤東在南巡時也說過：「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九大”黨章已經定了，為什麼

[30] 陳伯達著、陳曉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頁 134。頁 373。
[31]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82-783。吳法憲在回憶錄裡把這段歷史的時間記爲 8 月 14 日，筆者查《周恩來年譜》及《毛澤東傳（1949-1976）》有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載皆是指 8 月 13 日，筆者認爲應該是吳記錯時間了。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6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385。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 1949-1976》提到是由黃永勝打電話給葉群，但吳法憲表示是由自己打電話給葉群。不過可了解的是此事葉群是有收到消息的。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70。
[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38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6；霞飛，〈紅極一時：“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中），《黨史博采》，期 7（2005 年），頁 47。
[33]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四），頁 1973。
[3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8。

不翻開看看？」[35]吳法憲因爲沒參與其中，對九大報告起草過程也不了解，所以才會堅持要寫入三個副詞，引發這場風波。[36]爲了製造政治局內存在反對「貶低毛澤東思想」的尖銳鬥爭，以扭轉毛澤東針對林彪的鬥爭矛頭，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把張春橋作爲攻擊的目標。[37]1971 年毛澤東南巡時與華國鋒（1921-）談話時表示：「他們名為反對張春橋實際是反我」[38]，廬山會議上大家群起反對張春橋，但在毛澤東看來他們表面上是在反對張春橋，但實際上是爲了反對毛澤東，而這一點也是毛澤東最在意的一點。[39]

1970 年 8 月 22 日毛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九屆二中全會的會期、議程、分組及京値班安排等。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除毛澤東以外其餘四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40]爲了說服毛澤東，周恩來提出設國家主席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別人代行。[41]康生表示設國家主席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陳伯達表示如果毛擔任國家主席將是對全國人民的一大鼓舞，林彪也附和。[42]在只有毛一人反對設國家主席的情況下，讓毛澤東覺得很不高興，他表示如果你們願意，你們要好了，但

---

[35]〈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1971 年 8 月－9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245。

[36] 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頁 141；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69；黃衛平，〈讀汪東興著《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所想到的〉，《開放時代》，6 期（1998 年），頁 112。1968 年 9 月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社論〈世界革命人民勝利的航向〉初稿時批語：「把離開主題的一些空話刪掉，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毛澤東幾乎刪掉了所有與毛澤東思想有關的地方，其大的一段話則是「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續、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對外宣傳不要強加於人〉（1967 年-1970 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 6 月），頁 432、434；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59。吳新潮（吳法憲大兒子）說，如果沒有汪東興的誤導，吳法憲就不會被張春橋激怒，林彪也就不會被激怒，也就不會有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的講話。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頁 87。

[37] 劉志男，〈九大至九屆二中全會前夕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和矛盾〉，《當代中國研究》，期 3（1997 年），頁 47。

[38]〈在武昌與華國鋒、汪東興的談話〉（1971 年 8 月 2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9] 王年一、何蜀、陳昭，〈毛澤東逼出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期 2（2004 年），頁 141。

[40]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386。

[41]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9。周恩來在上廬山後請陳伯達準備憲法中有關於設國家主席的條文，不過，周話說的很活，他表示要先看看毛澤東的意見，備而不用。陳伯達著、陳曉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頁 134。

他不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在會上說，要把這次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一個分裂的失敗的會。[43]

1970 年 8 月 23 日林彪決定拿張春橋開刀，在此之前林彪對於自己到底要不要講話，以及該講些什麼都還尚舉棋不定，林彪甚至希望葉群能提供他一些意見。爲了迫使毛澤東在他和張春橋之間作一個選擇，他決定在大會上提出張春橋的問題。[44]大會開始前毛澤東要林彪主持會議，並問他要不要講話，林彪表示想講幾句，問毛澤東可不可以，林彪把從吳法憲那聽來關於吳法憲和張春橋之間的爭吵跟毛澤東報告，在旁的周恩來也點頭表示確有此事，毛澤東表示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不要點名，毛澤東問林彪準備怎麼講，林彪表示要講憲法修改草案及天才問題，毛澤東還表示張春橋的後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當時因爲康生在現場，再加上毛澤東很器重康生，所以林彪只對毛澤東點名張春橋。顯然毛澤東日後在南巡時表示「**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45]並不是事實，林彪的講話毛澤東事前已經知道，並且表示同意。[46]陳伯達也證實在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和毛澤東進行單獨談話，在林彪發表談話後，陳伯達親自問過林彪，他的講話是否事先跟毛澤東知會過，林表示他的講話毛澤東是知道的。[47]

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毛澤東主持開幕儀式，周恩來宣布這次會議的三大議程

---

[42]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387。

[4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9。

[4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9-290。李文普表示，在廬山會議開會前，曾聽到林彪問葉群：「這話今天講還是不講」，葉群鼓動說：「要講」。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蕭思科組稿，〈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頁 14。

[45]〈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1971 年 8 月－9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245。。根據林彪對毛澤東多年來的揣測心得，毛最在乎的是表決時自己是否占多數。少華、游胡，《林彪的這一生》（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07。最令毛生氣的並非林彪的講話，而是會議前一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除毛以外的其他四人常委皆要他出任國家主席。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8。

[46]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9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91。

[47]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 6 月修訂版），頁 374。林彪秘書干運深也表示，葉群在林彪與毛澤東談話時，葉在走廊上等待，以免江青闖進去，因此，周恩來及康生也都被擋住。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頁 57。陳伯達、吳法憲、于運深三人的說法大致吻合，有出入的地方是吳表示周及康在場，陳及于則表示當時只有毛及林二人單獨談話。

爲討論修改憲法問題、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問題、討論戰備問題。[48]隨後林彪發表講話。講話裡提到，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說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深思。林彪發言後，康生表示對林`彪的發言完全同意，完全擁護。並且提出，在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國家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49]

23 日下午，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一起商量，聽完林彪講話錄音以後的事情。葉群提到在各小組會議時大家都要發言，要支持林彪講話，批評時不要點名批評，尤其不要點名康生，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也不要點名，堅持在憲法設國家主席，向陳伯達要關於天才的語錄，堅持天才的觀點要。[50]總之要集中攻擊陸定一式的人物（指張春橋），但打擊面要小不要涉及康生及江青，要串連空軍、海軍、總後的中央委員，統一口徑。[51]

23 日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按照往例毛澤東及林彪並沒有出席。會議開始先進行分組，分組問題解決後，吳法憲提出，明天全會各小組要聽林彪在開幕會上的講話錄音，陳錫聯、汪東興、許世友等人紛紛表示同意，周恩來也同意這個意件，並表示將負責向毛澤東報告。在一旁聽到將要改變原來會議議程的康生及張春橋感到很緊張，尤其是一向與邱會作不合的張春橋，竟然會幫在他身旁的邱會作點香煙。[52]由張春橋的舉動可以看出，當時的張春橋內心感到很不安。

---

48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387。

49 汪東興表示 23 日下午開幕時，在常委討論會並沒有提出要講話的林彪突然說要講話，且講了一個半小時，他的講話顯然是有準備的，因爲在講台上放了一個稿子。汪表示他對林講話裡的憲法裡規定毛的領導地位，規定毛的思想是領導思想令他最感興趣。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頁 36。

50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94。

51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205；吉木，〈在領袖之間玩權術的陳伯達〉，《秘書之友》，期 6（1996 年），頁 41。張春橋是江青的心腹，中央文革小組中政治經驗豐富且又老謀深算的人物，打擊張春橋等於是給江青一擊。王年一、何蜀、陳昭，〈毛澤東逼出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頁 142。

52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94。

24日全會各小組都在聽林彪23日的講話錄音，並進行討論，在葉群事先的安排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葉群在各小組會上宣講天才語錄，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堅持設國家主席。當天在華北組的討論會上，陳伯達、汪東興發表煽動性發言，不點名批評張春橋等人，會議氣氛十分緊張。和張春橋結怨甚深的陳伯達從林彪口中得知林彪的講話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所以在華北組展開對陸定一式的人物的攻擊。[53]陳伯達：「吳法憲同志說過一句很好的話，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54]陳伯達發言後，汪東興接著說：「剛才伯達同志的發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我看，這種思想是最反動的。我們不容許這種思想在我們黨內泛濫。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思想，我們就和他拼到底」[55]因爲汪東興是毛澤東身邊的人，當時很多人都將他的話認爲是毛澤東的意思，所以，當他發言後，很多人紛紛起來響應，指責反對天才論的人，並且要將反對的人找出來。[56]華北組討論的當事人宋雙來也表示，華北組會有如此激烈的發言最主要是受到汪東興的影響，因爲之前在三月及七月聽到不設國家主席及毛不當國家主席皆是汪東興所傳達的，所以他的發言大家會特別看重。[57]在華南組的會議上吳法憲說：「有人還不同意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又說「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竟說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58]吳法憲發言後，有很多人向他打聽是誰反對「天才論」，

[5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93。
[54]〈陳伯達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發言〉（1970年8月24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5]〈汪東興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發言〉（1970年8月24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6]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798。
[57] 宋雙來，〈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史縱橫》，期7（2005年），頁31-33。宋也表示吳德說華北組的發言的河北中委、候補中委之所以會統一口徑，是因爲李雪峰事先已先打過招呼的關係，但宋表示當天與會者口徑幾乎一致的要求設國家主席及揪人，最主要是因爲24日下午汪及陳的發言所致。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當代中國史研究》，期2（1995年），頁48-49。
[58]〈法憲在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二中全會西南組的發言〉（1970年8月24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吳法憲向一些人透露是張春橋。在華東組，不知情的王洪文也跟著帶頭擁護林彪講話，在各組紛紛表示擁護林彪講話，也提出要追查反對天才論的同時，張春橋在會上顯得很沈悶、很緊張。會後林彪向吳法憲再次表示，毛澤東已交待過不要點名，尤其是康生。葉群也交待吳法憲要跟大家通氣，不要點名康生和張春橋，但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可堅持。當晚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意識到被點名批判的對象是張春橋的一些老幹部們，紛紛加入聲討和譴責行列，借機出口怨氣。[59]

25 日六號簡報出爐，簡報上說：「大家熱烈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語重心長的話。認為林副主席的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大家聽了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議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的最強烈的憤慨，認為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60]六號簡報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已明確指出，反對「天才論」、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反對毛澤東當國家主席的人就在中央的憲法修改小組裡。簡報上用了「揪出來」、「鬥倒鬥臭」、「千刀萬剮」等敵我矛盾的語言，對全會起了很大的引導作用。[61]一時間，整個會議的氣氛變得異常緊張，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62]

當天上午江青帶著張春橋及姚文元到毛澤東那裡反應各組揪人的狀況。[63]上

[59]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97-799。
[60]〈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華北組第二號簡報）〉（1970 年 8 月 2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1]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210。
[62]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93。
[6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38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95。關於江青、張春橋等人拿著華北組簡報跟毛澤東告狀一事，江青的秘書楊銀祿表示 25 日那天早上張春橋急急忙忙找江青商討華北組簡報一事，等江看完簡報後發現問題很大，當下決定要去找總理，但不知爲什麼車子卻是開到毛澤東處，看到毛後江向毛表示要出大事了，

午華北組開會的議題集中在有人反對毛澤東的問題上，會上陳毅也說不管是在什麼地方，只要有人在牆旮旯裡反對毛澤東，他就要把他揪出來。[64]同日下午張春橋出席華東組的討論會，因爲當天基本上每人手中都有一份全會第六號簡報（即華北組第二號簡報），所以大家開始針對林彪講話發言。王維國說，要打倒野心家、陰謀家，把他們揪出來示眾，其他人也都紛紛表示，要把反對毛澤東的人揪出來，但所有發言的人皆不公開點名。當有人說到不把反對毛澤東的人揪出來，決不收兵時，空五軍政委陳勵耘（1919-）打斷他的話，並且側著臉對張春橋，對著他大聲說，自己站出來嘛！此時會場上的火藥味很濃。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的聲浪不絕於耳。[65]1974 年 4 月 20 日張春橋寫給兒子的信中提「**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我思想上已準備全家被殺了**」[66]這一段話看出來，當時張春橋對於自己是否可以躲過這次危機，是沒有把握的。

25 日下午，毛澤東要汪東興通知召開有各組召集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67]毛澤東也勸林彪不要當國家主席，並且警告說：「**如果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68]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會議決定全會分組會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第二號簡報，並責令陳伯達、吳法憲等人做出檢討。[69]毛澤東告訴過林彪，張

要揪人了，毛剛開始還不知是出了什麼事。楊銀祿，〈九屆二中全會時的江青〉，《黨史博覽》，期 1（2006 年），頁 51。徐景賢也提到江青說過他們原本要去找周恩來但不知怎麼搞的那車竟開到毛澤東處。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218。陳伯達也表示江青、張春橋見了華北組簡報後有些恐慌，原本他們要找周恩來，但後來沒有去而是直接去找毛澤東。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373。

[64] 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當代中國史研究》，頁 49。

[65]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213-214；李文卿，《近看許世友，1967-1985》（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年），頁 199-200。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認爲林彪的講話說明文革將要結束，要收拾張春橋等人了。張正隆，《戰將》（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 年），頁 331。

[66]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台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年 9 月），頁 328。

[67]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76。

[68]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76。

[69]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388-389；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576。毛澤東在 25 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前毛和他單獨談話裡說張春橋、姚文元燒一燒可以，但不可以燒焦，現在要降溫了。但實際上毛卻是站在江青那一邊，將張、姚輕輕放過，而響應支持林的人卻嚴厲追究，不但陳伯達老舊帳一起算，連黃永勝也被追查，但卻放過汪東興，顯然毛澤東是和林彪過不去。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春橋這個人還要再觀察兩年，如果不行，到時候將把棒子交給林彪。[70]但事實上毛澤東最後還是選擇站在張春橋這一邊，8 月 31 日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表面上是揭發陳伯達的野心而強調保林彪，但陳伯達問題的揭發，自然會進一步危及林彪的地位。[71]廬山會議後陳伯達遭軟禁，毛澤東繼續在陳伯達身上做文章，在黨內發動了「批陳整風」運動，然而這場運動其實是衝著林彪而來的。[72]毛澤東和吳德（1913-1995）談話時說到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到這條船要沉了，就會跑到另一條船上，意味著陳伯達的後台不只是軍委辦事處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而是地位更高的林彪。[73]

第二節　張春橋與周恩來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並以陳伯達和林彪的垮台爲契機，加大了糾左的力度。[74]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報》發表經由周恩來審定的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並指出經過長期鬥爭鍛煉的老幹部爲黨的寶貴財富。[75]4 月間周恩來表示出口用工業品和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展覽品的質量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因爲極左思潮的突出

頁 300。

[70]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07。「林彪事件」後，林立果的死黨李偉信的筆供裡透露，林立果在召開研究林彪接班問題的會議中，也認爲張春橋是取代林彪的最有可能人選。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編，《中共機密文件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8 年），頁 130-131。

[71] 雷炳炎、齊飛，〈從擇定到廢除－毛澤東和他的接班人林彪〉，《黨史縱覽》，期 1（1998 年）頁 35。

[72]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05。毛澤東對美國記者斯諾表示現今個人崇拜搞過火了，所謂的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一個教員。毛覺得有時不知道那些喊擁護毛的口號最響，揮舞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人。〈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 年 12 月 18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174；埃德加・斯諾（美）著，賀和鳳著，《漫長的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161。

[73] 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當代中國史研究》，頁 51。「九一三事件」後中共中央成立專案組，集中處理林彪、陳伯達問題，中央專案组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吳德、吳忠等十人组成。〈中共中央關於成立中央專案組的通知〉（1971.10.3），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李德生表示「九一三事件後」黨中央部署全黨展開批林整風運動，軍隊的批林整風實行分工合作，張春橋負責海軍。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頁 434。

[74]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期 5（1998 年），頁 38。

[75]《人民日報》編輯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1972.4.24），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表現，無政府主義的氾濫結果。[76]8 月 1 日、2 日周恩來對駐外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人講話提到：「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77]毛澤東在看到周恩來在外交部批極左的講話後，曾把他內心的隱憂對張春橋、姚文元講過，毛澤東表示不贊成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唯意志論」、和「空頭政治」，認爲周恩來的這種作法將會批到邪路上去。[78]8 月 8 日張春橋和姚文元到人民日報社打招呼，張春橋談到林彪利用批劉少奇而搞出一套形左實右的東西，造成很大的毒害，在批林時要劃清界限，不要批過頭，不要再犯過去批劉少奇時所犯下的錯說。張春橋又提到現在有些地方在批精神萬能論，但毛澤東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才好的，在周恩來才剛說要批極左，張春橋就來到《人民日報社》要他們不要批左批過了頭，公開和周恩來唱反調。[79]

爲推動批判極左思潮，周恩來要「兩報一刊」的社論起草小組在國慶社論裡將這方面的精神加進去，起草社論的主筆吳冷西根據這個精神在社論裡加上要批判極左思潮這句話，因爲毛澤東已經事先交了底，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將「批判極左思潮」這句話刪掉。張春橋、姚文元對於國慶社論問題上展現出來的強硬態度讓周恩來感到來者不善，爲了不要把事情鬧大，在最後審稿時就把「批判極左思潮」這句話刪掉。[80]

在毛澤東幕後指使下，在政治上是批左還是反右的交鋒愈來愈激烈。10 月初周培源在周恩來的交代下寫了〈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81]在《光明日報》刊出，這篇文章發表後沒多久，張春橋、姚文元就派人從上海到北京調查這篇文章的出籠背景，到處問說這篇文章是不是周恩來要周培源寫的，張春橋還表示不管周培源的後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不久後《文匯報》就開始不指

[76]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2018。
[77]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542。
[78]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6。
[79]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0。
[80]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87。
[81] 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必須受到重視，不能篇廢。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周培源，〈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光明日報》，（1972 年 10 月 6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北京：國防大學，1988 年 10 月），頁 750。

名的對周培源展開攻擊。[82]

10 月 14 日，根據周恩來有關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王若水（1926-2002）趁張春橋、姚文元不在北京時將在《人民日報》刊登一整版反「左」的文章。[83]這些文章發表後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朱永嘉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的魯瑛，詢問文章的作者及產生的背景等，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組織下上海在開了一個工人座談會，透過工人的嘴巴把他們自己這篇文章感到不滿的意見表達出來。[84]此外張春橋、姚文元還說這幾篇文章是大毒草，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抬頭，江青更是藉機點出背後有人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不久後《人民日報》展開一場鎮壓運動。[85]

倚仗著毛澤東在背後的支持，江青、張春橋等人繼續在批左的問題上和周恩來纏鬥，11 月 30 日周恩來批示並同意了中聯部和外交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並將這份報告傳送毛澤東及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12 月 1 日張春橋表示不同的意見，在報告上批：「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86]12 月 2 日江青也呼應，在報告上批：「應批

[82] 周培源，〈“四人幫”破壞基礎理論研究用心何在〉《人民日報》，（1977 年 1 月 13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 75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87-388；王永欽，〈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重大分歧〉（上），《百年潮》，期 5（2002 年），頁 8。

[83]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0；王永欽，〈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重大分歧〉（下），《百年潮》，期 6（2002 年），頁 35。〈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斯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學習筆記〉的由來是 1972 年 3 月 21 日國務院業務組的華國鋒、李先念、余秋里接見黑龍江的同志，在聽取他們的彙報後，國務院的領導同志指示要反對無政府主義，後來黑龍江省委寫作組寫了一篇署名為龍岩的文章交給《人民日報》理論部，理論部認為可以用後交給王若水，王若水做了修改後，把篇名改為〈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斯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學習筆記〉。10 月 14 日《人民日報》除了刊登這篇署名為龍岩的文章外，又加了一篇《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及一篇介紹一本關於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書的書評，這三篇文章就占滿了一整版。這版文章集中地揭露和批判極左思潮的突出表現－無政府主義。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0；龍岩，〈無政府主義是馬克斯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學習筆記〉《人民日報》，（1972 年 10 月 14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 759。

[84] 中共黑龍江省委理論組人民日報理論部，〈圍繞批判極“左”思潮的一場激烈鬥爭〉《人民日報》，（1978 年 3 月 23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 763。

[8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88。

[86]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565。

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87]周恩來認爲只要毛澤東沒有在批左的問題上表態，事情就仍然有可爲之處，爲了避免雙方之間的衝突爆發而驚動毛澤東，因此，周恩來選擇讓步，同意將報告中的「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刪除。[88]

1972 年 12 月 5 日，《人民日報》記者王若水寫信給毛澤東，信裡反映《人民日報》現在對批林方針問題陷入宣傳上的混亂，周恩來強調要批左，但張春橋、姚文元卻主張批左不要批過了頭，在批左的問題上上海的《文匯報》已多次把矛頭指向《人民日報》，這種情況和當年批《海瑞罷官》的情況很像。[89]信裡又提到不贊同《文匯報》說林彪推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批林應該是要批極左思潮，批極左思潮是中央定的性，及不懂爲什麼只因毛澤東講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後，張春橋就不贊同批「精神萬能論」及「唯意志論」。[90]王若水的這封信原本是希望爲周恩來的批極左思潮搖旗納喊，並對張春橋、姚文元二人要《人民日報》內部大反右傾回潮表示無法贊同，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但這封信卻剛好讓對於周恩來極力主張批左感到很不滿的毛澤東一個絕佳的反擊機會，毛澤東利用王若水的來信展開徹底封殺黨內批極左的聲音，以便根本扭轉批左的局面。[91]12 月 6 日毛澤東要江青將王若水的來信轉給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要他們解決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到的問題。[92]關於王若水的來信一事江青希望先在內部統一認識一下，周恩來隨即批示：「同意我們政治局內部先談一下」[93]此時毛澤東並沒有先表態，以便觀察周恩來的態度。[94]12 月 15、16 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王若水的信及批極左問題的認識，在會議上因爲周恩來在批左的問題上刻意降低

---

87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565。
88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89-390。
89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90。
90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2。
91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90。
92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566；劉武生，《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57。
93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 年）》，下卷，頁 566。
9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91。

姿態，使得江青、張春橋等人無法在這個會議上與周恩來面對面的鬥爭，眼見文革派展開攸關文革大事大非的反擊行動，又將被周恩來的太極軟骨攻化解，身處在背後的毛澤東決定親自出面施展他的權威。[95]17 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中明確表示王若水的那封信不對勁，對於批極左還是批極右的問題，他主張對極左應該少批一點，當前應該是批林彪的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的極右。[96]毛澤東的談話明確地否決了周恩來在批林彪路線上的主張，也顯示毛澤東擔心對於批極左將會導致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所以，他必須親自站在台面上將這件事定了性。[97]

12 月 19 日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若水、魯瑛、吳冷西及崔金耀到人大會堂開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對王若水說：「收到你的信，主席批給我們辦」[98]、「你所提到的問題就是左和右的問題」[99]。談話中周恩來爲自己辯解，說：：「我 8 月 1 日講極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還有工作上的一些問題，不是講林彪的整個路線。林彪叛黨叛國，那是極右了。」[100]此外周恩來也承擔責任，承認他自己八月間在外交系統講話中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是中央務虛不够，不能完全責備報社同志。」[101]此外周恩來也到收到很多批評魯瑛的信，如果說魯瑛弱一些可以，但魯瑛還是一個好同志。[102]會上王若水會議上說：「《紅旗》11 旗上說林彪煽動無政府主義，從左的方面不定黨的話」[103]江青接著說：「你組織的這篇文章矛頭是對著群眾」[104]接下

---

95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91。

96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5；王永欽，〈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重大分歧〉（下），《百年潮》，頁 36。

97 王永欽，〈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重大分歧〉（下），《百年潮》，頁 36。

98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2。

99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2。

100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3。

101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3。

102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93；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2-43。

103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4。

104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4。

來又說：「你這封信好像春橋、文元同志跟總理鬧彆扭，我認為過分了。……怎麼可以把兩個政治局委員和一個常委對立起來呢？」[105]、「我還突然收到幾個口袋都是對魯瑛進行人身攻擊的」[106]姚文元接著說：「有些信那樣寫，把一個人的缺點收羅在一起，簡直少有」[107]爲了緩和氣氛，周恩來接著說：「《紅旗》11 期這篇文章，提到劉少奇提倡奴隸主義、林彪煽動無政府主義，那樣說可以」[108]，周恩來的這句話不僅是肯定了《紅旗》的說法，同時也暗示既然紅旗可以這樣說，《人民日報》當然也可以這樣說，因爲《紅旗》由姚文元主管，周恩來的這一番話讓姚文元啞口無言。但因爲毛澤東已經爲這件事情定了性，江青爲要讓王若水表態，江青說：「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這個問題講清楚。」、「這個版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不是批林」、「壞事也可能變成好事。人民日報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個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燒身？」[109]張春橋接說：「人民日報不是王若水一個人的問題，人民日報還有人。這究竟是什麼，需要研究」接著他又自己回答：「我總覺得人民日報內部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氣，容不得外面的人。」、「報社不但利用總理和我們之間，而且還利用中央、國務各部看稿提的意見的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這種挑撥，你們各位要注意。」接著姚文元說：「在階級鬥爭這個時刻，你站到哪裡去了？」[110]會中周恩來看出江青、張春橋等人想把人民日報一塊版及一封信的問題定個性質，所以，提出了解決方法，以免節外生枝，因此，周恩來對王若水說：「你的錯誤嚴重些說是立場問題。如果你確實感覺錯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傳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學的，應當在這方面表現出來。」[111]批左還是批右的問題在這場會議中決定了，但江青、張春橋等人想到利用這個機會決人民日報正式領導班子的問題，所以張春橋才會在會上說：「就在批林問題上分清是非。

---

[105]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4。
[106]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4。
[107]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4。
[108]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4。
[109]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6。
[110]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6。
[111]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6。

通過這一場，領導班子可能出來。」[112]這次談話導致批林方針從左到右的轉折，同時也讓《人民日報》這塊輿論陣地陷落。[113]

王若水回憶 12 月 19 日那天當他意識到他在信中引用周恩來的話捅了摟子後，他在彙報時就引用了中央文件，但他沒想到針對他引用中央文件時張春橋會說：「如同你在總理和文元同志之前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樣，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這個人真是意思，從中央文件找根據，從總理找根據」[114]又聽到張春橋說：「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話，好像我反對批極左。其實那些話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之後，又想到在中央尚未找他解決他所提的問題之前，就聽到一個不利於他的消息。這消息指的是 12 月 6 日張春橋跟姚文元有一次談話，言談中姚文元表示毛澤東說過林彪在歷史上一貫是右的，林彪的理論和實踐也都是右的，而張春橋則是說停止黨的組織生活是毛澤東決定的，並不是無政府主義，只講極左思潮無法說服他，投靠蘇修是極右行爲。雖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談話已經很明確，但王若水仍無法相信毛澤東會把反右當成是重點。王若水領會到張春橋的背後有一個更高的權威毛澤東做根據，所以張春橋才會說從周恩來或中央文件找根據很有意思。[115]

第三節 張春橋與鄧小平

「九一三事件」後中國政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動，原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只剩下毛澤東、周恩來及康生。毛在精神上受林彪事件打擊，整日臥床不起，苦思如何挽回文革局面，康生在廬山會議後一病不起，因此，周恩來則是忙於處理內政外交上的大小事、安撫黨內老幹部，以轉移社會上對文革的不滿。爲了穩住軍隊的情勢，宣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隔離審查，改由葉劍英主持軍

112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6。
113 余煥椿，〈大權旁落：“文革”中人民日報奪權紀實〉，《百年潮》，期 12（2004 年），頁 45。
114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5。
115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頁 42、45。王若水推測張春橋和姚文元應該在 8 月 8 日去人民日報前有和毛澤東談話，談話內容應是涉及不贊成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唯意識論」、和「空頭政治」，且張春橋、姚文元是在得知毛澤東要批林彪的極右路線後，才到上海去做布置的。同前引書，頁 46。

委日常工作。[116]林彪是中共當年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死後副主席的位子空了出來，當毛澤東下令籌備中共十大後，張春橋原本以爲自己的機會來了。[117]但中央政治局裡有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同志，也有像江青、張春橋這樣的文革派，雖然毛澤東有屬意張春橋，可是從九屆二中全會張春橋受到圍攻的情形看來，張春橋很難得到大多數中央委員會的同意，毛澤東決定撇開現有中央政治局，從省、市一級幹部裡選一位接班來，這樣兩方面都沒有理由反對。[118]1972 年 9 月 7 日毛澤東下令王洪文來到北京，毛澤東要王多看些馬列的書，但王洪文對此事並不感興趣，當張春橋對毛澤東說王洪文想回上海時，毛澤東向張春橋透露想提名王洪文當副主席，並要求張春橋不要將此事說出去，張春橋對於王將要躍升爲他的上司一事感到不快，但王洪文畢竟是屬於張春橋的人馬，王洪文任副主席後將增長張春橋的勢力。[119]

林彪倒台後卻導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當時被打爲「二月逆流」的老帥、副總理復出了。[120]1971 年 11 月 4 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代表時，宣佈爲「二月逆流」平反。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121]1972 年 8 月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提出願意做一點工作，毛澤東在信上做了：「鄧小平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122]的

---

[116]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56。毛在病中告訴周恩來說，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頁 529。毛在病榻中爲自己所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決之道，毛決定利用外交上的勝利（尼克森到中國造訪），來掩蓋文革的破產。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71-372。

[117]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277。

[118]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284。

[119]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278-279。吳德表示十大之後，毛澤東向吳德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談話，並指著菜地裡的蔬菜說，要像栽培蔬菜般栽培他們。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年），頁 110-111。

[120]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 277-281。

[121]〈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人員時的講話〉（1971 年 11 月 1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這句話的他指的是葉劍英。

[122]〈對鄧小平來信的批語〉（1972 年 8 月 14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批示，爲鄧小平的復出做了伏筆。[123]1973 年 3 月 10 日經由毛澤東同意，鄧小平恢復了黨的組織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24]當鄧小平復出時，周恩來支持鄧小平，毛澤東也倚重鄧小平，同年 12 月 12 日到 22 日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提議鄧小平參加軍委工作，擔任總參謀長，毛澤東還對鄧小平說：「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鋼鐵公司」[125]12 月 22 日中央發下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的決定和通知。[126]十大時鄧小平爲中央委員並未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的地位比鄧小平高，但毛澤東推荐鄧小平參加軍委工作，擔任總參謀長，並被重新選入政治局擔任委員，讓在軍中只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張春橋感到鄧小平的復出對他造成很大的威脅。[127]

1974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在近期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28]爲了爭取四屆人大組閣江青抓住「風慶輪事件」[129]來攻擊周恩來、鄧

頁 308。

[123]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期 5（1998 年），頁 38。

[124]〈對周恩來送審的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決定稿的批語〉（1973 年 3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347。馬天水表示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裡搖鵝毛扇的人，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過去鄧小平到外地視察時，到了目的地不下車，讓別人在牌桌上向他彙報。馬天水在一份表示擁護鄧小平復出的電報裡提到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裡搖鵝毛扇的人物，雖然張春橋曾對馬天水表示他的電報內容太過於過火，但因爲張春橋並沒有生氣，由此可見張春橋也是同意馬天水的看法。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349；王勇，〈馬天水夢斷上海灘〉，《黨史天地》，期 3（2006 年）頁 33。

[125]〈對周恩來送審的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決定稿的批語〉（1973 年 3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348。

[126]〈對周恩來送審的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決定稿的批語〉（1973 年 3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348。

[127] 霞飛，〈南柯一夢："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下），《黨史博采》，期 8（2005 年）頁 49。王洪文主持黨工作，鄧小平執行行政及軍隊工作是毛澤東的精心安排，爲了制衡和穩定，他不想讓文革新勢力或老幹部任何一方獨掌大權，他在黨的最高機構中加入鄧小平等老幹部，在政府及軍隊中又摻進了王洪文、張春橋等文革新勢力，以期在兩股勢力間達到平衡。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二版），頁 294。張春橋在十大（1973 年 8 月 30 日）時被選爲政治局常委。〈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新聞公報〉（1973 年 8 月 3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鄧小平是在 1973 年 12 月被重新選進政治局，並在十屆二中全會（1975 年 1 月 8-10 日）上被補選爲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對周恩來送審的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決定稿的批語〉（1973 年 3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348。

[128]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00-1701。自從王洪文進入中央政治局，爲了共同反對周恩來、鄧小平，所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同盟，此時毛澤東對形勢的發展，對江青的作法有些不滿意，1974 年 7 月 17 日毛澤東當著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面，對著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對"四人

小平。[130]10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等人在會議上提出「風慶輪事件」是崇洋媚外、是賣國來攻擊鄧小平，江青要鄧小平就「風慶輪事件」表態，鄧小平表示對於這件事情要再調查，隨後江青進一步逼問鄧小平對於「洋奴哲學」抱持何種態度，鄧小平對於江青那種硬要他人同意他的意見的態度感到無法忍受，因而憤而退場。[131]這件事件發生在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的十多天後，所以格外引人注意。[132]爲了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等人商量後決定請王洪文到長沙對毛澤東進行彙報。[133]王洪文到長沙彙報的內容無非是說鄧小平反對文化大革命，周恩來在醫院養病，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頻繁往返於醫院，商量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毛聽了之後嚴厲告誡王洪文，要他回去後多找周恩來和葉劍英談，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134]王洪文的舉動激怒了毛澤東，他請王海容、唐聞生轉告周恩來、王洪文，

幫”的幾次批評〉（1971 年 11 月 14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394；王永欽，〈“四人幫”組閣與毛周長沙決策〉，《炎黃春秋 》，期 3（2001 年），頁 5。

[129] 風慶輪是國務院交通部下令上海江南造船廠裝備的萬噸輪，主機和雷達是國內製造，其他配件則是國外進口，1974 年首度航往歐洲。在遠航途中，極左派攻擊風慶輪是進口的貨輪，買洋船是崇洋媚外的賣國主義，要隨船的政委李國堂、政治幹事顧文廣表態批判國務院及交通部。這兩人拒絕，並批評江青等人。江青、張春橋接獲此消息後，把李、顧二人的抵制行動稱爲「反動政治事件」，並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丁望主編，《原版文革密件第一卷：關於四人幫事件（1976）》（香港：田園書屋，2006 年 9 月），頁 207。

[130] 蘇采青，〈圍繞“風慶輪問題”的一場鬥爭〉，張華、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頁 1113-1114。

[131]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318-319；何梓林，〈鄧小平長沙之行〉，《百年潮》，期 8（2004 年），頁 21。11 月 12 日毛澤東問起鄧小平 10 月 17 日當天憤而退出政治局會議的情況，毛澤東除了說鄧小平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外，也說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對於她強加於人的行徑，毛感到不高興。〈毛澤東同鄧小平在長沙的一次談話〉（1974 年 11 月 12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32]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699-1670。10 月 4 日毛澤東要張鳳書打電話給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並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他的意見，王洪文當天並沒有馬上向在京的政治局成員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傳達毛澤東的提議，而是先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進行通報。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699-1670。

[133]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0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29-530。周恩來在醫院時找王海容、唐聞生跟他們講江青、鄧小平在政治局產生衝突的整個經過，要他們跟毛澤東傳話，說鄧小平並不向江青所說的那樣揚長而去，而是李先念勸他走的。鄧小平走後，張春橋說他早知道鄧要跳出來，江也說他是有意問鄧小平這個問題的。可見江、張春橋是事先準備好要整鄧小平的。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33。

[134]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04；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 1966-1976》（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 2 月），頁 144。紀登奎回憶說王洪文回北京後並沒有在政治局傳達毛澤東的批評。前引書，頁 1705。

毛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135]如果周恩來身體狀況容許的話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恩來和王洪文共同主持，與各方商量辦理，並明確表示提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36]除此之外，毛澤東還要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批西。[137]11 月 6 日周恩來回信給毛澤東，信上表示：「**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138]毛澤東並非不想把大權交給黨內文革派，他一直在爲此創造條件，但江青太不爭氣，有些扶不起來。毛澤東原想江青和鄧小平能在他安排的權力格局中共同合作，在政治、經濟兩方面爲文革保駕，但江青的政治胃口愈來愈大，和張春橋等人搞在一起，在黨內搞小宗派，引起政治局大多數人的不滿。爲此毛澤東進一步抬舉鄧小平來反制江青，並讓周恩來介入屆人大的籌備工作，以監管王洪文。毛澤東有意利用兩派對峙、互相牽制，而自己則在幕後控制。[139]

1974 年 12 月四屆人大籌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周恩來與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準備狀況，期間毛澤東與周恩來進行會談，爲了在鄧小平和張春橋之間維持平衡，毛澤東說鄧小平是人才難得時，也稱讚張春橋有才幹，並親自提議讓張春橋出任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用「摻沙子」的辦法，暗中對葉劍英、鄧小平主持的軍委預作防範。[140]1975 年 1 月 5 日鄧小平被任命爲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張春橋被任命爲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第四屆人大召開後鄧小平被任命爲第一副總理，張春橋是排名僅次於鄧小平的副總理。[141]張春橋與鄧小平之間的抗爭張春橋落敗，毛的一句話道破了毛澤東安排鄧小平

---

[135]〈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的一點意見〉（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405。
[136]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04-1705；呂相友，《中國大審判-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圖文紀實》（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13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32。
[137]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05。
[138]〈周恩來致毛澤東的信〉（1974 年 11 月 6 日），轉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2109。
[13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31-532。
[140]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41。毛澤東要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的談話〉（1974 年 12 月 23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41]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333、336。

的用心：「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142]但也可看出毛澤東對於張春橋的信任仍然沒有減弱，也給了他在政府和軍隊中的一些實權。[143]

然而當毛澤東、周恩來把黨政軍大權交給鄧小平，鄧小平致力於整頓黨、軍隊、工業、農業，調整文藝政策時，張春橋開始在《人民日報》、《紅旗》發表文章，張春橋延續他在 1958 年發表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基調，進行一場反經驗主義之戰。[144]這場爭論的起源是在毛澤東安排由周恩來、鄧小平組閣時，同時策劃發動一場學習無產階級學習理論的運動而開始的。[145]1974 年 12 月 26 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在長沙講到理論問題，關於理論問題毛澤東提到：「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給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146]毛澤東又告誡全黨：「林彪一類如一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147]藉由這股學習理論運動，江青、張春橋等人發動反對經驗主義，來製造反對周恩來、鄧小平的新輿論。[148]鄧小平復出後，爲阻礙鄧

142〈對四人幫的幾次批評〉（1974 年－1975 年），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394。

143 霞飛，〈南柯一夢："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下），《黨史博采》，頁 50。

144 1975 年 2 月 22《人民日報》刊發張春橋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專政〉，3 月 1 日出版的《紅旗》也全文刊載。這篇文章的重點在於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差別。張春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專政〉（1975 年 2 月 22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冊（北京：國防大學，1988 年 10 月），頁 222。

14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48。

146〈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1974 年 12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413。根據毛澤東指示摘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語錄三十三條，在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報》和 3 月 1 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

147〈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1974 年 12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413。

148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台北：遠流出版社，1990 年），頁 721。新華社記者述評，〈"四人幫"上演反"經驗主義"丑劇的前前後後〉，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冊，頁 225。

小平對於極左錯誤的糾正，張春橋等人藉由批評經驗主義開始對周恩來、鄧小平展開批評，1975 年 3 月 1 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講話，他說現在最主要的危險是經驗主義。[149]張在大會上說：「很多問題，理論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發生錯誤；思想上的錯誤就會變成政治上的錯誤，使資本主義大泛濫。我覺得我們有這樣多老同志，有很豐富的經驗，如果我們能夠很好地學習理論，並且能反對現狀作比較系統的調查，這樣就使得我們對主席的指示能夠加深理解。」[150]同日姚文元也在《紅旗》發表文章，藉由批判林彪進一步煽起對經驗主義的批判，文中提到：「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151]3 月 21 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助手」[152]4 月 1 日張春橋在紅旗發表〈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現在，資產階級的土圍子還很多，打掉一個還會長出一個，就是將來被消滅得只剩一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掃帚不到，它也不會自己跑掉……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153]毛澤東在晚年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思想，在這篇文章裡表露無遺，張春橋可說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的傳人。[154]

4 月 4 日江青跟遲群（1932-）說：「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兇，是當前的大敵」[155]4 月 5 日江青對北大、清華兩校講話提到現在最大的敵人是經驗主義而不是教條主義。[156]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操控下，3、4 月間全國的報紙、雜誌上出

---

[149]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352。

[150]〈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1975 年 3 月 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51] 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紅旗》，期 3（1975 年），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冊，頁 242。

[152]《人民日報》編輯部，〈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1975 年 3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53] 張春橋，〈論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紅旗》，期 4（1975 年）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冊，頁 252-253。依毛澤東在 1974 年 12 月 26 日指示張春橋寫了這一篇文章。〈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1974 年 12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414。

[15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50。

[155]〈遲群傳達的江青的電話指示〉（1975 年 4 月 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56]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頁 723；中共中央文獻室編，《鄧小平年譜

現很「打土圍子」和反「經驗主義」的文章，這些攻擊、批判顯然是指向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老幹部。[157]江青、張春橋等人拿反經驗主義來向周恩來開刀，最主要是他們知道毛澤東對周恩來、鄧小平的態度不同，毛澤東對周恩來有戒心，毛澤東對鄧小平正有好感，集中火力對周恩來比較不會惹毛澤東不高興，且江青等人認爲四屆人大組閣他們之所以會處於弱勢最主要是因爲周恩來在背後穿針引線，批周恩來不但可以報一箭之仇，又可以給鄧小平一點顏色看看，因爲批經驗主義也會影響到鄧小平進行整頓時所要依靠的黨內軍中老幹部。但經過「風慶輪事件」後鄧小平知道雖然江青、張春橋批經驗主義最主要是對著周恩來而來，但他們最主要的目標不僅是周恩來，同時也包含了鄧小平在內的老幹部。[158]4 月 18 日鄧小平藉著陪毛澤東會見金日成（1912-1994）的機會向毛澤東反映近來江青、張春橋等人反經驗主義的情況，表示不同意這樣的做法，鄧小平的想法得到毛澤東的贊同。[159]

毛澤東知道江青、張春橋等人反經驗主義是爲了維護文革，以對付黨內外的翻案復辟勢力，但毛澤東認爲他們這次所用的題目不僅是打擊周恩來，同時也會波及到黨內軍中的一些老幹部及鄧小平，這樣一來打擊面太大。[160]4 月 23 日毛澤東在姚文元送審的新華社〈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毛列的一種表現**」[161]毛澤東的批示，除了是想要出面制止江青等人批判

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37。

[157]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54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51；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352。早在文革被張春橋就參與打倒鄧小平一事，張春橋在 1966 年 12 月 18 日與蒯大富密談，佈置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具體措施，張春橋是把打倒劉少奇運動進向社會的幕後黑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38；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整理，〈張春橋緣何在法庭上一言不發〉，《縱橫》，期 11（2005 年），頁 164-165；王芳，《王芳回憶錄》（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45；吕相友，《中國大審判-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圖文紀實》，頁 73-74。

[158]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52-553。

[159]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上卷，頁 37；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352；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整理，〈張春橋緣何在法庭上一言不發〉，《縱橫》，頁 35。

[160] 高文謙，《晚來周恩來》，頁 554。

[161]〈對新華社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請示報告的批語〉（1975 年 4 月 23 日），毛澤

經驗主義這種不具策略的作法外，同時也是爲了化解人們對江青的怨恨。[162]4 月 27 日，在中央政治局討論貫徹毛澤東批示精神的會議上，葉劍英、鄧小平等人嚴厲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反經驗主義的錯誤，也對江青在 1973 年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周恩來時提出這是「第十一路線鬥爭」[163]、批林批孔[164]運動中的「三劍齊發」[165]以及在政治局內搞宗派活動的問題提出批判，當天會議上出席的政治局委員除了「四人幫」外，皆同意將毛澤東的批示下發，以扼止批評「經驗主義」的風潮，會上張春橋提出反對意見，他表示只要這個批示只要在其他文件附帶提一下就可以，當天江青在會上稍微做了檢討。[166]會後江青找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1944-）訴苦，說 4 月 27 日政治局是在搞圍攻，是 1970 年廬山會議的再現，希望毛澤東能出面替她說說話。[167]除了跟張玉鳳訴苦外，江青也請王洪文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澤東報告，江青要王洪文挑起毛澤東的文革情結，在報告中王洪文說鄧小平出來後沒有像樣的講過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這場會議的背後指使者是周恩來，鄧小平和葉劍英是在代替周恩來說出周恩來想說卻說不出來的話，目的是要翻 1973 年 12 月批周會議的案。王洪文的一番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雖然鄧小平在復出前曾保證過永不翻案，會毛澤東還是半信半疑，現在周恩來和

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426。《人民日報》1976 年 11 月 19 日發表的《“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一個黑綱領－批判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反經驗主義爲“綱”》一文中，用黑體字引用了這個批語的主要內容。

[162]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54。

[163] 1973 年 11 月在政治局批評周恩來同基辛格會談中所犯錯誤的會議上，江青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争。〈對江青誣陷周恩來的批評〉（1973 年 12 月 9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64] 1974 年 1 月 18 日由毛澤東授意，江青奉命執行的批林批孔運動正式展開，這場運動首當其衝的是郭沫若，在其實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運動真正的對象是周恩來。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492、495。

[165] 即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01。批走後門是衝著葉劍英而來的，1974 年 1 月 25 的批孔大會上，遲群說：「外交部、一外（北京第一外國語學院），很值得檢查，那裏首先就有一個清華大學的黨委常委的一個孩子，是走後門進去的。」批走後門事件後，葉劍英的女兒中斷學業，到福建的一個農場勞動。〈周恩來江青遲群謝靜宜姚文元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的講話〉（1974 年 1 月 2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 1966-1976》，下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年），頁 425。

[166]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55；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 160。吳德表示在政治局與「四人幫」吵架一事，周恩來希望他們以和爲貴，也提到毛澤東正在觀察雙方的意見，並且提到要小心「四人幫」的反擊。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 162。

鄧小平靠得很緊，讓毛澤東起了很大的疑心。[168]

爲了密切注意鄧小平的動作，毛澤東繼續捧鄧小平壓江青，除了支持政治局對江青的批評外，又指定鄧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批江的會議。[169]5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爲了解決政治局內部在批經驗主義時所發生的爭執，毛澤東將批經驗主義的責任擔了下來，他說：「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出來。」[170]「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分裂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要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171]對於「四人幫」的問題毛說：「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172]這次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和周恩來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鄧小平主持。[173]

周恩來認爲批經驗主義這件事是由張春橋引起的，5 月 21 曰，周恩來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委全體成員，信中針對張春橋企圖鑽毛澤東談話的漏洞，不想認錯的問題，在說明事實經過的同時，也說明了張春橋對挑起批經驗主義一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174]周恩來在信中寫道：「關於弄清當時沒有聽清楚問題，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時提到“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橋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兩篇社論，也是根據文志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說，他向主席請教的是指春

---

167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 166。
168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55-556。
16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56。
170〈毛澤東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5 年 5 月 3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毛澤東把姚文元寫的文章講成是張春橋所寫。
171〈毛澤東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5 年 5 月 3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72〈對“四人幫”的幾次批評〉（1974 年－1975 年），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397。毛澤東雖然當眾批評了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但在周恩來看來，毛澤東實際上只是擺擺樣子，應付一下黨內外的輿論，並不想真正解決問題，最多只是想要約束他們一下而已。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58。
173 張樹德，《紅牆大事-共和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68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61。
17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62。

橋同志在總政三月一日召開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當時還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會議正式提出了這個問題－鄧注)這在各大軍區政治部向總政反映討論情況三四月份電報中可以看出。」[175]張春橋對於周恩來當眾把他的問題拿出來討論,感到很不滿意,張春橋在周恩來的信上批:「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但我不反對報主席。」[176]對於張春橋的反應,周恩來在幾天後寫信給張春橋,反駁他所謂不確切之說,信中指出張春橋在批林整風時,提議將主席批印的《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斯列寧主義》重印一批發下去,就已經有了批經驗主義的思想,而這次學習理論運動更是走到片面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地步。[177]周恩來在信尾寫道:「我這段回憶的文字,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確切,請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寫,我決不會介意,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178]看了信後張春橋也表示不再改了。周恩來對江青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有較深切的體認,因此,在反擊批經驗主義上,周恩來不正面觸動江青,而是找張春橋開刀。[179]

對於「四人幫」的問題,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了很多次對「四人幫」進行批判的會議。[180]毛澤東的心思只有張春橋多少能體會出一些,張春橋寫了檢討:「主席關於不搞四人幫的指示,一定堅決照辦,並盡可能地做好團結工作。至少不給主席增加負擔。」[181]其實毛澤東這麼做除了在安撫對江青積怨極深的黨內軍中大老外,也是希望在政治上麻痺鄧小平,該他充份表演和暴露。[182]

---

[175]〈周恩來就傳達毛澤東 4 月 21 日批示問題給政治局委員的信〉(1975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信中指鄧小平向毛澤東請教張春橋一事,應是指 4 月 18 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金日成之後,向毛澤東反應三月初來江青、鄧小平等大反經驗主義一事。中共中央文獻室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37。

[176]〈周恩來就傳達毛澤東 4 月 21 日批示問題給政治局委員的信〉(1975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77]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63;霞飛,〈「文革」中毛澤東提出「三要三不要」內情〉,《黨史博覽》,期 10(2003 年),頁 13。

[178]〈周恩來給張春橋的信〉(1975 年 5 月 2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7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67。

[180]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頁 727。

[181] 丁望主編,《原版文革密件第一卷:關於四人幫事件(1976)》,頁 24。

[182]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65。觀察鄧小平主持批江青等人會議,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強勢作風感到擔憂。

1975 年秋天，根據毛的建議由毛澤東的姪子毛遠新（1941-）擔任毛澤東與政治局之間的非正式聯絡員。[183]9 月 27 日及 11 月 2 日毛達新（1941－）跟毛澤東進行彙報，毛遠新說他在省裡工作時感到一股批文化大革命的風，這次似乎比 1972 年批極左時還要凶，又說他注意到鄧小平的談話裡很少說到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也很少批評到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很擔心中央會出反覆。[184]毛澤東把毛遠新的談話和 10 月時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透過鄧小平傳二封信給毛澤東的事情連結起來。[185]針對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毛澤東說：「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186]對於劉冰的來信，毛澤東說：「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過小平轉。小平偏担劉冰。清華所涉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二條路線鬥爭的反應」[187]毛澤東不允許有人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毛澤東要毛遠新和汪東興及陳錫聯一起找鄧小平談一談。[188]毛遠新和鄧小平談到這件事時，鄧小平質問毛遠新是在指他在執行修正主義路線，是在指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線，毛遠新也很不客氣的回鄧小平說，鄧小平就是修正主義。[189]11 月 3 日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他與鄧小平的談話

---

[183]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52。經過「林彪事件」，毛澤東從未把權力全擺在一個人身上。在政治大局上，他採用的是讓不同的政治勢力相制衡的辦法；在個人信任上，他最終選擇的還是自己的親人。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13。高文謙表示毛遠新接任他的連絡員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毛澤東懷疑王海容、唐聞生和周恩來、鄧小平靠得太近，所以才會採取掉換的措施，就像發動文革前用江東興接替楊尙昆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一樣。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80。

[184]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14-415；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53；霞飛，〈毛澤東生命中的最後一年〉，《黨史博采》，期 12（2004 年），頁 5。徐景賢表示王洪文曾親口告訴他，在 1975 年國慶過後，李先念曾向毛澤東彙報鄧小平的講話似乎有問題，似乎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376-377。

[185]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54。

[186]〈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 年 10 月－1976 年 1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487。

[187]〈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 年 10 月－1976 年 1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486。劉冰在 8 月 13 日及 10 月 13 日劉冰透過鄧小平上書給毛澤東，反應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和副書記謝靜宜專橫並違反黨的原則活動，毛澤東看了這二封信後認為劉冰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鄧小平為劉冰轉信表示鄧小平是支持劉冰而反對遲群和小謝。鄧小平的態度讓毛澤東感到很不高興。劉冰，〈冒險上書－我是如何向毛主席揭發遲群的〉，《百年潮》，期 5（1997 年），頁 44-45；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12。

[188]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55。

[189]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375。

情形，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反應並沒有感到意外，毛澤東表示鄧小平要有個轉彎，並且指示再找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一起討論，即使吵也不要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毛澤東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190]毛澤東希望讓鄧小平以這個基調爲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做一個決議，這不僅可以堵住對文化大革命有議異的人的嘴，同時也是再給鄧小平一次機會，無奈鄧小平明確表示他是身在桃花源中的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191]鄧小平這一番話無異是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六年，他既沒參與也不了解，所以不適合爲文化大革命做一個肯定的決議。因爲鄧小平不讓步的態度，讓毛澤東下了要進行「批鄧」的決心。[192]

1975 年 11 月 24 日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會上鄧小平宣讀毛澤東親自審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這次會議無非就是要鄧小平不做檢討，並讓大家知道毛澤東的態度，這場會議後，開始出現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這場運動從不點名批評鄧小平，到最後發展成爲公開批評鄧小平。[193]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來與世長辭，爲舉行周恩來的追悼會，鄧小平在 1 月 12 日致函請示毛澤東，毛澤東也同意悼詞由政治局會議審定，但在致悼詞上張春橋提議由葉劍英來致詞，因爲他們希望透過這次活動來剝奪鄧小平的政治地位，但葉劍英拒絕。[194]1 月 15 日周恩來追悼會上致悼詞是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前最後一次在電視前露面，此後，

[190]〈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 年 10 月－1976 年 1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486。

[191] 中共中央文獻社主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89》，上冊，頁 132。

[19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26-427。毛遠新在毛澤東耳邊吹風的這一段期間，康生也透過電話轉告毛澤東說鄧小平的翻文化革命的案，爲了在有生之年爲文化大革命作出定論。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26、434。

[193]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28-429。

[194]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43；中共中央文獻社主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89》，上冊，頁 143。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周啓才表示，會議當天「四人幫」一開始就反對由鄧小平致悼詞，江青提議由王洪文致悼詞，王洪文自認無法勝任，而張春橋也認爲王洪文不適合，因而張春橋提議由葉劍英擔任。在悼詞上，當天會後張春橋對周啓才和李鑫表示，悼詞中號召向總理學習的部分不必寫得那麼實，壓縮一下，籠統的寫幾句即可。周啓才，〈周恩來訃告和悼詞起草前後〉，《北京檔案》，期 4（2004 年），頁 39。

開始進行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潮。[195]關於鄧小平的問題毛澤東認爲是屬於人民內部的問題與劉少奇及林彪的問題是不同的。毛澤東處理鄧小平問題的態度令江青、張春橋等江青集團成員感到不解，爲了徹底打倒鄧小平，1 月 24 日王洪文送給毛澤東一份「上海走卒馬天水揭發鄧小平材料」，材料中指出鄧小平在1975 年 6 月 1 日與馬天水談話，告誡馬天水不要與江青集團搞在一起，並且還點了張春橋的名。王洪文認爲鄧小平此舉是一種挑撥策反。[196]江青集團原來想在打倒鄧小平後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張春橋主持國務院工作。[197]但在這一份由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由華國鋒爲國務院代總理的中共第 1976 年1 號「中共中央文件」，粉碎了張春橋的夢。[198]雖然毛在做這個決定前要毛遠新告訴張春橋要他讓一下。[199]但從發布「中共中央文件」1976 年 1 號後，張春橋於2 月 3 日在日記裡寫下：「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兇，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的估計自己的力量。人民是決定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

[195]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46。周啓才表示因爲在政治局裡討論悼詞時「四人幫」一直攻擊周恩來不捍衛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們在寫悼詞時再三考慮後決定加上「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們將這個想法告訴汪東興，汪東興表示同意，之後他們到鄧小平那裡，將他們的建議告訴鄧小平，鄧小平親自在「他衷心愛戴和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句話後邊親自加上這一句話，並在悼詞首頁寫上請主席審閱，毛澤東也在 1 月 14 日圈閱同意。周啓才，〈周恩來訃告和悼詞起草前後〉，《北京檔案》，期 4（2004 年），頁 39；中共中央文獻社主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89》，上卷，頁 143；〈對周恩來悼詞的批語〉，（1976 年 1 月），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515；〈在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上鄧小平副主席致悼詞〉（1976 年 1 月 1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96]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49-450。鄧小平是利用陪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到上海訪問時順道與馬天水進行談話，準備挖張春橋的牆角。在鄧小平找馬天水之前王洪文已事先打電話給馬天水，要馬天水有所準備。6 月 12 日馬天水向鄧小平進行彙報，鄧小平對馬天水彙報的內容並不感興趣，於是鄧小平打斷馬天水的報告，表示要和他對於近來發生的事情通通氣，鄧小平表示近來批經驗主義之風惹得毛澤東很不高興，這股批經驗主義的風潮再發展下去，就要揪人了，鄧小平不僅點名了張春橋、姚文元，也把江青牽入其中，馬天水當天並沒有對這件事表態。事後，姚文元到上海時，馬天水向姚文元密報鄧小平與他談話的詳情，姚文元除了對馬天水當天的態度表示讚許外，也表明會將此事告知張春橋及王洪文。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351-353；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50；王勇，〈馬天水投靠“四人幫”的結局〉，《黨史文苑》，期 17（2006 年），頁 48；朱通華，〈“四人幫”有匹好“馬”〉，《黨史文苑》，期 10（1997 年），頁 74。

[197]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49。

[198]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68。

[199]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66。

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份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200]可以看出張春橋的失望，而張春橋的「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不僅是對鄧小平的諷刺，同時也隱含對華國鋒的不滿。[201]

1976 年 2 月 25 日到 3 月初，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打招呼會議），傳達經由毛澤東批准，由毛遠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澤東在談話中點名批判鄧小平，華國鋒在打招呼會上表示：「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但點名的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廣播、登報」[202]會議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說他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203]馬天水在張春橋的鼓舞下也在上海小組會議上大罵鄧小平搞非法組織活動，挖牆腳，分裂黨。[204]江青集團的行徑導致 2 月開始福建、貴州陸續貼出表達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不滿的大字報。3 月 5 日上海《文匯報》在刊登一篇紀念和學習雷鋒（1940-1962）的新聞稿時，將原稿中周恩來爲雷鋒的題詞全部刪除。3 月 25 日《文匯報》刊登〈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用「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205]，用這樣強烈的語言來批判周恩來和鄧小平，《文匯報》的這些行徑招來很多民眾的抗議，並要求《文匯報》要交待事情的真相。[206]

200〈張春橋日記〉（1976 年 2 月 3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01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768；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51。

202〈對華國鋒在中央召集的打招呼會議上講話稿的批語〉，（1976 年 2 月 25 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 526。

203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54。

204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356；司馬東去，〈"四人幫"的一匹馬〉，《領導文萃》，期 12（1999 年），頁 116。

205〈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文匯報》，（1976 年 3 月 25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冊，頁 388。

206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59-460。《文匯報》刪掉的題詞爲：不少部隊還培訓了雷鋒故事講解員，結合各項政治運動和部隊工作，向幹部和戰士介紹雷鋒同志愛憎分明的政治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引導大家走雷鋒成長的道路，做雷鋒式的共產主義新人。〈《文匯報》刪去了新華社關於向雷鋒學習報導中的周恩來題詞〉，《文匯報》，（19676 年 3 月 5 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

當全國民眾悼念周恩來之餘，反對江青集團的活動也持續進行，3 月 7 日四川出現張貼張春橋的大字報。[207]貴州、福建、廣東、武漢也相繼出現批評「四人幫」的大字報，在南京除了悼念周恩來外，也出現反對「四人幫」的示威活動，還出現「打倒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的大字報。王洪文認爲在南京發生的事件是衝著中央來的，是爲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4 月 1 日政治局開會討論南京和各地出現的悼念活動，會後中央以電話通知說南京出現的大字報、大標語是爲了要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要徹底追查這個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人和謠言的製造者。[208]4 月 3 日北京市當局召開如何處理悼念周恩來花圈的座談會，會上建議讓花圈擺到 6 日，再由群眾自行取回或送到天寶山。4 日天安門廣場上出現比較混亂的場面，當天晚上華國鋒主持會議，會上吳德表示：「這些活動是受了鄧小平的影響，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209]並要求爭取三大做群眾工作，當時政治局的同志及「四人幫」都同意北京市委的建議，但當魯瑛傳來在天安門廣場有人發表罵江青的演說後，江青非常生氣，並說要把這個反革命分子抓起來，並要求在 4 月 5 日天亮前將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全部送到八寶山。4 月 5 日早上當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時發現花圈已不見，這個場景激怒了群眾，憤怒的群眾衝擊人民大會堂，廣場上發生暴動的事件。[210]當天下午張春橋在政治局會議上對著鄧小平說：「你看看，你就是納吉。」[211]張春橋在日後給兒子張旗的信中談到對「四五運動」的感想：「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會堂，如同親眼看匈牙利事件一樣。我有幸看到納吉的醜惡末日，出了一點氣（這一段，外人不知

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冊，頁 386。

[207] 李耐因，〈從姚文元的札記看“四人幫”覆滅前的罪惡心態〉，《炎黃春秋》，期 9（1997 年），頁 36。

[208]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460-461。

[209]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 208。

[210]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 206-213。

[211]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 212。納吉指的是伊姆雷・納吉（Imre Nagy），曾任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主席。1954 年 4 月被解除黨政職務，11 月被開除黨籍，1956 年匈牙利事件中，重任部長會議主席，宣布匈牙利退出華沙公約組織。匈牙利事件平息後，1958 年因「反革命罪」被處死。1989 年匈牙利政府爲其平反。中共中央文獻社主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89》，上卷，頁 149。

道，你們也不要吹出去）。」[212]

4月6日會議中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表示天安門的性質變了的批示，張春橋表示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台廣播動員群眾離開現場，江青指著吳德要將講話錄音，放錄音帶動員群眾離開，在政治局的同意下由吳德錄製講話，會上決議當晚六點廣播，八點出動民兵。因爲毛澤東將天安門事件定位爲反革命暴亂，讓張春橋又度過了被「炮打」的這一關。[213]

4月7日毛遠新傳達毛澤東表示天安門爆發焚燒、打架事件，天安門的活動已變成了反革命事件的指示，當天毛遠新還傳達了毛澤東希望華國鋒接任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副主席以及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保留黨籍的提議。[214]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215]

鄧小平的下台對張春橋而是件值得高興的事，但毛澤東並非把第一副主席及總理的位置留給他而是給了華國鋒。[216]1976年4月下旬，毛澤東爲華國鋒寫下「你辦事，我放心」，從此確立了華國鋒接班人的位置。[217]

第四節　公審張春橋

1976年10月6日晚上，葉劍英帶上警衛參謀，讓司機開車從玉泉山來到中南海懷仁堂，懷仁堂內只有少數執行特殊任務的人員，擔任著警衛。華國鋒幾乎在同一時間到達，而汪東興帶著警衛人員已守候在大廳。他們碰了面，以目示意。[218]

---

[212]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331。
[213] 霞飛，〈南柯一夢："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下），《黨史博采》，頁52。
[214]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頁213-216。吳德表示當天晚上吳忠到現場指揮把握民兵出動時機，晚上8點時陳錫聯一直打電話催促，但吳忠表示廣場上人仍太多，不適合出動民兵，晚上10點半時吳忠命令把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全打開，並再一次播於吳德的錄音講話，晚上11點時民眾大多散去之後，才出動民兵，清理現場時難免有暴動，但並沒有任何人死亡。吳德，〈我所知道的四五事件高層決策內幕〉，《春秋》，期2（2006年），頁9。
[215]〈對選印的天安門事件中詩文原件的批語〉（1976年4月13日），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534。
[216]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頁332。
[217] 范碩，《葉劍英在197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頁203；滌生，〈華國鋒：決策在1976〉，《黨史縱橫》，期7（2004年），頁9。但姚文元在日後接受專訪時表示，這件是並不是事實。羅冰，〈姚文元寫毛澤東內幕〉，《爭鳴》（香港），期12（2003年）http://www.epochtimes.com/b5/3/12/19/n432743.htm（2007/4/16）
[218] 范碩，《葉劍英在1976》，頁291-294。

張春橋最先露面，他吃晚飯後帶上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及建立毛澤東紀念堂的文件，和秘書及警衛員一起上車，準時到會。[219]要進門時，隨身警衛被留在外面，他感到事情不太對，不停說著怎麼回事，但在尚未弄清發生了什麼事時，負責解決江青集團問題的行動人員，帶幾個人包圍張春橋，然後帶他入正廳，他一進門檻，看到葉劍英和華國鋒，張春橋徹底明白他被抓了。接著，華國鋒宣讀了事先寫好的隔離審查決定，並立即執行。張春橋被監護人員拉出正廳北門，到一個候審的地方。之後，王洪文也來到，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一群警衛人員朝他走過來，王洪文說自己是來開會的，但警衛人員將他帶入正廳，同樣也聽華國鋒宣布他的罪狀和隔離審查的決定。送走張春橋、王洪文後，時間來到八點一刻，姚文元也來到，不過，對他的處置，算是降了規格，因爲沒有讓他進正廳，只讓他在東廊的休息室裡待命，也沒有讓華國鋒宣布隔離審查的決定，而是經過請示，由中央警衛局一位副局長宣布的，等到姚文元聽到決定，弄清楚事情真相，他同樣也被幾個警衛送走。[220]

在處置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同時，葉劍英等也安排了一組人員去釣魚臺，這些人員在釣魚臺辦公室封文件、要鑰匙。他們對江青宣布了隔離審查的決定，江青先是拒絕交出保險櫃鑰匙，然後把鑰匙裝進一個大信封裡，寫上華國鋒總理親啓，才完成交接手續，隨後江青由警衛人員押到一處地下室的一個房間裡候審。[221]江青集團成員被關在不同的地下室，不過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也沒有人向他們透露半點消息。在解決江青之前，還有另一組人員到中南海毛遠新的住處，對他採取保護審查的措施。對遲群、謝靜宜[222]（1935-）等，則由北京衛戍區負責解決。爲控制輿論，還有一組人員奉命接管了新聞、廣播等宣傳機關。

---

219 霞飛，〈南柯一夢："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下），《黨史博采》，頁 54。

220 范碩，《葉劍英在 1976》，頁 295-298。張春橋對於自己有可能會被捕是有所準備的，1976 年 5 月，張春橋在給徐景賢的信中又一次說：「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402-403。

221 薛慶超，〈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覆亡〉，《黨史天地》，期 2（2005 年），頁 17；丁家琪，〈粉碎"四人幫"鬥爭中的將帥們〉（四），《國防》，期 4（2005 年），頁 82；紀希晨，〈粉碎四人幫全景寫真〉（下），《黨史縱覽》，期 10（1994 年），頁 16。

222 謝靜宜又名謝時清，1935 年 11 月生於河南商邱，1956 年 5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2 年 11 月被開除黨籍。丁望主編，《原版文革密件第一卷：關於四人幫事件（1976）》，頁 246。

當晚10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玉泉山九號樓召開，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通報了中共中央已對江青集團採取行動，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實施了隔離審查，並說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研究日後所要解決的問題和方針。1976年10月18日，中央發了16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16號文件公佈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一系列批評，毛不只一次提到要解決「四人幫」，這說明了中央政治局是按照毛的指示精神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所採取的行動是有根據的。[223]1976年12月10日，中央發了24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文件中提到：「他們是名副其實的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224]

1977年3月1日，在張春橋寫信給中央，信中申明：「未經我簽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認對處理我被審查的案件有效性。」[225]1978年5月審問張春橋時，他表示他不說，以後再說。1979年9月中紀委找張春橋談話，張春橋除表示沒有必要說外，就不吭聲了。[226]

1980年6月2日公安部提審張春橋，王芳（1920-）[227]向張春橋宣布中央決定，並跟張春橋特別強調《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的辯解，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或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228]王芳問張春橋是否有聽清楚，張春橋說：「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229]此後不管問他什麼張春橋都不說話，要他在

---

[223]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7）》（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頁71。
[224]〈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1976年12月10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25] 王芳，《王芳回憶錄》，頁241。
[226] 王芳，《王芳回憶錄》，頁241。
[227] 王芳是當時負責主審張春橋的浙江省委副書記。王芳，《王芳回憶錄》，頁232。
[228] 姚倫，〈我參與審訊“四人幫”的一點回憶〉，《百年潮》，期4（2002年），頁18。
[229] 王芳，《王芳回憶錄》，頁240。

預審筆錄上簽字，他也表示不簽。在預審期間一共提審了 11 次，每次預審張春橋除表示不看預審紀錄，不簽字外，始終耷拉著腦袋，緊閉著嘴坐著。[230]

1980 年 11 月 10 日將公安部起訴書副本送給張春橋，並告訴他被告人有權辯護，還可以委託律師辯護，張拒絕接受，並說：「我不同意，我也不接受。我不接受，我要律師幹什麼？」[231]

1981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儘管張春橋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拒絕回答問題，也絕不認罪，但特別法庭根據掌握的大量材料、人證、物證，認定他犯有組織領導反革命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誣告陷害罪等罪刑，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32]以法律和人民的名義，對他的一生蓋棺論定。[233]

關於張春橋爲何在法庭從頭到尾都不說一句話一事，王文正表示，在隔離審查初期，張春橋並不是這種態度，他開口說過話，也向葉劍英寫過求饒的信，一開始張春橋也講了王洪文到長沙誣陷周恩來一事，當問張春橋爲什麼要這樣做時，張表示因爲當時周恩來已經病到快不行了，他們要想辦法全力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審訊人員接著問張春橋，他們希望由誰來擔任第一副總理並在以後接任總理的職務，張春橋回答：「他們的意思是讓我來。」[234]張春橋無意間的一句話暴露了他們的意圖，他們所做的一切並不完全是毛澤東的指示，而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張春橋的這一句話讓預審工作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張春橋發現自己在這一次的回答上有失誤，爲了防止這種情況再發生，張春橋從此就沉默不語了。[235]

---

[230] 王芳，《王芳回憶錄》，頁 242。
[231] 王芳，《王芳回憶錄》，頁 247-248。
[232] 王芳，《王芳回憶錄》，頁 249。
[233] 王海光，〈張春橋之死〉，《領導文萃》，期 8（2005 年），頁 118。1983 年 1 月，張春橋緩刑二年已滿，被最高人民法院改判爲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霞飛，〈南柯一夢：“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下），《黨史博采》，頁 54。
[234]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頁 171。
[235]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頁 171；陳東林，〈公審時，張春橋爲何緘默不語〉，《黨史天地》，期 6（1999 年），頁 47。王文正表示在預審「四人幫」時，他們把一切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只承認自己是認知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

1980 年 7 月 24 日針對張春橋在上海策劃武裝叛亂一事進行審問，針對 1976 年 9 月 27 日蕭木到「釣魚台」找張春橋後談些什麼及隔天是否指使蕭木到上海之事，張春橋均拒絕回答，在這個情況下只有請徐景賢作證，並當庭宣讀張春橋秘書嚴忠實的證言。[236]

嚴忠實表示張春橋要他打電話請蕭木到「釣魚台」談了約三小時的話，蕭木要回上海前打電話問張春橋是否有要交待什麼事，張春橋得到消息後請蕭木到「釣魚台」找他，並從 8 點多談到 11 點多。[237]

而徐景賢、馬天水、王秀珍（1935-）的證詞則是說 9 月 28 日張春橋派蕭木到上海直接向他們傳話，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徐景賢認爲可能是因爲 9 月 21 日聽了他的彙報後，經過一番的思考後所交的底。[238]徐景賢從蕭木口中得到張春橋向他們發出要打仗的動員令。[239]徐景賢表示張春橋多次引用過「赤條條來去無牽掛」[240]來開導、啓發他們，且又多次提及「準備殺頭」的話來對他們進行「反革命」的教育，所以，他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時，他確實是抱持著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豁出自己的性命，這次「反革命武裝叛亂」不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發生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一場叛亂是江青集團在上海苦心經營了十年的必然結果。[241]這場叛變是「**張春橋連續從北京向上海發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

片面，是執行上的錯誤，他們用這來對抗審訊，讓審訊員無法判定他們的行動，究竟是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還是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威信，在搞改朝換代的把戲。前引書，頁 171。

[236]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頁 19-20。

[237]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頁 20。

[238]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頁 21。徐景賢表示 1976 年 9 月 21 日他到北京向張春橋進行彙報，其中有一件事是講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表示因爲六十軍的領導員是許世友的人，所以他指揮不動，這個軍區位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大，要我們有所準備，馬天水已增發槍支給民兵了，且據說當初會把六十軍區放在上海附近，也是葉劍英和許世友的主意，張春橋聽完後表示要小心階級鬥爭的動向。前引書，頁 26。

[239]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416。蕭木向徐景賢等人傳達：「張春橋說，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我不是憂天派，但是有點憂，多難興邦。老實說，上海沒有經受過嚴重的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前引書，頁 416。

[240] 此語出自於《紅樓夢》第二十二回。曹雪芹，《紅樓夢一百二十回》（上），（台北：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10 月），頁 191。

[241]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422。

策劃和導致」[242]王文正表示他最想了解的是到底張春橋和蕭木談了些什麼，從證詞裡瞭解到當天張春橋是交待了準備發動武裝叛變一事。[243]

在雙方的證詞有所違背下，照理說應採取當事人嚴忠實的證詞比較具真實性及可靠性，但當庭卻採徐景賢等人的證詞，最主要是因爲這是多人證詞，且他們是武裝叛變的主要發動者。[244]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在法庭上表示所謂的上海民兵組織，是指 1967 年 8 月下旬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後成立的「文攻武衛」，這個組織的任務就是武裝左派改造城市民兵，接著又建立了「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上海工人民兵，「文攻武衛」的性質就是以槍桿子來保衛筆桿子。上海民兵一向由警備區主管，但上海市委成立文攻武衛時打著武裝左派的口號，先是由革委會直接領導，等到市委會成立後再由市委會領導，領導權的改變實際上就是奪了警備區的民兵領導權，讓上海民兵成了上海市委的武裝部隊。張春橋提出民兵的訓練是要學會巷戰、游擊戰，要抓的是階級鬥爭，上海市委根據張春橋的思想，文攻武衛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走資派，而「四人幫」被打倒後，上海少數民兵企圖武裝叛變是因爲江青集團長期經營上海民兵的結果。王洪文在法庭上的證詞將上海民兵的成立及之所以會武裝叛變的主謀全都指向張春橋。[245]

至於「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後院起火」三事件在審判中爲何一直沒有被提到，當時參與審判的審判員王文正表示，針對這一件事當初有二種意見，一種是這三件事既然是張春橋專門回到上海支持的，那就應該要把這些事算在他身上，對他提起公訴，另外一種意見是，雖然這三件事是張春橋一手操縱的，但是事後卻得到毛澤東的支持，這只能算是工作上的錯誤，不能對這些事提起公訴。在預審前雙方對這件事發生了爭論，後來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提出，凡是經過毛澤東主席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關被告人的罪，根據這個原

[242] 徐景賢，《十年一夢》，頁 423。
[243]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頁 21。
[244]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頁 21。
[245]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頁 23-24。

則，雖是張春橋一手發起的事件，但因爲這三件事事後都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所以沒有定罪。[246]

此外在 1980 年公安部預審後，將張春橋任總政治部主任時，把他的親信徐海濤，從上海警備區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領導職務一事，以及張春橋在四屆人大時，任命于會泳爲文化部部長，並將原上海民兵指揮部周宏寶（1935-1994）調入北京任教育部負責人等情事，認定爲安插親信的罪行，但在最後判決時在張春橋的個人罪行裡卻沒有安插親信這一項。王文正表示張春橋身爲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職務之便，通過中央組織在上海選調幹部到中央任職，這些都是經過中央同意的，是通過合法的組織程序手續調到中央部門的，雖然實質上是安插親信，進行具有野心的政治活動，但在當時是合法的，是合乎組織程序的，在經過大家討論後，最後採納這個建議，並沒有將這個罪行列入。[247]

[246]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頁 172-173。
[247]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整理，〈張春橋緣何在法庭上一言不發〉，《縱橫》，頁 37-38。

第六章　結論

張春橋在 1930 年代自命爲前進作家，剛在文壇嶄露頭角就開始批評在文學成就上比他高的作家，還因爲以魯迅的一番筆戰，而留下日後成爲他人詬病的「歷史問題」。1937 年張春橋到了延安，並於 193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爲擔任《石家莊日報》社長而與當時擔任石家莊市長的柯慶施熟識，在柯慶施的提攜下，成爲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並承襲柯慶施凡事緊跟毛澤東的行事風格，以毛澤東的動向爲自己的行動指標。1958 年透過柯慶施得到毛澤東對於供給制深具好感，對於八級工資制所造成的等級差別則很有意見，在揣摩上意之下發表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澤東的心思，毛澤東親自爲該文寫了編者按，交付《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還請陳伯達帶張春橋到河南鄭州，前往衛星公社調查，可見得張春橋在毛澤東心中已留下深刻印象。1963 年開始江青插手抓樣板戲經常往上海跑，在柯慶施的引薦下張春橋與江青接近，並協助江青修改樣板戲，1965 年柯慶施去世後，張春橋取代了柯慶施的位子，並也獲得江青的信任，透過江青的關係，毛澤東對張春橋的印象更爲深刻。爲了打開發動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缺口，在江青的策劃以及毛澤東多次修改下，由張春橋及姚文元完成了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並點燃了文化大革命之火。

1966 年張春橋參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組，並成爲「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同年 11 月赴上海「安亭事件」時，他置中共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見於不顧，擅自按造反派意願簽訂了協議。張春橋此舉，有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但也反應出他的膽識，事後還換得毛澤東的信任：「**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1]，張春橋在安亭事件的處理上符合毛澤東的文革大戰略，深得毛澤東的贊同，以往毛澤東對張春橋的賞識主要是在理論上，安亭事件讓毛澤東見識了

[1]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 145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13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64。

張春橋在處理重大事件的能力。安亭事件的另一個效應是促成上海文革中最重要的二位人物張春橋和王洪文的相遇，文化大革命中重要的一股政治勢力的形成就是從這次見面開始的，這次見面爲日後形成的「四人幫」奠定基礎，藉由這次事件也讓中央文革派找到了一股真正能夠爲他們所用的社會力量，而這股社會力量不僅左右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形式，也左右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形式。

1967年1月，張春橋爲了貫徹毛澤東的思想，張春橋發動所謂的一月革命，讓上海的工人動起來，讓上海由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讓這一股奪權風影響全國。上海奪權運動雖是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聯手策劃，但背後真正的支持者應該是毛澤東，因爲毛澤東希望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2月5日張春橋在上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但毛澤東認爲「上海人民公社」這個名稱不好，涉及了國家體制的問題。最後，毛澤東決定將「上海人民公社」改爲「上海革命委員會」，張春橋任革命委員會主任，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改爲「上海革命委員會」。同年2月張春橋在懷仁堂受到老將譚震林、陳毅等人的斥責，事後張春橋向毛澤東告狀，造成譚震林倒台，很多老將被打成「二月逆流」，這個事件過後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也被中央文革碰頭會所取代。

文革初有一個與張春橋關係密切的特務小組「游雪濤小組」，該組織負責監控走資派即老幹部們的活動以及偵察一切反對中央文革及反對張春橋、姚文元的言行活動，張春橋很重視這個小組所提供的情報，後來爲了怕這個情報系統會連累到他，所以就下令解散，並讓游雪濤到「市革會」，因爲游雪濤仍常和以前的同伴聯繫，張春橋害怕連累到自己，1970 年 8 月在張春橋的指示下將游雪濤撤職下放勞改。

1968 年 4 月 12 日張春橋再度受到上海紅衛兵「炮打」，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又再度被提起，後來在軍方及馬天水的表態以及毛澤東一句無事下，「炮打」張春橋事件落幕。由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可看出，在毛澤東領導下一個人的歷史問題嚴不嚴重完全取決於毛澤東的認定。

1969 年毛澤東否定了由陳伯達所起草「九大」政治報告而選用由張春橋、

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顯示毛澤東有意提拔張春橋。這份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被陳伯達批評爲伯恩斯坦的觀點：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九大」政治報告，正式確認了代表毛澤東晚期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對其內容做了權威性的概括，確立爲全黨的指導思想。

此外，在九大會上陳毅被編在華東小組，這個組裡有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因爲上海代表事先已收到《陳毅反動言論小集》，所以陳毅在會上不管說不說話都會被批判，整個九大期間陳毅的處境十分艱難，後來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張春橋和徐景賢才停止了整陳毅的行動。張春橋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因爲陳毅在紅衛兵召開批鬥他的大會上發表了一篇批評中央文革，且帶有反對文化大革命宣言，傳到林彪那裡時，林彪很不高興，要吳法憲在軍隊一定範圍裡批陳毅，江青、張春橋得知林彪的反應後，江青要張春橋具體落實這件事，所以張春橋幾經思考下才決定在上海搜集陳毅的資料，並請徐景賢、王洪文等人在上海進行此事。

中央文革小組在九大後取消，但張春橋進入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正式進入中共領導階層。毛澤東對張春橋的肯定與栽培，引發了林彪對毛澤東要更換接班人的疑懼，因此對張春橋懷有敵意，林彪更在廬山會議揭幕當天的講話裡含沙影射批判張春橋，接著葉群、陳伯達、吳法憲等人在各組以有人反對毛澤東、有人貶低毛澤東來影射張春橋、發起了一場對張春橋的攻擊，希望能把張春橋打倒。[2]毛澤東認爲，這是要否定「文革」路線，予以迎頭痛擊，九屆二中全會後陳伯達遭軟禁，毛澤東繼續在陳伯達身上做文章，在黨內發動了「批陳整風」運動，然而這場運動其實是衝著林彪而來的。

在林彪事件後，周恩來極力批極左，毛澤東認爲周恩來的這種作法將會走向邪路上去，張春橋得知毛澤東的想法後，提出批左不要批過頭，公開和周恩來唱反調，有了毛澤東的支持，江青和張春橋在批左的問題上繼續和周恩來纏鬥。1972 年 12 月 5 日《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王若水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原本是希

[2]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97-298。

望爲周恩來的批極左思潮搖旗納喊，並對張春橋、姚文元二人要《人民日報》內部大反右傾回潮表示不滿，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但這封信卻剛好讓對於周恩來極力主張批左感到很不滿的毛澤東一個絕佳的反擊機會，毛澤東利用王若水的來信展開徹底封殺黨內批極左的聲音，以便根本扭轉批左的局面。毛澤東利用討論王若水來信的會議上公開支持了江青、張春橋批林彪「極右」實質的意見，導致批林方針產生了從左到右的轉折。

1973 年鄧小平復出，一開始張春橋對鄧小平的復出並沒有感到很大的威脅，但當毛澤東推荐鄧小平參加軍委工作，擔任總參謀長，讓在軍中只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張春橋感到鄧小平的復出對他造成很大的威脅。1974 年 10 月 4 日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爲了阻止鄧小平組閣，江青、張春橋除了藉由「風慶輪事件」向鄧小平挑釁外，王洪文也於 18 日飛往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鄧小平的狀，但這個舉動並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反而被毛澤東批評一頓，要他們不要搞四人小宗派，要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不要跟在江青後面。四屆人大上，張春橋雖沒有擔任第一副總理，但在副總理的排名上也僅次於鄧小平，且又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意味著毛澤東並他的信任並沒有減少。

1975 年張春橋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篇文章闡發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下繼續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打土圍子」、掃除「資產風」，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這篇被稱爲「張春橋思想」深得「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真傳，毛澤東並沒有看錯人，在四屆人大組閣之爭中力保張春橋，不讓人查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張春橋在理論上的表現沒有辜負毛澤東保他的苦心。

1975 年 3、4 月開始出現反經驗主義風潮，毛澤東知道江青、張春橋等人反經驗主義是爲了維護文革，以對付黨內外的翻案復辟勢力，但毛認爲他們這次所用的題目不僅是打擊周恩來，同時也會波及到黨內軍中的一些老幹部及鄧小平，這樣一來打擊面太大。於是毛澤東出面制止江青等人批經驗主義這種不具策略的搞法。

1975 年秋天，「劉冰事件」[3]後毛澤東開始對鄧小平產生不信任感，毛澤東讓政治局開會批評鄧小平，給鄧小平檢討的機會，但鄧小平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4]來表示自己無法對文化大革命做一個肯定的決議，因爲鄧小平不讓步的態度，讓毛澤東下了要進行「批鄧」的決心。1976 年隨著周恩來的去世，開始進行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潮。當中央政治局通過由華國鋒爲國務院代總理的中共第 1976 年 1 號「中共中央文件」後粉碎了張春橋的總理夢。張春橋於 2 月 3 日在日記裡寫下：「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的估計自己的力量。人民是決定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份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5]可以看出張春橋的失望，而張春橋的「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不僅是對鄧小平的諷刺，同時也隱含對華國鋒的不滿。隨著周恩來的去世以及鄧小平的下台，社會上迷漫著對「四人幫」的不滿的聲浪，這股不滿終於導致了 1976 年 4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這場運動被毛澤東定性爲反革命事件，「四五運動」後華國鋒接任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副主席而鄧小平黨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上，在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的策劃下，張春橋、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被隔離審查。[6]1976 年 10 月 18 日，中央發了 16 號文件公佈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一系列批評，其中毛澤東不只一次提到要解決「四人幫」，說明了中央政治局是按照毛的指示精神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1977

[3] 指的是劉冰寫信給鄧小平一事。
[4] 中共中央文獻室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132。
[5]〈張春橋日記〉（1976 年 2 月 3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
[6] 范碩，《葉劍英在 197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年），頁 301。

年 7 月在華國鋒的主導下，中共第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江青集團的決議，在決議中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推行的路線，是一條極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7]，關於中共中央對於江青集團等人的處置，推倒江青集團並非毛澤東原意，江青集團成員是推行毛澤東極左政策的極左派，沒有毛澤東的信賴、提拔、重用，江青等人也不可能集結成「四人幫」。毛澤東爲了替江青、張春橋等人鋪路，有時會勸告江青等收斂些，不要樹立太多敵人，在勸告他們時難免會有調侃他們爲「四人幫」的言語，不能因爲毛澤東曾經批評江青集團，就表示毛澤東和江青集團的崛起無關。[8]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裡披露，審判人員怕張春橋在法庭上胡言亂語，曾事先問過張春橋有什麼話要講，在審判人員一再逼問下，張春橋說：「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則是永存的，如果執政的共產黨不認真解決蛻化變質的問題，成為特權階級，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那麼人民群眾遲早會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再一次起來革命，打倒黨內的資產階級。」[9]1981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儘管張春橋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拒絕回答問題，也絕不認罪，但特別法庭根據掌握的大量材料、人證、物證，認定他犯有組織領導反革命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誣告陷害罪等罪刑，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張春橋是因爲文化大革命而崛起的新貴，在文革中忠實的推行毛澤東路線，在文革中不僅是奪權者，同時也是一位理論家。在理論方面，張春橋被視爲毛澤東晚年思想的傳人。張春橋極左的思想，使得他深受毛澤東的信賴，所以才能多次受到毛澤東的力保。

---

[7]〈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節錄）〉（1977 年 7 月 1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8] 丁望主編，《原版文革密件第一卷：關於四人幫事件（1976）》（香港：田園書屋，2006 年 9 月），頁 9。

[9] 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50。

至於張春橋在文革中的作爲，誠如江青在接受公審時所言：「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個卒子……」[10]張春橋也是毛澤東政治棋盤上的一個卒子，在毛澤東死後，張春橋終究敵不過擁有軍權的老帥，在華國鋒與葉劍英的聯手下，鋃鐺入獄。然而從他在審判庭上態度強硬的表現可看得出，他並不是一位見風轉舵的投機者，在文革勢力眾叛親離，紛紛倒弋之際，張春橋是一位始終堅守毛澤東理想的死硬派。

10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頁 277。

徵引書目

一、 史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譯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編，《中共機密文件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8 年）。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國防大學，1988 年 10 月）。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北京：國防大學，1988 年 10 月）。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冊（北京：國防

大學，1988 年 10 月)。

二、　專書

丁望主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三卷）彭德懷問題專輯（增訂二版）》（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9 年）。

丁望，《王洪文張春橋評傳》。(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7 年)。

丁望主編，《原版文革密件第一卷：關於四人幫事件(1976)》(香港：田園書屋，2006 年)。

于國勳等著，《藍衣社復興社力行社》(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年)。

王芳，《王芳回憶錄》(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王光美，《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

王文正，《王文正口述：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歷記》(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王宣，《毛澤東之劍－名將之星許世友》(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少華、游胡，《林彪的這一生》(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江青同志論文藝》(1968 年 5 月)。

列寧，《國家與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安建設編著，《周恩來的最後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驗》(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年)。

呂相友，《中國大審判-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圖文紀實》(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李文卿，《近看許世友 1967-1985》(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年)。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4 年)。

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

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台北：時報文化，1996年）。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年）。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上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下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
范碩、丁家琪，《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
范碩，《葉劍英在197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
埃德加・斯諾（美）著，賀和鳳著，《漫長的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徐向前，《徐向前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馬齊彬、陳文斌、林蘊輝、叢進、王年一、張天榮、卜偉華，《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3月第36版）。
張正隆，《戰將》（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 1966-1976》（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8年）。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
張雲生、張叢坤，《"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
張華、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張華、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張寧，《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5年）。
張樹德，《紅牆大事－共和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張聶爾，《風雲"九一三"》（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

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香港：三聯書店，1999 年）。
莫里斯·邁斯納（美國）著，杜蒲、李玉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陳曉農，《陳伯達的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
陳伯達著、陳曉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陳璋津，《俄國革命的性質》（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7 年）。
曹雪芹，《紅樓夢一百二十回》（上）（台北：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10 月）。
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黃曼君選評編輯，《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郭沫若》（台北：海風出版社，1990 年）。
葉永烈，《江青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年）。
葉永烈，《姚文元與姚蓬子》（台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 年）。
葉永烈，《張春橋浮沉錄》（台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年）。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懷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 1954-19791》（台北：新新聞文化，1997 年）。
劉武生，《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劉志，《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年）。
劉增人、馮光廉選評編輯，《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臧克家》（台北：海風出版社，1989 年）。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075-1987）》（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年）。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應國靖編，《中國現代作家選集-施蟄存》（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88 年）。

龍介秋、張學讓、柯煒編著，《中國軍事辭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 年）。
聶力，《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年）。
聶榮臻，《聶榮臻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年）。
聶元梓，《文革五大領袖－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羅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著，范思譯，《紅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冊（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 1967》（廣州：廣東旅游出版社，1997 年）。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三、　期刊論文

丁家琪，〈粉碎“四人幫”鬥爭中的將帥們〉（四），《國防》，期 4（2005 年），頁 79-82。
尹家民，〈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的設立〉，《黨史博覽》，期 1（2006 年），頁 34-38。
尹家民，〈“安亭事件”：張春橋的一次政治賭博〉，《黨史博覽》，期 5（2006 年），頁 10-14。
文安，〈楊成武將軍七年冤獄的前前後後〉，《福建黨史月刊》， 期 4（2004 年），頁 29-31。
天磨之，〈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前後〉，《黨史天地》，期 11（2005 年），頁 4。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整理，〈張春橋緣何在法庭上一言不發〉，《縱橫》，期 11（2005 年），頁 33-40。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期 2（2003 年），頁 88-91。
王永欽，〈 “四人幫”組閣與毛周長沙決策〉，《炎黃春秋》，期 3（2001 年），頁 2-7。

王永欽，〈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重大分歧（上）〉，《百年潮》，期 5（2002 年），頁 5-8。
王永欽，〈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重大分歧（下）〉，《百年潮》，期 6（2002 年），頁 35-38。
王年一、何蜀、陳昭，〈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期 2（2004 年），頁 137-154 。
王勇，〈馬天水魂斷上海灘〉，《黨史天地》，期 3（2006 年），頁 32-35。
王勇，〈馬天水投靠“四人幫”的結局〉，《黨史文苑》，期 17（2006 年），頁 46-49。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 1972 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百年潮》， 期 5（1998 年），頁 37-48。
王海光，〈張春橋之死〉，《領導文萃》，期 8（2005 年），頁 117-120。
王銳，〈「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和再研究〉，《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總期 55（2006 年 10 月），二十一世紀網路版：
hppt://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607039.htm（2006/11/13）
王曉曉，〈“九大”前後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報林》，期 3（2004 年），頁 16-17。
司馬東去，〈『四人幫』的一匹馬〉，《領導文萃》，期 12（1999 年），頁 113-118。
吉木，〈在領袖之間玩權術的陳伯達〉，《秘書之友》，期 6（1996 年），頁 40-41。
艾愷（Guy Alitto），〈文革：四十後的破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期 93（2006 年 2 月），頁 4-11。
朱通華，〈“四人幫”有匹好“馬”〉，《炎黃春秋》，期 10（1997 年），頁 72-74。
何梓林，〈鄧小平長沙之行〉，《百年潮》，期 8（2004 年），頁 19-23。
余煥春，〈大權旁落“文革”中人民日報奪權紀實〉，《百年潮》，期 12（2004 年），頁 4-14。
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當代中國史研究》，期 2（1995 年），頁 47-62。
吳德，〈我所知道的四五事件高層決策內幕〉，《春秋》， 期 2（2006 年），頁 8-9。
宋鳳英，〈文革期間的楊成武〉，《文史月刊》，期 5（2005 年），頁 28-34。
宋德金，〈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百年潮》，期 9（2000 年），頁 12-16。
宋雙來，〈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史縱橫》，期 7（2005 年），頁 31-33。
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許世友將軍〉，《黨史縱橫》，期 4（2003 年），頁

22-25。
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蕭思科組稿，〈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 期 2（1999 年），頁 10-21。
李耐因，〈從姚文元的札記看“四人幫”覆滅前的罪惡心態〉，《炎黃春秋》，期 9（1997 年），頁 36-40。
李艷君、婉君，〈張春橋與“安亭事件”〉，《黨史博采》，期 9（2004 年），頁 22-23。
周啓才，〈周總理訃告和悼詞起草前後〉，《北京檔案》，期 4（2004 年），頁 38-39。
周敬青，〈毛澤東對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確立和廢黜（中）〉，《黨史縱橫》，期 1（2004 年），頁 33。
姚倫，〈我參與審訊“四人幫”的一點回憶〉，《百年潮》，期 4（2002 年），頁 17-18。
紀希晨，〈粉碎四人幫全景寫真〉（下），《黨史縱覽》，期 10（1994 年），頁 8-21。
范碩，〈砥柱中流 艱難抗爭－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等進行“二月抗爭”始末〉，《淮陽師範學院學報》，卷 21 期 2（1999 年），頁 8-15。
范碩，〈“二月抗爭”前後的周恩來〉，《漳州職業大學學報》，期 2-3（2000 年），頁 8-15。
胡居成，〈許世友上將在文化大革命中〉，《黨史縱橫》，期 1（2000 年），頁 12-16。
夏國勝，〈姚文元成長三步曲〉，《黨史文苑》，期 5（2004 年），頁 53-55。
徐景賢，〈張春橋“九大”整陳毅的經過〉，《湖北檔案》，期 3（2004 年），頁 4-12。
秦維憲，〈反張春橋的“胡守鈞小集團”〉，《炎黃春秋》，期 9（2005 年），頁 9-14。
亞衣，〈“潘司令”談張春橋之死一要爲“四人幫”翻案〉，《議報》期 200，http://www.chinaeweekly.com（2006/11/13）
梁紅伍，〈康生死前爲何會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百年潮》，期 9（2006 年），頁 19-22。
陳立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關係始末〉，《黨史縱覽》，期 10（1994 年），頁 22-25。
陳東林，〈公審時，張春橋爲何緘默不語〉，《黨史天地》，期 6（1999 年），頁 47。
陳東林，〈魯迅與張春橋－“狄克”文章發表的前前後後〉，《黨史博覽》，期 11（2001 年），頁 10-16。
陳祥生，〈陳丕顯、曹荻秋在風雨飄搖的 1966〉，《黨史縱橫》，期 3（2005 年），頁 32-35。

陳揚勇，〈周恩來寫給老同志的一封信 1967 年 2 月『大鬧懷仁堂』事件之前〉，《黨史文苑》，期 5（2002 年），頁 31。

陳揚勇，〈抗爭與策略：對周恩來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黨史研究》，期 1（2002 年），頁 76-80。

舒雲，〈傅崇碧和“楊余傅事件”〉，《黨史博覽》，期 9（2006 年），頁 22-24、48。

黃岭峻、王作懋，〈“八級工資制”引發的兩次批評〉，《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17 期 4（2004 年 8 月），頁 475-478。

黃衛平，〈讀汪東興著《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所想到的〉，《開放時代》，期 6（1998 年），頁 112-115。

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7（1999 年 3 月），頁 137-155。

楊銀祿，〈九屆二中全會時的江青〉，《黨史博覽》，期 1（2006 年），頁 48-52。

煥然，〈陶鑄在“中央文革”〉，《黨史天地》， 期 5（2004 年），頁 11-17。

煥然，〈上海安亭事件始末〉，《黨史天地》，期 9（2004 年），頁 4-12。

煥然，〈從工人到黨中央副主席躍變的“文革”神話序曲－ “安亭事件”始末〉，《黨史縱橫》，期 10（2004 年），頁 22-26。

溫子春、李永春，〈許世友在 1966-1976 年〉（四），《黨史縱橫》，期 8（1998 年），頁 39-40。

雷炳炎、齊飛，〈從擇定到廢除－毛澤東和他的接班人林彪〉，《黨史縱覽》， 1（1998 年），頁 32-35。

滌生，〈華國鋒：決策在 1976〉，《黨史縱橫》，期 7（2004 年），頁 8-13。

滌生，〈“文革”中陳伯達爲什麼選擇投靠林彪〉，《黨史縱橫》，期 11（2005 年），頁 51-53。

滌生，〈陳毅發表一篇特殊演講始末〉，《黨史縱橫》，期 8（2006 年），頁 9-13。

劉冰，〈冒險上書－我是如何向毛主席揭發遲群的〉，《百年潮》， 期 5（1997 年），頁 44-45。

劉志男，〈九大至九屆二中全會前夕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和矛盾〉，《當代中國史研究》，期 3（1997 年），頁 38-48。

劉明鋼，〈林彪何以堅持設國家主席〉，《黨史天地》，期 3（2005 年），頁 40-42。

閻長貴，〈“締造”和“指揮”的風波〉，《黨史博覽》，期 1（2006 年），頁 16-19

薛慶超，〈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覆亡〉，《黨史天地》，期 2（2005 年），頁 16-27。
霞飛，〈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劃所謂“一月革命”始末〉，《黨史博采》，期 9（2004 年），頁 40-45。
霞飛，〈毛澤東生命中的最後一年〉，《黨史博采》，期 12（2004 年），頁 4-10。
霞飛，〈姚文元與胡風〉，《黨史博覽》，期 1（2005 年），頁 51-55。
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黨史博采》，期 6（2005 年），頁 11-17。
霞飛，〈紅極一時：“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中），《黨史博采》，期 7（2005 年），頁 44-47。
霞飛，〈南柯一夢：“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下），《黨史博采》，期 8（2005 年），頁 49-54。
霞飛，〈姚文元在 1957 年〉，《黨史博覽》，期 9（2005 年），頁 50-52。
霞飛，〈陳伯達與江青的明爭暗鬥〉，（上），《黨史縱覽》，期 1（2006 年），頁 44-49。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上），《黨史博采》，期 3（2006 年），頁 32-35。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中），《黨史博采》，期 4（2006 年），頁 46-52。
霞飛，〈姚文元的人生浮沉〉（下），《黨史博采》，期 5（2006 年），頁 39-43。
霞飛，〈吳法憲浮沉錄〉，《黨史博覽》，期 8（2006 年），頁 20-25。
蘇雙碧，〈關於『吳晗問題』性質的高層爭論〉，《中國人才》，期 4（1997 年），頁 28-29。
藝涵，〈譚震林“大鬧懷仁堂”〉，《中國人才》，期 4（1997 年），頁 28-29。

四、 網路資源

人民日報 49-97：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0&SelectID=2&ChannelID=5020&Page=1